



日本政治论丛

Japanese Politics Review



赵京

日本政治论丛

Japanese Politics Review

赵京 译著

安那祺主义文库 J-1



 中日美 比较政策研究所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SBN 国际书号: 978-0-557-23538-4

Publisher & Printer 出版印刷社: 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istown, NC 27560, USA

Distribution 发行: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cpri.tripod.com>

Language 语言: Chinese & English 中英文

Editor 编辑: Jing Zhao 赵京, zhao@h-china.org

Edition 版本: Third Edition 第三版

Character 字数: 114 thousand 114千

Date 日期: December 4, 2012 2012年12月4日

出版说明

本书第一版主要由巴金的“悼橘宗一”、“伟大的殉道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大杉荣著作年表”、“大杉荣年谱”和“一封公开的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巴金全集》第18卷），“东京的殉道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第21卷），“骷髅的跳舞”、“忆古田大次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7卷）和“《死之忏悔》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巴金全集》第17卷）等构成。考虑到相关人物的中文简介现在已经有所普及，而巴金译作的有关内容有些过时、简单，我把它们删去，以“纪念大逆事件一百周年”等新作代替。我计划写作更多的类似历史评介。

在第二版中，主要加入了我关于日本政治体制的评论和译文，成为《美日同盟及其与中国的互动》（ISBN 978-0-557-06772-5）一书的补充。它们与China and Japan: Research and Review（ISBN: 978-0-557-04795-6）、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Review（ISBN 978-0-557-04635-5）（以上两本书由朋友Roger Chapman努力，已录制成CD发行）和<日米中：研究と評論>（ISBN 978-0-557-04475-7）、<産業社会における社会移動>（博士論文）一起，构成了我关于日本社会、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的独自见解。

我要对本论集译文作一点说明：译文的价值在于它们提供了难以通过普通媒体或“学术界”得到的信息或知识，不一定代表我（译者）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我知道原作者的政治观点或知识并不正确，也没有如数一一指出，相信读者的判断力。

赵京，2011年5月1日

[第三版加入了更多的文章]

目 录

1. 脱离日本政府管制申请，栗村宽亮、宫地茂平
2. 纪念“大逆事件”（“幸德事件”）一百周年，赵京
3. 三十年代日本文学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淡中刚郎
4. 藤原彰《饿死的英灵们》读后感，平井纯一
5. 《日军暴行目睹实录》书评，赵京
6. 随感：日本帝国海军最后的大将井上成美，赵京
7. 出席日本社会学会大会观感，赵京
8. 不能不表的由衷敬意，赵京
9. 个人人权的尊重与民族主权的平等，赵京
10. 日本的国家支配构造，赵京
11. 从加藤、志位对话看日共向自民党接近，山田明人
12. 作为帝国主义渗透手段的日本对秘鲁经济援助，隅谷优
13. 《被封锁的对话：秘鲁日本大使馆占领事件反思》书评，平井纯一
14. 日本红军来自狱中的声明
15. 日本官私合营第三形态七成陷入赤字，田口骥一郎
16. 志位和夫批判，山田明人
17. 日本向何处去？浅井基文
18. 日本“一坪地共有者”团体宣言
19. 美国对日本经济政策的干预，高岛义一
20. 赞美侵略战争的电影《尊严与命运的瞬间》，赵京
21. 日本哪里有打工处，武
22. 抗议奥林匹克理事会的紧急声明，（日本）反对奥运会联络网
23. 广岛县立高中校长被迫自杀，赵京

24. 要求哈比比政权立即承认东帝文独立、撤退军队
25. 开张五周年的关西新机场
26. 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东南亚历访看其进一步的右倾化变质，持批判精神的部份日本共产党员
27. “突破国难”的天皇“元首化”动向，平井纯一
28. 日本年金制度改变法案的危害，高岛义一
29. 日本战后左翼人物的命运，樋口笃三
30. 庆祝日本废止按捺指纹制度
31.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铺路，高岛义一
32. 大量失业与小泉政权的破坏雇用政策，高岛义一
33. 太极旗是朝鲜民族的象征吗？
34. 从日本银行买进私营银行股份看日本金融危机，高岛义一
35. 世界水论坛推行水的商业化和私有化，小林秀史
36. 日本国民保险制度的崩溃，赵京
37. 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保守化，赵京
38.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资本主义法律体制，高岛义一
39. 强烈抗议立川警察署与东京警视厅压制言论自由
40. 现代日本社会急剧增长的高龄犯罪
41. 抗议日本政府长期拘留外国人的不当行为，北野
42. 安倍政权粉墨登场，赵京
43. 悼念新美隆律师，内田雅敏
44. 夕张市是如何破产的，矢野薰
45. 静冈县民抗议开发机场自焚身亡，赵京
46. 日本政府推动在靖国神社“合祭”战犯
47. 福田政权的修正路线走向，赵京
48. 日本爱媛县警察当局的组织性犯罪，远山裕树
49. 以“靖国史观”武装起来的日本自卫队，赵京

50. 日本“入管法”改恶动向，赵京
51. 从天安门到日本民主党政权，赵京
52. A Letter to the Japanese Premier Hatoyama, Jing Zhao
53. 日本之行观感，赵京
54. 日本政府的信用等级，赵京
55. 综合灾难后仙台法庭对日本企业不当行为的判决
56. 如何翻过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赵京
57. 日本迈向核武装的危险立法，赵京
58. 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非主权方案，赵京



菅野スガ, 1911年1月25日“大逆事件”的安那祺主义殉道者

1. 脱离日本政府管制申请

日本政府太政大臣三条实美 殿下：

吾等生来即在日本政府的管制之下，受到法律的保护、获得法定的权利、也履行法律的义务。但是，今日，吾等大醒大悟，不再愿意生活在日本政府的管制之下。

从今以后，不受法律的保护、不要法定的权利、也不尽法律的义务，断然决定脱离管制。敬请批准。

谨上。

地球之自由民：栗村宽亮、宫地茂平

明治 14(公元 1882)年 11 月 8 日

[赵京译自 www.ne.jp/asahi/anarchy/anarchy/data/dakkan.html,
初版于美国圣荷西《比较政策评论》第五期，2001年]

2. 纪念“大逆事件”（“幸德事件”）一百周年

1910年5月25日，日本长野县松本警察署以制造、私藏炸弹的罪名逮捕在明科制木厂的宫下太吉和新村忠雄，是谓“明科事件”。5月31日，尽管只有宫下太吉、管野スガ、森近运平、新村忠雄和古河力作五人与暗杀计划有关，日本总检查长迫不及待地吧旧刑法第73条“大逆罪”安到“明科事件”上，以此为借口开始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安那祺主义者进行大逮捕和监禁，并封闭了所有的工会，禁止出版一切进步书刊。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对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诬陷日本安那祺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26人“大逆不道，图谋暗杀天皇，制造暴乱，犯了暗杀天皇未遂罪”。经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一审即终审的特别判决后，于1911年1月18日以“企图灭绝冠绝宇内的国体之尊严、列圣恩德普照四海的帝国臣民之大义，对威严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体，欲逞千古未有之凶逆”的捏造罪名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还对新田融和新村善兵衛判决有期徒刑11年和8年。统治阶级总是“先下手为强”，把屠刀架到任何（哪怕是思想上）敢于反抗的平民的脖子上。

的确，幸德1901年6月的《暗杀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公法如此缺乏判决国际纠纷的能力，经济制度如此缺乏调解劳资冲突的手段，社会法律与良心如此丧失判断与制裁个人或党派行动的力量，则对此社会绝望的人，或者隐遁、或者发狂、或者自杀、或者诉诸暗杀行动。暗杀确为罪恶，但把他们推向绝望的社会不是更罪恶吗？”新村和宫下可能在与幸德的一面之交后受到其安那祺主义的影响，但包括幸德等多数“维新志士”（作家德富芦花的著名“谋反论”演说中所称）并没有自觉地与天皇为敌，幸德不认为天皇制是向安那祺主义自然进化过程的重大障碍。但在1910年吞并朝鲜后，日本的统治阶级不可能允许安那祺主义的存在。

从1910年11月12日起，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艾玛·古尔德曼等安那祺主义者召开了抗议集会，并向日本驻外使馆写信抗议。受艾玛影响的杰克·伦敦在1911年1月21日的《大阪朝日》上说：“只有对幸德秋水等人宽大处理，才能表明日本是个文明国

家。”在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之下，大审院被迫以天皇的名义将死刑中的12人减为无期徒刑。但幸德秋水、宫下太吉、森近运平、新村忠雄、古河力作、奥宫健之、大石诚之助、成石平四郎、松尾卯一太、新见卯一郎、内山愚童11人于1月24日、管野スガ于1月25日被处以绞刑。被判无期徒刑的和尚高木顕明（自杀）、峯尾节堂、冈本一郎、三浦安太郎（自杀）、佐々木道元5人死在狱中，被判无期徒刑的坂本清马、成石勘三郎、崎久保誓一、武田九平、飞松与次郎、冈林寅松、小松丑治7人后来被释放。当时因为“赤旗事件”被关进监狱的大杉荣、荒畑寒村、堺利彦、山川均等逃过大难，但日本的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运动由于这次大规模的残酷镇压而受到严重打击，走向低潮。“大逆事件”以后，谈论天皇成为禁区，“国贼及其家属”成为众矢之的，日本新闻言论检阅制度进一步强化。日本作家森鸥外在《沉默的塔》、田山花袋在《残雪》等作品中中对大逆事件有所记述。



日本政府投降后，坂本清马本人和森近运平的遗族于1961年1月18日向日本政府提出重审此案的要求。1965年7月5日日本最高法院确认原判现在仍然有效，因为这涉及到天皇制的日本统治本性。说起来，历史自有公论（插图是和歌山县新宫市民众所立的表彰大逆

事件牺牲者的纪念碑），谁稀罕日本政府的“平反”？

“大逆事件”又被称为“幸德事件”，是因为作为安那祺主义思想先驱的幸德秋水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据布施柑治说，幸德秋水在判决的最后，平静地陈述道：“一个证人也没有调查就判决，有这样可耻的审判吗？”当天，他写下了绝笔：“区区成败且休论，千秋唯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布衣尊”。这使人联想起1886年5月1日（五一节和八小时工作制的来由）芝加哥干草市场的安那祺主义殉难者在绞刑架上的遗言：“这是我最幸福的时

刻。”他们是安那祺主义的耶稣（个人归宿）、安那祺主义的“基督”（救世真理）！



幸德秋水1871年生于高知县的一个商人家庭。18岁时本计划到中国留学，因贫困而中途折回。来到大阪后，作了民权运动精神领袖中江兆民的学生。他1898年入万朝报社工作。这时日本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万朝报》对罢工深表同情，对幸德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并加入社会主义研究会。1901年，他和片山潜等人创建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提出“完全废除军备、废除阶级和土地及资本实际国有”。在行动纲领中要求撤销贵族院、废除《治安警察法》，裁减军备，实施普选法，制定工会法、保护佃农法、平分土地等。因拒绝政府修改纲领的命令，该党两天后即被勒令解散。但他们继续以社会主义协会名义活动。这一年幸德秋水的《20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一书出版。

1903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他因为在反战问题上与万朝报社意见不合而脱离该社，同堺利彦等人创办《平民新闻》周刊，宣传反战和社会主义思想。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平民新闻》曾先后发表了“吾人坚决否认战争”、“不断反战论”等文章，抨击日、俄帝国主义战争。他还在这家周刊上发表他和堺利彦共译的《共产党宣言》，后来的首次中文版也译自这个日文版。他还曾翻译过孙中山的“革命潮”一文，刊登在《平民新闻》上。

1905年1月，《平民新闻》被迫停刊后，幸德等改出《直言》作为舆论阵地。2月，幸德以反政府文章被判处5个月徒刑。他在狱中读了克鲁泡特金的《田园、工厂、手工场》等书后，“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入狱，以无政府主义者出狱”。10月，“平民社”被解散后，他于11月离日本去美国。在美国访问的半年间，在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接触过程中，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更加坚定。回到日本后，幸德等于

1907年复刊《平民新闻》，改为日报。幸德在“我的思想变化”一文，明确指出，“用普选及议会政策不能完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依靠团结一致的工人的直接行动。”但幸德本人并没有参与多少“直接行动”，他主要从事译著工作，出版了《平民主义》（《平民新闻》时代的论文集），立即被禁售。1908年他回到故乡，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1909年3月，他出版《自由思想》后，不但被查禁还遭到罚款。

除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幸德秋水别的主要著作都先后译成中文出版：《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赵必振译，1902年版，《社会主义广长舌》商务编译所译印，1912年版，《社会主义神髓》蜀魂遥译，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6年版；创生译，东京奎文馆书局1907年版；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过马采的新译本；《基督抹杀论》狸吊正译，北京大学1924年版。到今天为止，中国对幸德的介绍和研究可谓“不遗余力”。可惜的是，所有在中国发表的文论，都把幸德作为“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来定位（从而有价值），却他从马克思主义向安那祺主义的转变升华定为“倒退”、“局限”，没有突破官方的意识形态控制，去掉了幸德思想的精髓。

2000年12月19日，幸德秋水的家乡高知县中村市议会通过了以下决议：“90年间幸德秋水作为所谓大逆事件的主谋，背负着浓重的阴影。值此20世纪的最后一年，作为我们的义务，应对幸德秋水为首的有关人员，依正确的理解予以评价并谋求为其恢复名誉。故中村市议会决议称颂乡土先驱者幸德秋水的伟业，以资显彰。”

今天，正值“大逆事件”惨案一百周年纪念之际，面对依然维持“天皇国体”的东京政权以及后来冒出的各方军政当局割据遗留下来的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还有区区钓鱼/尖阁无人小岛等国际纠纷，我们确信只有幸德秋水等先烈一百年前为之牺牲的安那祺主义能够为亚洲、为世界带来真正持久的和平。

[参考：<http://ja.wikipedia.org/wiki/幸德事件> 等网上资料]

赵京，2011年1月24日

3. 三十年代日本文学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 论日本浪漫派

淡中刚郎

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解散以后，“转向”（即放弃过去的政治信念与行为方式）作家与一般作家的作品里开始出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

村山知义在《白夜》里描写了在监狱中由民族主义意识转向的心理动机。“就这样，两年过去了。在度过了完全不透风的第二个暑假之后，在他的心底里产生了不可名状的无法抵抗的意识。自己算什么东西？无非是遥远的连姓名、面孔、生涯都已经消失掉的父母的父母们的父母们……的血与肉（以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的偶然所产，微不足道。”岛木健作的《苦闷》中同样地描写了这种狱中转向的心理。“血，正是这个无法往上追溯的先祖的先祖以来的血缘，决定了他石田的个人性格与一切行为，除此之外别无他因。石田也自然地相信，他今后的一切也已经由此血缘决定，无论怎样也不能改变。”

这些转向作家，就这样把连绵不断的血缘的自觉（民族意识）作为自己的精神危机的解脱。1933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的转向声明《致共同被告同志书》则促进了大批作家、活动分子的转向。他们批判与民族意识脱节的运动：“共产国际把各国兴起的民族主义倾向定义为排外主义，忽视了科学地解剖民族主义的生命力的可能性。”“真正的革命家必须明白：日本民族强国的统一性正是日本社会主义最优越的条件之一。民族就是多数人，也就是广大的劳动大众。我们对此劳动阶级的创造能力充满自信。”“我们要忠实于大众本能显示出来的民族意识。”他们进而宣称：“日本皇室的连绵不断的历史存续，是世界上罕见的、日本民族独立自立的顺当发展的表现，在劳动大众心中存在着以皇室为民族统一中心的社会感情。”这些人以反省与大众脱节的运动为借口，断言民族就是劳动大众，把民

族意识置于阶级意识之上，以民族统一的强化代替阶级统一的强化，似乎是为了社会主义而美化民族主义，最终归结到对天皇制的赞扬。

横光利一在1934年发表的《纹章》，就是受到满洲（三·一八）事件以来国家主义抬头的影晌而表现出向天皇制国家主义的倾斜。“雁金的家祖代代勤皇，所以在他的行为里，国家的观念像大海潮一样扑面而来，不可抗拒；同时，他的国家观念中也反映出与民众独立的巨大个性存在。这样的在他头脑中存在的国家印象，使他在行为处事上不拘泥于别物，而只按照自己的直觉判断奋勇迈进。”在此，把行动狂雁金八郎与自我意识过剩的文人山下久内相比，衬托出屡败屡战的雁金的坚强，乃是来自于代代勤皇的名门“纹章”的鼓励。

《日本浪漫派》与《人民文库》的论争

1934、35年，《日本浪漫派》同人保田与重郎、龟井胜一郎等与后来创办《人民文库》的高见顺、森山启等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浪漫主义的论争。

保田在《日本浪漫派公告》中呼吁文学的革新、诗的复活、文学伦理性的回归，并批判进步主义，力图再发现为近代解释歪曲掉的日本古典美。“平庸低俗的文学流行于世，家常的饶舌正在代替不变的信条。我们今天创立日本浪漫派，就是对时髦的挑战。”“我们希求、憧憬高贵与热烈。憧憬的形式就是拥护美好、显彰崇高、复兴传统艺术人使命的高迈迫切的一种表现方法。”

对于浪漫派的主张与行为，高见在“浪漫派的精神与浪漫派的动向”一文中批判道：“面对惨淡的现实、登高飞越并高唱蔑视与否定之歌，才是浪漫派的精神。而日本浪漫派却是十九世纪浪漫派的妖怪，一种去掉了反抗精神的片面妖怪。”高见对于日本浪漫派逃避现实丑恶的批判是对的，却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日本浪漫派运动的登场。

日本浪漫派的龟井在“现代浪漫思维”中对此说明道：“浪漫主义原是面壁直向的高歌。不过，这种热情在到达饱和点之后，在我们

的心灵中又泛起了肉欲。在这种浪漫主义精神疲惫、肉体欲望出现的时候，会不会有另一种浪漫主义？满怀空想与希望，再回到现实中来。正如浮士德在经历了激烈的恋爱后，又回到花草盛开的原野呼吸自然之露。当我们养育成心中之梦后，就应该再回到人间；在人群中洗涤自己的伤痕，复苏失去的理性。”对于龟井而言，浪漫主义可以用于“再生”因为转向而陷入苦闷的自我信念，再回到现实中来。

《人民文库》派的森山很正确地指出：龟井等人在理论上憧憬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劳动者阶级的使命，在实践上却没法实行；这种无法实现的憧憬不能自我满足，只好以“自我的再考察”救济自己，在梦想中飞跃。“我们决不能只靠‘内省’获得‘自我’的本质。

‘自我’中的反抗心理与败北心理都植根于我们的生活过程，是对现在社会状态的反应。所以，随着社会状态与生活的变更，‘自我’也会发生变化。”（“关于转型期的自我”）

龟井反论到：“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挽救那些因为信奉马克思主义为现代理想主义精神而感到挫折的人们的理想主义，自我的问题由此而生，这才是现代知识份子的中心课题。”就是说，他要复归到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理想主义。龟井认为知识阶层本来就是“阶级斗争的胆小鬼”：“今天，‘自我’从各个方面的强固表现，就是对这种可怜的喜剧角色的激愤。为什么自己变成了胆小鬼、怕事虫、和事佬、旁观者？人们说‘政治主义太可怕’、‘公式主义太可恨’。对，是这样的。不过，最可怜的还是那种不明真相只知尾随的‘牺牲精神’”。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然伴随“政治主义”，看不透这一点，逾越自己的本分去发挥为劳动者阶级的“牺牲精神”，是最大的错误；知识份子应该拒绝政治主义的理想而持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在此理想上采取“孤傲的反抗”。

《日本浪漫派》的基本性格

《人民文库》是1936年3月为了对抗一部分文学界、日本浪漫派的国家主义倾向以及国家对文化的统制而创刊的。它立足于广津和郎的基于“散文精神”的批判性现实主义：“无论环境如何，都不屈不挠，在212万死者中，有近128万是饿、病死的。再加上没有统

计的死亡人数忍耐坚强、信念坚定，不盲目悲观也不随意乐观”。当时所用“人民”一词就是相对于“臣民”、“国民”的用语，具有反权力的含意。但中日战争爆发后人民战线派受到逮捕审问，《人民文库》于1938年1月宣布停刊了。

《日本浪漫派》于1935年3月由《我思》同人中的六人创刊。《我思》于1932年3月创刊，44年9月停刊，它的名字来由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受到德意志浪漫派的古典憧憬的影响，力图再发现日本的古典。在《我思》创刊号编后记中，保田写到：“我们最爱古典，我们爱不容忽视的这个国家的古典；我们把古典作为形式来爱戴。现在我们更爱突破这个形式的意志。”《日本浪漫派》同样唤起对日本古典文学、古代美术的关心，探寻日本精神的回归方向，引导了十年后随法西斯主义勃兴的国学复兴、日本主义文学的昌盛。38年8月由于财政的理由废刊后，保田、浅野晃等人于林房雄加入了“新日本文化会”以及影山正治主宰的“大东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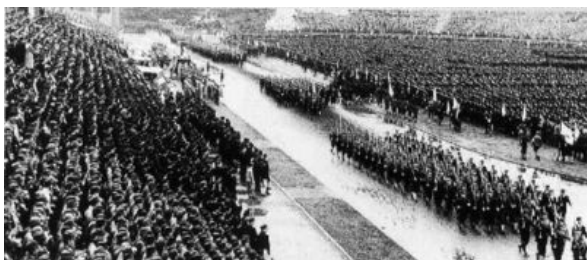
平野谦评论道：“表面看来，对决性质的《人民文库》与《日本浪漫派》是解散、转向文学泛滥状况下文学地盘上长出的异母兄弟”。高见也称其为“转向之树的双枝”。确实，两派同人的大多数都是转向者。《日本浪漫派》的中心人物保田在旧制高中时参加赤色救援会，后来又是三木清等人的反法西斯组织“学术自由同盟”的秘书；龟井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因“三·一五事件”遭到逮捕，保释出狱后又属于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太宰治也与共产党资金局有联系。《人民文库》的武田麟太郎、本庄陆男、高见等属于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当然，《日本浪漫派》的登场并不就是简单地由转向决定的。

保田在“蒙疆”中写道：“战争是以变革精神史为理念的行为”，“破坏同时也建设新文化的伦理。”保田期待战争能够带来已经失去独自性而只是模放西欧的近代日本文化的再生，是“超越近代”的先声。在“佐藤春夫”中，“这个以31年为中心的时代里，在我国青年中产生了一种浪漫的思想与文学。从一切表现都是破坏旧秩序的状态变为自暴自弃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荡漾着民族主义的气势。”在《我国浪漫主义概观》中，“二十年代中期风行进步

主义、把广大青少年都纳入伞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三十年代初期也经历了青年生活陷入最恶劣失业的状态。这个基于人道主义的青年运动已经极端颓废、自暴自弃，失去了正面抨击权力的力量。日本浪漫派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克服绝望的时代找到了文艺的方向。”

1931年发生了满洲事变，开始了长达15年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独占资本主义体制无法继续发展，想靠海外“进出”（即侵略）来突破困境。劳动者阶级的斗争正准备由此展开进入决战，但也正是此时，日本共产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保田为代表的日本浪漫派思想，一方面直接地反映了转向、挫折、不安、颓废中青年的自暴精神状况，另一方面也包含有在多重恐慌的过程中解体、被失业、贫困与饥饿困扰的小资产阶级市民对独占资本与国家权力的失望与抱怨的反抗意识。日本浪漫派认为这个社会矛盾是由于欧化以来的近代化的产物、所以希求革命，但共产党组织的崩溃以及他们自身的转向，使得这种观念性情绪“革命”与原始共同体憧憬结合而倡导古典的复兴。他们愿望“寄托着深远梦想的强大政治”，以为战争可以实现“革

命”，实际上却堕落成对法西斯体制与帝国主义战争的赞美（插图为1943年“学徒出阵”场面）。



[赵京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劳动党机关报《海燕》周刊1998年3月29日第671期。此译文是连载于同刊的《日本文学论争史》第11回。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9年第3期]

4. 藤原彰《饿死的英灵们》读后感

平井纯一

小泉首相最喜欢引用那些“堂堂正正为国捐躯”的特攻队等战死学生兵的手记，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 230 万日本士兵都很自豪地战死在沙场。

但是，藤原此书《餓死した英霊たち》（青木书店 2001 年出版，2,500 日元）告诉我们：“这场战争的特征是，战死的日本军人半数以上并非战斗死亡，而是饿死、病死的。那些供奉在靖国神社的英灵并非死于战场，而是在饥饿与病困的地狱挣扎而死。”

藤原本人 1922 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即成为职业军人，直到他 1944 年作为中队长在中国前线负伤复员。日本战败后他进入东京大学学习历史，深切反省军国主义的过去，在学期间作为“全学连”创立干部投身于反战运动。他在此书的序言中申明：“饿死病死比战死者多。这不是一个战场的局部特征，而是整个战争全体的特征，由此可见日本军队的本质。当我们回忆起大量的日本青年被这样人为地陷入饥饿、病困而死的境地，就必须明确这个罪行的责任，替死者讨回公道。这就是本书的目的。”

藤原可称为研究旧帝国军队反动、腐败性质的权威，在此书中，他严厉揭露军部统治集团的罪行。他基于公开的战史与厚生省援护局等的资料，推算出饿死病死者占全部死亡军人的六成以上。例如，“（南太平洋）卡达鲁卡那鲁岛战斗中，方面军司令官承认：战死者 5,000、饿死者 15,000 名。布根比鲁岛在塔罗克那战役以后的 2 万人，几乎都是饿死的。所罗门群岛上四分之三的死亡日本军（66,000 人）也是饿死的。”“厚生省的调查显示，东部新几内亚死亡人数为 127,600 人。同时，各部队的报告都说九成以上是饿死的；也就是说，有 115,000 人以上是饿死的。”

在缅甸方面军，有 78%，即超过 145,000 人是饿死的。在与美军展开激战的中太平洋诸岛，在战斗之后许多岛屿被切断后援，美军也

没必要进攻，日军只好等待饿死的命运。藤原推算有半数的日军，即 12 万人是饿死的。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最多的死者(50 万以上)是在菲律宾，大概有八成即 40 万人是饿死的。日军在中国战线的死者也有 455,700 人，藤原推算有约四成是因为营养失调、疾病等丧生的。总之，以作者的可根据的数据，可以作出结论：有 140 万左右的军人是饿、病死者。

为什么日本军人的非战斗死亡率如此之高呢？从军事作战上看，有“无视补给的计划、作战参谋部的独断”等缺陷；从本质上看，反映出日本帝国军队无视下级士兵人权的性质。例如，中太平洋马利亚纳群岛的日军被切断后援等待饿死期间，因为“军纪严正”受到天皇裕仁的嘉奖。所谓“军纪严正”就是处死偷窃食物的士兵以保证军官的供给。结果，到日本投降时，有七成的军官存活下来，而士兵生存者不足两成。

这其中最极端的就是禁止投降的军事体制。如果允许那些丧失战斗能力的军人投降，许多人都可以免于饿死的命运。

今天，日本政府仍然以国家的权力强制拜祭靖国神社里的（大部份是饿死者）灵位，这一方面是免除战争统治集团的罪行，同时也是为了批量制造新的、同样的“为国捐躯”者。这本书从历史事实的研究，揭露了这一点，值得一读。

[赵京译自日本新时代社发行《かけはし桥梁》周刊 2001 年 9 月 10 日第 1697 号，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 年第 4 期]

5. 《日军暴行目睹实录》¹书评

在“七·七”事变 65 周年之际，新华网北京 7 月 5 日报道“我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触及方方面面”（记者孙彦新、王东明）：“近年来，全国 100 多家出版社共出版发行有关抗战史的论著成百上千种。”“80 年代以前，抗战史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政治、军事和根据地经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后，抗战史研究出现热潮，研究触角已伸及抗战的方方面面。”（《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主编荣维木）。最近几年抗战史的研究重点主要在战争遗留问题上。在实证性的研究方面，战时强制劳工研究、细菌战研究、战争损失研究、慰安妇研究等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有的还为民间团体战争赔偿诉讼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理论性研究方面，学者们对日本的“右翼史观”包含的内容、思想理论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社会基础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史实维护及教育协会 (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WWII in Asia,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USA)，简称爱我华协会 AOHWA，是 1995 年 12 月 2 日在美国匹茨堡市成立的非赢利 Non-profit 教育机构，目的是使中国、美国、日本、以及亚洲其它国家的人民，明了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战前所犯的种种暴行，并呼吁日本政府与人民，必须承认这些暴行并担负责任（本书第 186 页）。几年来，爱我华协会的广大义务工作人员利用其在北美的条件，从事了大量揭发日军暴行的宣传教育工作，在中国（包括台湾）、美国、日本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受到公众注目。此书是爱我华协会的又一项教育工作。

编著者王之鉴先生 1923 年生于河北省赞皇县南马村，在日军占领下生活七年，目睹与听到很多的日军暴行事件，并曾先后两次为日军逮捕，其中一次曾被关禁在石家庄日军宪兵司令部监狱六个月，受

¹王之鉴编著《日军暴行目睹实录》，Li Kung Shaw Publisher 出版，美国匹茨堡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史实维护及教育协会”发行，2002 年 3 月，196 页，ISBN 09607806-9-6。

到拷打与灌水等逼供酷刑。王之鉴从台湾退休后到美国定居，自 1999 到 2000 年，连续三年返回故乡实地采访日军暴行，完成此书(本书“作者简历”)。正如他在本书“前言”所述：“五十多年来这一情景时时刻刻呈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且总觉得不把这个大屠杀揭露出来就好像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我也认为每位国民都有义务把自己所知道、而可留作历史的事件写下来，作为历史记录。”除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近八十高龄的王之鉴访问了赞皇县三百多个村庄的四十多个村庄，所以此书不仅是个人的回忆，也可以看作是整个抗日战争其间遭受日军暴行的广大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写。

本书的 28 篇内容大体可分为三部分：赞皇县简介及抗战时期日军占领情况概述(第一、第二篇)、王之鉴本人亲身经历或目睹的日军暴行、加上王之鉴采访收集到的事实，并付有十一幅图片、两个附录。

第三篇“残无人性的北马村大烧杀”、第五篇“东塔影惨案一屠杀居民 42 人”、第十六篇“几个万人坑”、第十九篇“八年抗战，王家庄受害军民十四人”、第二十五篇“山明水秀许亭村，日军入侵遭蹂躏”、第二十六篇“我的外婆家东王俄村”叙述日军对于无辜村民的集体暴行。当日军小股或单人在某一村落骚扰受到抗日武装或民众袭击，就会派大队人马到此村落报复，直至烧杀包括妇孺的整个村落(插图不是来自本书)。



第四篇“三光政策下的烧光暴行”、第九篇“劳苦而残忍的徭役”、第十篇“封锁壕带来的灾难”、第十一篇“无人区——世界上最悲惨的地区”、第十四篇“悲惨的劳工”、第十五篇“我给日军出了什么差役”、第十七篇“宪兵队的乱杀、酷刑与勒索”、第十八篇“助纣为虐的皇协军”、第二十篇“三光政策下的抢劫暴行”、第二十一篇“跑鬼子”、第二十七篇“日军下级军官的形象”、第二十八

篇“日军遗迹最显著的南洼碉堡与封锁壕”叙述日军占领期间如何在日常(特别是经济)生活中掠夺、压榨当地民众。

第六篇“无耻的暴行”、第七篇“残杀妇孺”、第八篇“无端受怀疑,任意行杀戮”、第十二篇“十二名贩黑枣百姓被杀记”、第十三篇“日军如何迁怒老百姓”、第二十三篇“被诬告,医生遭杀害”则详细记录日军如何具体地对平民百姓施加暴行。特别是日军对妇女的奸淫,因为中国妇女的贞操传统,往往导致妇女的家破人亡。第二十二篇“日本兵如何折磨人”记述对抗日人员(或抗日人员嫌疑)的暴行。第二十四篇“寡妇盗骨”告诉我们两个可歌可泣的事迹。

由以上的这些篇幅可以看出此书倾注了王之鉴的大量心血。其中收录的许多史实都是第一次见诸文字。读到这些感人的历史,更迫切感到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记录、调查、研究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整个日本侵华期间的历史,特别要加强日本侵华史料收集整理工作。最近几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非常活跃的时期。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齐密云介绍,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已征集一万余件抗战时期文物的基础上,将于今年下半年对二战时期曾被日本侵占过的900多个城市进行普查,走访幸存者,以期对全国的抗战史文物资料、档案资料有个基本的了解。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馆长陈浩良也呼吁:“各地图书馆、研究机构加强合作,联手收集整理馆藏和流落民间的日本侵华史料,以进一步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我更希望爱我华协会作为民间组织,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国内的相关团体的联系,交流研究成果。

从近一步完善爱我华协会的类似教育项目的目的出发,我想对此书提出几点参考意见。一、如能约请受过历史训练的学者共同参与,将会避免一些技术性的失误。²例如,此书中称毛泽东为“政治部主任”(第16页)、左权是“129师政治部主任”(第2页),并不准确。二、出版之前如能约请协会之外的学者评注,将会改善此书的编

²需要说明的是,我本人不是历史学者,只是奉爱我华协会张闻选会长之令捉笔为王老先生的劳作略加评论。

排。例如，有几处漏字没有印刷出来，目录中漏掉了第六篇；第十四篇第四节在叙述敢作敢为的田村长后，加入其子抗战胜利后“乡居有糟糠，朝中拥娇娘”的风流韵事，与本书主体无关，可以省略不提。另外，此书的结尾，似乎应该加入一章总结全书。三、有必要参考已经出版发行的同类书刊进行比较。四、如能约请或加入日本士兵本人的回忆（不一定非要直接参与赞皇县暴行），则会生色不少。确实有一些日本的民间团体出版了类似的中日双方共同对照的记录，朝日新闻等也出版过日军士兵的回顾专集并曾被译为英文。实际上，这场战争对于绝大多数的日本士兵，也是一场灾难。据日本权威的历史学家藤原彰的研究，日军士兵在战争期间的死者中有半数以上是饿死或病死的。³五、最后，我也希望这样的书的基本内容能够用日文和英文介绍给另外两个社会的广大公众。

总之，此书作为一个亲历者的历史见证，作为爱我华协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值得向所有相关的人士推荐一读。

[赵京，2002年7月7日，美国圣何西]

³见本书前一章：藤原彰《饿死的英灵们》读后感（平井纯一），中译文发表在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四期。

6. 随感：日本帝国海军最后的大将井上成美

1995年，一位欧洲的图书馆员到日本来寻找珍贵历史资料，我的朋友介绍我和他一同去静冈县（我正好住在同县的伊豆半岛）的“日本安那祺主义资料中心”。资料中心实际上在一对安那祺主义老夫妇的家里，一方面，我高价从资料中心买了几本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译本（所以至今舍不得扔，还伴随着我）；另一方面，老夫妇又自己掏钱招待我们吃火锅。这就是我们安那祺主义者的财务原则！

我原来以为自己要为图书馆员翻译，但吃惊地发现老太太的英文非常棒。她解释说：自己出生海军世家，在战争期间，日本海军是唯一可以学习英文的地方。她接受安那祺主义，也是从英文读物开始的。没想到出产“神风特攻队”的帝国海军，还教育出操流畅英文的安那祺主义女性！

我在日本唯一订阅过的刊物是日本共产党的《赤旗》周刊，因为那时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日本其它政党都坐过执政的交椅，没有什么政治新闻。我注意到日本共产党对井上成美赞赏有嘉，主要不是因为这位帝国海军最后的大将（德国投降后才被日皇任命为大将）反对日本加入轴心国、反对对美开战、反对扩大侵华，不惜与陆军对立，暗地里展开“终战”（投降）的准备，而是因为他也反对取缔（反战、反日皇的）日本共产党。

最近，我得以翻阅阿川弘之写的《井上成美》（新潮社1986年出版），书中突出日本海军的理性，把战争期间海军的责任主要描写为“没能制止陆军的专横、野心”。确实，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也没有追究米内（海军大臣）和井上（海军次长）等海军高级将领的犯罪，井上战后唯一的工作是开办英文补习班，继续原来当海军兵学校长（中将）时的教育事业。在让人“闻风丧胆”的“神风”海军航空兵和“世界第一强陆军”的神话和残暴机器里面，掩盖了多少理性和人性的悲哀！

每当我读到日本的历史，总是想起在“天皇”、国家的神圣面目下日本官员（包括国立大学的“教官”）的可耻、日本普通民众的可怜和日本整个民族的悲哀。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占领天安门广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宣告了世界冷战结束的时刻，日本以超级经济大国的身份赢得了冷战，“名列第一”。如果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日本信守“保护中国留学生”的国际承诺，把人权作为外交基础，可以成为亚洲的经济和政治领袖。但狭隘的日本统治集团为了“国家利益”，把我们在日留学生作为筹码与北京的当局交易，我突然发现那些很优秀的有点权势（或自以为有点权势）日本人一个个失去了人性，成为文部省、大阪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大学、外务省、法务省出入国管理局、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来自战时“特高课”的秘密警察）、（大阪）府警、（兵庫）县警、（东京）警视厅等国家权力下的奴才工具。日本的“和平宪法”、国会答辩、政府公告和“学术自由”原来这么廉价！与其说是我这个被赶出日本“学术界”、被迫逃离日本的个人的曲折，更是日本学术界、日本社会的悲哀。日本的衰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赵京，2011年12月5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圣拉蒙]

7. 出席日本社会学会大会观感

每年一次的日本社会学会大会今年（第 62 届）在京都大学举行，日期是十一月三日、四日两天，正好是全日本就是否出兵中东以及新天皇登基而舆论沸然的时候。而其有光荣自由、民主传统的京都大学前不久刚发生了学生抢占校长办公室、警察强行入校镇压并抓了两个学生的事件。

刚一进校门就面临大幅的反对派兵、粉碎天皇登基的宣传牌，每一间教室都贴满了各种类似的标语。在全日本所有的大学校园中，京大是唯一的“沙漠之洲”，据说是老谋深算的日本政治家担心整个日本社会完全堕落为金融帝国，才在远离东京、紧靠关西中心大阪的文化旧迹兴建了其有自由风气的京都大学。学生们以为是自己在拼命抗争日本社会的专制、封建、金钱，政治家们却按下得意这是他们的杰出设计。

【日本的教育机制】

可以举出三个典型的大学来认识日本的教育机制：东京大学为政府输送政治家和官僚，大阪大学为财团、企业输送中坚干部，京都大学则以培养思想领袖为主导，拥有日本的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前两校的校长都称为“总长”，京大的校长则称为“学长”，一般的学校不会拥有这种特殊的名称。当然可以随带指出它们的弊端：东大由于官场的侵蚀而无法无天，据说其校园中还藏有许多抗战时期从中国掠去的文物，却不敢公开，因为怕中国要求赔偿；阪大则钱迷心窍，保守谨微，对于自由、人权的观念，以“不懂政治”的卑鄙清高而排斥之，其历史最悠久的医学部所授出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多是大阪财阀的家族；而日本社会留给京大毕业生的唯一工作机会就是学校和研究机关，那些没有爬上第一流学术水平的大多数人，既不可能进入政府部门，也不可能进入大公司，多半是去教高中和没有名气的地方大学。

与去年十月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召开的大会相比，今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我刚进入会场，接过发来的传单一看，原来并不是会议说明，而是日本社会学会“解放社会学会”散发的传单。今年十月九

日，各报纸都报导了广岛修道大学当局同时解雇五名社会学教授、副教授的消息，理由是“挪用公款”。所有的大学教员都心知肚明，谁没有挪用过公款？关键是否要解雇以及为甚么同时解雇五个人？按传单所说，是因为研究“解放”、“歧视”问题的社会学者常常与政府、地方行政机构发生冲突，而这五位先生都是从事这一类研究的学者。这一件事对社会学研究者产生不小的冲击，使人们自然回想起战前，几个京大的社会学教授因为“传播社会主义”的罪名被解雇的经纬，对于现在社会学界流行的“无视社会现实”的趋势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警告。

联想起去年的大会，使我确实感到日本社会学会人才济济，青年学者辈出，以几十个分科会的数量上首先给人一种欣欣向上的活力，这大概也与日本经济连续不间断的产业景气有关。新的社会学部不断设立，对青年社会学研究者和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要求也很广泛，特别是应用研究领域的人才供不应求。我所在的阪大“应用社会学·社会调查法”讲座的助教都是两年一换而升入讲师的，有几个同学甚至还没毕业就当助教、讲师去了。这样的上升速度在日本这样的年功序列社会中可谓“得天独厚”了。

【研究领域很不规范】

与人才济济相伴而随的现象是水平参差不齐，研究领域很不规范。从理论研究上看，教授、副教授的研究水平比较稳定，而应用研究中就相当混乱，有些助教、讲师、或者博士生的研究相当出色。但年青人的研究都过于微观、具体，这恐怕也是整个世界的社会学研究状况吧！不过，日本社会学更专长此道，有时产生明显的方法论上的欠缺。例如，去年和今年，对由游戏理论推绎政治权力的研究，我就提出两点批评：(1)基于小集团的心理学研究的结论不能无区分地推广到社会大集团，这是霍曼斯的心理还原主义的翻版。在一对囚人的斗智游戏中忽略了警察的作用，怎么可以简单地推广到社会契约去呢？(2)由此理论推出的许多结论都是不证自明的，或者在别的理论中说明得更深刻。可惜，许多人都没有理解我的意图。

新方法常常引起各种谬误，用旧方法研究新问题常常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也常常经不起仔细推敲。去年的大会最后一天下午是分四大议题举行的，最热门的是天皇制问题。那时正好遇到老天皇要去世，一下子激起人们对四十年来已经被遗忘了的天皇制问题的重视。但天皇显然还没能成为普通的人供社会学者研究，其中的政治纠纷（如长崎市长说天皇有战争责任而被右翼枪击）太敏感，故今年的这次会议完全看不到有关天皇的论文。

去年的另一议题是日本的国际化问题，特别议论了日本企业是否该吸引东南亚体力劳动者的问题。日本企业希望引进廉价劳动力，但外务省和法务省则担心他们进入日本后就定居不走，像德国的土耳其人那样，在你这里生下孩子就要求社会保障，这当然不是日本人能够接受的。这个议题今年也被取消了。

【大胆批评、质疑】

这一次会议共提出二百四十二篇论文，我恨不得多长几只耳朵，全力以赴地吸收各种知识，特别利用日本人不喜欢在公开会场发言的机会，大胆批评、质疑。我参加“学说研究Ⅲ”组，就上智大学的吉井惠美的“科学社会学中的科学与科学者集团”的论点，指出其没有把科学与知识区分开来，前者多指自然科学，后者包括自然知识更强调文人集团，我们应该开创出知识社会学来，而不是曼海姆的狭隘领域。例如现在的中国就正进行着从科学扩展到所有人类知识的社会革命，不仅自然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都应该有其独自的发展规律和独立的地位来影响社会。第二天会议结束后与我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的东洋大学的中山伸树副教授又拉着我聊了许多科学哲学的问题。

我在“基础理论 V”组中参加东北大学永野由纪子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生产力”概念的再认识的讨论，我从方法论上指出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认识是基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影响而缺乏当时为康德、孔德所提倡的实证认识论，故有后来的伯恩斯坦的“新康德主义”从经济数据中对马克思的修正。这又涉及到今天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度的变革。

我参加“基础理论Ⅶ”组的关于东欧社会变动的讨论，其中正好有宫内纪靖对现在“泛欧洲主义”的探讨。我提醒他注意对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泛斯拉夫联邦”思潮的关联，指出东欧的变革从统治集团的政治理性变革中可以看出从共产主义的全权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趋向，但从民众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的复兴来看则更像无政府主义的回复。宫内先生周游过世界，是职业评论家。他在沈阳师范学院曾担任社会调查的客座教授。我小心地向他问候，他马上对我说：“你们搞调查专业的容易用数据说谎，你一定要读一下《用数据说谎》这本小书，很便宜。”我回答说：“是不是那本列举宁说谎例子的书？列宁不是社会学家，更不是社会调查专家。”我拿出自己的中文版《中国社会形态论纲》请他指教。他第二天见到我很客气地回赠了一本从人类学角度论中国人际关系的论文，其文对中国的改革很悲观，认为中国必须解决组织制度的问题才可能从事西方工业文明的进步。问题在于：没有强烈的社会变革运动，组织自身的变革可能吗？

【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都比去年提高】

这一次会议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无论在数还是质上都明显比去年提高不少。去年我参加关西大学真锅一史教授的“中国阶层归属意识和职业移动的分析”的讨论，使我和另一位在场的中国同学都感到失望和惭愧。提问的也是一些非社会学研究的生活常识，我更没有脸面在此最有把握的问题上发言，只是会下向他指出其不足：他所能接触的都是大城市的国营企业职工和国家机关干部、大学的师生，不要以此泛指中国。真锅教授很有名，曾主持过日中两国的意识比较调查，特别是天安门事件后的变迁。他希望我以后协助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搞方法论的人，常常容易看出别人的研究中没有被注意到的方法论的缺陷。好在今年发表的论文对中国的理解明显加深，有“台湾的女性就业”、“亚洲的高龄化”、“现代中国的祖先崇拜”、“中国人技术研修生接纳制度以及实际产生的问题”等论文。我参加奈良大学的松户武彦副教授的“中国工人关于平等与效率原理的意识构造”的讨论，指出他应该明确他研究的对象是指天津的大型国营企业，而不要泛称中国工人，并对企业中的共产党组织作了点说明。我

会后与他交换名片时他才说“久闻大名”，原来他也订有《民主中国》月刊杂志。

在最后一天下午的四大议题发表中，第一议题的“社会变动”由当今日本社会学的三大巨头盐原勉(大阪大学)、铃木广(九州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富永健一先生主持，整个大阶梯教室都站满了人。好在我对他们三位的理论都有所学习，就匆忙走到讨论中国、法国、日本的儿童问题的会场。中国的人口压力与日、法的出生率下降已形成强烈的对比。我最后去了“东欧社会的变动和再生”的讨论会场。东欧的政治变革告一段落，其社会、经济的再生成为人们考察的焦点，总的来说，情况并不乐观。现在看来，其政治的变革是非常必然的结局，非此选择不可，但却没有人拿出变革以后的方案。

总的来讲，日本社会学的兴旺在于其运用研究的多样化，几十个分科会就是说明，同时也有强烈的政策性色彩，政府的决策也愈发离不开学者的参与。这使我想起中国的情形，连我自身能否平安地回国从事社会研究都还是个未知数呢！

与去年同样，在为期两天的日本社会学会大会结束后，数理社会学会也在关西的神户甲南大学举行。上一次在立教大学举行的学会上由美国的 Smith Herm 先生讲美国计算机模拟的研究，他指出日本所用的计算机软件已经过时，不肯自己开发而宁愿等美国人的成功再利用。那一次会议很轻松，大家都是同行，知彼知己。我这一次就社会移动的测量发表观点，引起反响。我对日本至今还沿用的旧方法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大家几乎都没有理解我的思想，却一致认为我的发表“最有吸引力、最激进，也最危险”。大阪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也来助战，声称“激进”是数理社会学会的精神，大家都希望我尽快写成严密的论文发表出来，这样才便于他们的批判。

在数理社会学会的开幕词中，会长高坂健次教授说他参加了今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世界社会学大会后的感想是：水平太低了！人类的知识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命运，但愿新时代的马克思、韦伯、孔德、杜尔凯姆那样的巨匠产生于社会激荡变迁的中国！

[赵京，首发于东京《民主中国》1991年2月]

8. 不能不表的由衷敬意 ——写在崛川哲男先生逝世一周年

在崛川哲男先生去世一周年时，我从先生的夫人玲子女士那里收到一本先生前友好、学生们编集的《让我们都来讨论吧！——崛川先生的文与人》的纪念册。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感到一种在日本社会中没有遇到过的道德教诲，使我不得不提笔表达一个中国青年的敬意，虽然我只见过先生一面。

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很内疚。先生到京都的本能寺为中国同学讲他的孙文研究，我竟没有意识到玲子夫人也来参加，完全是由于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进入了生命最垂危的阶段。更让我不安的是，自从《民主中国》杂志发刊以来，我已经习惯了“拎着大包，到处散发”，分手时也顺手发了一本给先生。没想到过了不久，接到先生的明信片，说很抱歉不能认真读完我的文章，并鼓励我大胆地钻研下去。谅我这样头脑简单的人决不会想到这第一封文通竟是先生给我的最后的字迹！

直到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慢慢从杨希尧、马燕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先生的为人，更加重了我的尊敬。

真遗憾在京都的中国学生中，虽然有许多文科出身的，却至今没有人以文章的形式表达出对于这位曾经无私地关注中国、中国人的京都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的应尽之情。以“文笔不佳”或“没有时间”是不能推却义务的，我在这里把关于先生生活中的纪念与回忆再次留给马燕他们，只想直接地表达从纪念集中获得的感受。

在《京都大学新闻》1991年12月16日版，有森悦子女士的介绍，称纪念集为“审视我们生活的警世感言”。一翻开书页，我们可以读到在别的出版物读不到的自我反省的勇气和真挚。第一篇文章就是此书的标题，讨论什么呢？讨论天皇制！这是日本社会中的禁忌，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个社会中残留着不可触及的圣域是很危险的。不光是政党、新闻媒介如此，在国会的答辩中，关于皇室的费用，关于防卫的费用，都被视为圣域不可提及。”（第5页）先生

联想到自己在大学中讲解天皇制时学生们的冷淡、回绝、甚至反感的表情，真希望大家都能轻松地议论一下。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轻松地议论一下中共为什么把“四项基本原则”强加在宪法的第一条。

但是，我们知道，天皇在日本社会中没有被轻松地议论的条件，甚至在另一件并非“圣域”的问题上，坚持一个学者良知的先生也遭到过各种形式的威胁。那就是教科书问题。写到这里，我又想到自己在大学时的八二年的暑假，听到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的消息后，顾北平建议我们“未来与发展教育学会”写一篇文章去发表，同时也可以为学会正名，免得校方把我们定义为“持不同政见者”。害得我和陈明星白费了好几天时间，因为写完后投了稿还得连续观察《人民日报》是否会刊登。而崛川先生正是教科书的撰稿人之一，以亲身的经历，先生一方面反省自己不得已在压力之下“曲笔”而丧失了执笔者的资格；同时明确地指明：一、政府没有检阅教科书的权限，根本不应该进入这个领域，因为这是与日本宪法第 21 条“保障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等一切表达自由”相矛盾的；二、执笔者对发表的著作内容负全面的责任，而不能把自己的“曲笔”责任转移到“政府压力”上；三、教科书是教育青年的书籍，而不是宣传现政权的政策意图的工具。我一方面惊奇日本政府与中共政府的相似，一方面更明白了崛川先生的超越狭隘国家利益的一个历史学者的良知和胸怀。崛川先生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在教科书检阅中特别注意四个领域：侵略历史、天皇制、核能、防卫。而且，为了达到检阅的目的，甚至形成了靠检定制度寄生的中小教科书出版公司等等。

另外，在关于“金大中绑架事件”、日本联合红军的暴力事件以及张振海劫机事件的议论中，先生指出日本的司法机关和政府是首犯，破坏了法律的威严。在重新提及福泽谕吉时，提出他蔑视亚洲（主要是中国）对日本近代化的误导作用。这一些议论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史实公开和学术论争，可贵的是先生的这种反省自身（个人和民族）的求实精神，真希望日本学术界有更多的公正、良知和勇气。当然，不能不提的是，先生主要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我完全是门外汉，不敢妄加评说。略为有点遗憾的是此纪念集中没有评述孙中山（“中山”是日本人的姓）与日本政要的关系，可能是因

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因为不断有史实表明我们这位“国父”确有一些“卖国”之嫌，这一方面的要素恐怕后来为汪精卫所“发扬光大”了。我个人的经验虽然非常浅显，但也大致认为“亲日=卖国”、“爱国良知=反日”这样的结论是可信的。这恐怕是明治维新以来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虽然它是感情多于学术论证的，我本人也宁愿用个人命运把这个问题再弄清楚一些。崛川先生分析了孙中山去世的前四个月在神户的讲演后说：孙中山最后的访日，已经不再对日本的援助抱多大的期待了，更象是在总结自己与日本三十年来的关系，并亲手埋葬了它。我们都知道由此之后的中日关系的推移所经历的苦难，不过，以个人的历史地位而言，在对日关系上，汪精卫自然不提，蒋介石和周恩来都不如孙中山来得干净。今天，日本人如何赞美蒋、周是他们的自由，但请不要忘了是全中华几亿人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战争劫难。

天安门事件以来，有许多日本人表现出是我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朋友，但象先生那样对于中国人民倾注了如此之深的爱的日本人却不多。他在生命的最后期间说：“与日本相比，中国更是我的祖国。”

当杨希尧告诉我先生的这句话时，我的眼角立即湿润了。

[赵京，首发于《民主中国》1992年8月号]

9. 个体人权的尊重与民族主权的平等

——为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基

今年九月，是中国的一部分地域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与此同时，中国的另一部分地域，中华民国被迫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也正好经历了二十周年。今天，当我们透过纷乱的喧哗表象，认清各种政治势力的企图和手段之后，不得不深深地忧虑隐藏在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危机。因为至今为止，中日关系尚没有奠定真正平等、永久和平的基石；也更痛感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期待。

中日关系的危机首先在于政治方面的限制，即北京政府（以及二十年以前的台北政府）、东京政府都竭力阻碍中国人个人（不论其是否持有“中国人民共和国护照”，或“中华民国护照”，或根本被这两个政府剥脱了护照资格的中国人）与日本之间的政治关系。例如八九中国之春之后，笔者经历的活动表明日本政府除了“保护”极个别者以作日本政府官方的鹰犬之外，对在日中国人进行了各种劝诱、胁迫，甚至连中国人的政治避难的最基本人权也不予承认。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政府手中的筹码“日本天皇”如何成为北京、东京政府的玩偶，更可认识到政府之间的“中日关系”于两大民族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益处。本来，正如日本共产党的声明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选举权、只不过是花瓶摆设的“日本天皇”根本不应该成为两个政府间利用的工具。如果那一对夫妇想与广大的日本国民一样去逛逛长城，在兵马俑前开开眼界也并非不可。找一位中国人邀请、担保一下，同时不要忘了为其畏罪不敢前往的老父向中国民众认个罪，肯定不会有什么难堪的。正因为“日本天皇”没有、不应该有任何政治价值，他们夫妇也可以去韩国、台湾、香港等处走动一下，总之，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没有兴趣管他们如何活动，却不得不关注他们被政治利用所从事的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将为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外交活动的展开常常得出违反普通人常识的结局，不过，只要我们盯准利益的主题，一切疑惑就会解明。如果老天皇不敢访中是由于自知罪大恶极怕遭报应倒可理解，其实，凭中国人的天性，倒也不会

教训他的（他去韩国必死无疑）；但是新天皇“上任”以来，第一件仪式就是应该由其主动提出访中谢罪才是人之常理。这种“人之常情”却没有发生在中日关系上，表明了中日关系并没有正常化。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由全体中国人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也就是说，中国至今并没有建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式的国民国家。台北政府自不用提，其首脑连过境日本都不被允许，而自称有资格“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北京政府在二十年前为了求得日本的外交承认，竟卖国到放弃战争赔款的地步，今天又“连续七次以首脑之尊”（日本报道）邀请“天皇”访中。更不可思议的是日本政府在外交上的无知，连江泽民会见“天皇”时发出邀请也不给面子。当然，这是因为北京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使自己失去了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有的尊严，在目前在中美关系的政府级别尚没有正常化之前，处于求助于日本政府的劣势，对于日本的傲慢只得忍气吞声。当然，我们对于今后北京政权如何回报今天日本政府的非礼并不感兴趣，只是要警告日本政府：不要以为在北京政权今天的处境中放出“天皇”的筹码去中国逍遥一圈就可以自吹自骗说“彻底了结了中日之间战争的历史”；如果以将来的民主统一中国的立场来看，“天皇”的访问，严格按法律讲来，还是“非法入境”呢！不过，我们中华民族，非但过去“以德报怨”，今天同样“以恩报罪”，不会像日本政府那样，竟然逮捕乘船来日本的和平、善良的中国公民！

当然，外交关系只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属于政府之间交易的侧面，只是一种反映和结果。外交活动的展开离不开自身的行为限制，如“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丘吉尔语），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外交知识、技能与利益的门外汉，基于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奠定中日关系永远和平、友好的基础。虽然，今天，中日关系的主流基本上由北京、东京政府操纵，被栓绑在二十年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政治交易之中，但不论从历史、文化、地理等各种因素来看，中日关系都应该比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更符合人权尊严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从近代以来，在中日关系上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华民族孜孜以求、奋斗不息的抗争，无非是要求“平等待吾”而已！

中国近代史的各种危机首要地表现在民族主义的危机上，以是否“平等待吾中华民族”为基准，我们在对欧、美、日列强失望之际曾对苏联抱有幻想。不过，自以为帮助中共取得政权的苏联也没有维持住在中国的势力，丢掉了“老大哥”的称号，这个简单的事实，超越了“国家主权”的解释，更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以此可以顺便提醒今天日本政治势力中各种“反共”、亲北京政府、亲台北政府的集团：你们以中国的政治情况达到在日本国内的政治目的是可以的，如果以日本的政治力量达到在中国的政治企图是不会再得逞的，中国民众集近代史悲剧的经验，就是坚决反对日本的任何政治势力的介入，特别是扶植中国的代理人、卖国贼的殖民旧习，更可能会带来日本的灾难。关于这个观点，让我们把中日关系的起点追溯到远远超越二十年前周恩来或四十年前张群的时代，直接地从孙文开端吧！顺便想提请的是，在论及中日关系时，最好不要用日本人的姓氏“中山”二字。

孙文曾经在对欧美列强失望之余，无可奈何地对大和民族抱有最终的乞求，甚至不惜牺牲某些明显属于民族主权的尊严，留下了至今为止的中日关系的阴影。我们至今没有心思苛求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的孙文的选择，他本人最后在日本（神户）的演讲已经彻底表露了他对日本的绝望并对自身在中日关系上的行为进行了清算。按照崛川哲男教授（他是我遇到的有良心和正义感的少数日本知识分子之一）的研究，叫“双手葬送了自己培植起来的中日关系”，此后很快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可称中日关系上抗日战争期的开端，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法西斯帝国的全面投降。我们从这一段期间的中日关系演变中看出，汪精卫傀儡政权在某种方面承袭了孙文对日本的幻想，也更加看清了日本对华政策力图扶持什么样的中国政治势力。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客敢称自己是“亲日派”，而“亲日=卖国贼”也已成定论，这大致是因为日本的任何涉入中国事务的政治势力绝不肯平等待吾中华民族，更不会在人格上认为中国人应该有什么平等，对于卖身求荣的亲日派总是当奴才、鹰犬来使唤，无论其放出的是堂皇的“满洲国总统”，还是今天的“神户大学副教授”这样的残饵。今天，当我提笔之际，正好传来日本法西斯投降四十七周年纪念（也是

南北朝鲜独立、解放纪念日)的钟声。温故知新,我们不得不严正提醒日本的政府和国民:承袭殖民侵略的对外交政策的日本如果再挑起战争的话,只会带来一个结局:日本的毁灭。

正因为日本整个民族的几乎所有势力(日本共产党除外)都参加了对吾中华民族的集团犯罪,所以很反感、很害怕我们谈历史。那么,我们既然以德报罪,更干脆按照神的旨意,饶它个“七七四十九”次,彻底假设中日之间完全没有历史的交流,在这样的“理想试验”中,中日两大民族交往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当然不会超出中国人、日本人都是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这么一个基本事实,而关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西欧人的思考是正确的:不论是卢梭、霍布斯,都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契约关系,其首要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也是自《圣经》以来“天(上帝)赋人权”的近代翻版。这个简单的生活道理,对于接受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开创了人类经济奇迹的大和民族来讲,丝毫不难于理解。我们再准确一些,指出人类历史、地球社会上活动的主题都是个人,而教会、政党、国家等等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附属产物,就可以得出国家(政府)不得剥夺属于个人的基本人权的结论(首出于穆勒《论自由》)。在实际的历史事实中,日本侵略军在屠杀中国、亚洲的民众时,也没有区分其是否是某一特定政府(如重庆政府)的“国民”,也就是说,发生的事实是日本人政府与中国人个人的关系。所以正如最近那些韩国的“慰安妇”(从军妓女)纷纷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日本政府再野蛮,也不能以什么“旧金山和约”、“日韩条约”等不公平的政府间交易中已经解决为借口充耳不闻。那么,我们谈及今天的中日关系,首先是基于中国的每一个个人与大和民族的每一个个人的交往,当然,这些人之中有过好几个政府,这些政府的功能,只应该是帮助处理好个人之间的关系、纷争,也包括个人对政府的要求。

回到现实国际政治中来,我们越来越明晰地看出日本政府很狡猾地利用了(和韩国等地域)的两大严酷的缺欠:(1)国土的分裂;(2)政府的专制、独裁。严格讲来,当中国处于内战、分裂状况的环境下,任何政府级别的对日关系都是单方面的、暂时性的,蒋

介石和周恩来都没有权力宣布全中国民众的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种最基本的人类正义原则。最近，中国大陆方面，由于民众意识的觉醒，已经开始要求日本对中民间赔偿，北京政府的钱其琛外交部长声称“政府不干涉这种行为”表明了它的务实性，因为任何种类的政府根本没有这个权力。作为暂时性选择，我们可以理解二十年前周恩来先生的精明，但是，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的惟利是图的环境下，仍然僵守死去者的诫规就是今天政府智商的倒退；当然，中国政权的某些权势竟然利令智昏，以“老子放弃了赔偿，你该为老子效力”的心理，而利用中华民族的灾难向日本政府要求迫害中国人，彻底暴露其把一党之私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王朝残念，只会把“共和国”引向“大清王朝”的结局。

日本政府虽然一时计谋得逞，声称“除北朝鲜之外，已经清算了战后处理”，但从韩国的反日情绪的高涨来看，可以完全准确的预测到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发达起来的中国民众同样会对日本作出反应。笔者为了日本的将来，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呼吁日本政府尽快把眼光放在中国民众身上，因为中国的十多亿民众才是中日关系的实质主体，日本政府必须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中国民众！应该说，八九中国之春为日本的对中外交政策的转机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考验机会，但日本政府的表现，以及它实际上帮助北京政权迫害、威胁数万在留中国人的行径，使它彻底丧失了中国民众对其现代性、民主性国家体制的一丝期待，告诉了我们在国际化、人权意识高涨的世界里，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国民性的严酷现实，更激励了我们在日中国人彻底建设民主、人权、统一中国的意志。如果有一天，真有一个国际法庭宣判日本国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人人权的话，笔者将第一个进行诉讼。日本政府口口声声“反省过去的历史”而不愿承担其在巴黎西方首脑会议上、在其国会上的“保护中国人留学生”的国际义务，却勾结北京政府迫害那些不认同北京政府屠杀政策的中国人，这样明目张胆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大野蛮行径只会引导我们这些战后出生的中国人在日本几十年前的残暴中去联想：日本今天的对中政策、对亚洲政策与几十年前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这个“故事”只发生在一年前，让我们每一个仍然爱着自己的中国同胞的人平静地为那位普通的、无权无势的中国女性着想一下吧！或许，几十年前，绝对是非法入境的“日本天皇”的军队闯进中国烧死、活埋了她的祖父辈亲人，那些杀人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按照日本政府的强盗逻辑，是因为代表、统治她这样的普通中国民众的两个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了惩罚侵略军的要求！从笔者个人的体验来看，当时正在小学三年级，听到田中访华的消息，绝没有任何念头，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位祖父辈提及战争赔款之事，这是中华民族的善良天性，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到很不好意思提及这样的有损吾中华民族尊严的课题。但是，日本人却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当这位女性为了逃避专制政权的政治迫害、绝对不会对日本带来任何危害地踏上日本土地时，却被日本政府抓进收容村、剥夺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基本人权，强制遣送到北京政府的监牢里！如果说，在这种情形下，日本政府竟然干涉中国内政到这样的程度：它认为北京政府有权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所以才帮助北京政府迫害善良中国平民，那么，中国民众（只有中国民众才有权要求战争赔款！）再善良，也不会愚昧到同意北京政府的卖国外交来迫害自己的程度！宣布放弃战争赔款的实质就是：日本本来应该付给中国民众的赔偿的一部分残羹，由日本政府用于贿赂到北京政府手中了！这可以很明瞭地理解今天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中国的平民被日本政府逮捕（没有护照就可以抓人？）、歧视（什么“不法在留”、“伪装难民”）、迫害（笔者曾截获一国立大学的警告：再搞政治活动就准备以“修业见こみなし”即“没有完成学业的可能性”开除学籍便于日本政府强制遣送）等等，而周恩来却被“中日友好人士”们大吹大捧，日本人怎么不感激周恩来呢？在这一点上，北京政府远远不如汉城的独裁政权，但今天为韩国的工业发达赢得五亿美元资金的《日韩条约》也成为韩国人心中的不公平的卖国条约。曾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人，其政权虽独裁却可称爱国，当时日本人狡猾地提出“物质支援”，送一些轿车、电视机，一方面收买韩国上层（因为平民根本不可能有此奢侈品），同时又控制韩国的工业（因为其部件、技术最终必须依靠日本），却被韩国拒绝，至今不进口日本的汽车。推想中共当局前几年大量进口轿车（据报道，四川省进口轿车的资金竟然高于教育投资），并不是比韩国政府愚蠢没有看出日

本政府的计算，乃是丧失了民族尊严，趁自己官位在手大捞一把而已。

再来看看前不久日本国会违反日本宪法通过的 PKO 海外派兵法案，如果日本真的脱离、清算了其殖民侵略的本质，在今天的世界上派出军队到外国去，这是日本的内政，我们没有任何兴趣。但是，日本政府连在日本国内的受迫害的外国人都肯平等对待，那些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的朝鲜族日本人、汉族日本人至今被歧视没有国籍，把政治犯押送到专制政府的牢里的同时，其派出的军队，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绝不可能是为了和平、救援人道等等的目的，而只是逐步地增强其军事存在，最终依靠其经济实力扩军备战，反过来又以军事实力谋求践踏世界和平的一国经济利益，其结果只会引发全球性的、全面性的纷争，在毁灭日本自身的同时也导致人类文明的完结。从拯救日本、保卫人类文明的意义上看，真正的和平主义者、真正为中日友好忧虑的人，都必然会反对任何海外派兵政策、反对一切政府间的践踏基本人权的行径。与这种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国家恐怖主义相比，“血光敢死队”这样的因受迫害无处申诉的“恐吓组织”又算得了什么呢？应该谴责的是那些逼使善良平民去铤而走险的国家政府的犯罪。按照平等的原则，既然日本政府可以抓捕乘船来日本土地的中国平民，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逮获乘飞机闯入中国神圣国土的包括“天皇”在内的任何日本人——因为他们在我们未来的合法的民族统一国家的法律里也是非法入境的。当然，我们不以日本人的逻辑对付日本人只是表明了中华文明高于大和文明而已，无它。但文明的高下并不能影响所有中国人、日本人之间的个人的人权平等，只有把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定在人权尊重的基石上，才可能获得包括正常政府外交关系在内的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真正平等和永久的和平。为这样的使命服务、献身，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誉。

[赵京，首发于《民主中国》1992年10月]

10. 日本的国家支配构造

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制度、组织、现象，都有其合理的凭据，揭示出这些背后的凭据，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各种权力支配构造是多么地脆弱（因而显得强暴）。日本的“天皇”⁴制度就是这样的典型，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值日本战败投降五十周年，普通日本人每逢此时节，总要提及广岛、长崎，更热心地报道美国五十年前投下原子弹的“罪行”，却不见对于战争性质的全面认识。其实，即使只关注原子弹的投掷战术，如果日本统治阶层真正地为本国民众的生命财物着想，在根本已经失败的命运下应该及早接受波斯宣言。但当时日本的国家权力集团关心的却是“国体”即“天皇的国家统治大权”的变更问题，试图篡改英文翻译，把包含日皇在内的“国体”形态逃避出变革之外，改编仅仅作为“御前会议”执行机构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如果日皇真正具有超越凡人之上的权能倒也简单，因为据说昭和裕仁⁵尚具人间性情不愿见到过多生灵涂炭，问题在于军部分裂成“承诏必谨派”与“神州防卫派”，后者认为“即使一时违反天皇裕仁的意图，在更大的意义上维护皇祖祖宗建立的国体本义才是真正的忠节。”正是后者的现实社会势力才真正构成了支配日本国民的“天皇”制度，如果没有能够不惜发动国家强权从事自杀行为的实际势力，日皇用以统治、镇压民众的威力就不可能存在。有时候，统治核心集团会用曹操“借用粮草官头颅”的手法压制下极端的皇道派以便

⁴日本语言中繁杂的敬语（分为尊敬语、谦让语、丁宁语等）体系就是支配意识的浸透，日本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必然发展成对“天皇”的控诉。以下的论述，为了简便，不特意对日本用语加上引号或改为公正的中文翻译（如日皇）。

⁵关于“天皇”的知识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体现，如日皇没有姓只有名！因为日本的姓名制度本身就是君臣关系的象征，臣（即普通日本国民）由君主赐与得到的姓氏只不过为了国家管理（征兵、粮食配给等）的方便，决定了日本户籍制度（家庭、婚姻、财产等都与此相关）的性质。那些被赐予“井上”、“木下”或“田边”姓氏的人倒也罢了，那些被赐予“熊取屋”（猎熊的傢伙）、“お手洗い”（厕所）姓氏的家族世代都让人知道其出身。朝鲜人被强制使用日本姓氏，以及出生日期等被统一成皇历年元，都出于统治集团的同同意志。

来推行专权，如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事件，压制了少壮派军官的野蛮政变反而赋予了日皇绝对的专权，使其得以取消反对政党和新闻自由，达到超过政变所要求的政治统治目的。

如果仅从日皇的政治功效来断罪，正如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德田球一等人的《告人民书》中所提示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打倒天皇制，树立起基于人民总意的人民共和政府。长期以来的基于封建意识形态的军事警察专制，把人民当家畜以下来处置的残虐政治、殴打拷问、牢狱、伴随着虐杀的殖民地榨取等，与军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菲律宾等岛的侵略暴虐，以及世界天皇的妄想，都内在地密切相关，正是天皇的本质，他们的自家广告的文词反而暴露了其欺骗性。这样的天皇制，即天皇与宫廷、军事、行政官僚、贵族、寄生土地所有者以及独占资本家的结合体，如果不一扫而光的话，人民就不会获得民主主义的解放，世界和平就无法确立起来。”⁶但是，日本战败的结果并不直接是日本民族以及受侵略的亚洲民族的解放，而主要被转变成美军的占领政策，这个政策的决定正好受限于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新的对立背景，使得日皇的存废本身不再由日本国民自主选择，而从属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为此，导致日皇得以残存的另一侧面——文化传统——被夸张起来以掩盖其扮演的政治的历史角色。

以神道为名称的意识形态，本是与日本文明进步无关的皇统文化，除了关于如何支配民众之外并没有什么物质或精神的内容，论其起源，与别的民族的原始社会并没有太大差别，⁷即发源于巫术鬼神。《魏志》的倭人传部分记载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能事鬼道以惑众”，即提出证明，日本小国群立的王权首先出自巫术的能力。日本的天皇制度，大致是在容忍小国王权支配的基础上间接支配民众，并吸收中国大陆的文化强化中央集权性的古代官僚国家体制而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皇作为国家君主的同时继承了最高司祭的祭祀大

⁶德田球一等：《告人民书》（1945年10月10日），引自《昭和史全记录》，每日新闻社，1989年2月版。

⁷日本战前的中小学教科书里完全没有原始社会的历史，似乎日本的历史开始于“神代”，即先有国家，才有国民的发生、文明的发生。以下的记叙多引用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岩波新书367号，1959年版。

权，本来是日本“国体”自弥生时代以来没有清算掉的“隔代遗传”，当皇权真正发达起来时并没有兴趣顾及此职能。只是当皇权的政治角色被取消之后，可被作为文化职能的司祭角色反而重要起来，实际上成为它的唯一政治功用的发挥场所了。具体地看，日皇得以充任最高司祭的神道虽被封为日本的民族宗教，好像可与佛教、儒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并列似的，其实它既没有教义、经典，又没有正式组织结构，只不过继承了一些旧来的巫术礼仪在镰仓时代以后被人为地制造出来，成了为日皇统治服务的精神鸦片。这些巫术礼仪行为中，略具社会意义的是就是春耕开始时的祈年祭和秋收时的新尝祭，这种民族宗教只是一种村落的农耕行为，并没有固定的设施或强制，主要是到了明治（1868年）以后，天皇绝对主义的国家官僚专制统治形成，从制度上保护、强化了作为国教的神道的形成。例如在每一次大规模地动员民众资源·生命投入与外国的战争之后就在神社中设置醒目的胜利纪念碑⁸供民众参拜，完全脱离了民族宗教的本色。成为固定、具体物质设施的神社，配合国民教育的皇权思想，有效地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近代历史中扮演了御用角色，最终成为军国法西斯主义的国权手段。

带有神秘威势的靖国神社是这个国权神道的集大成者。1869年（明治2年）6月29日，在东京中心的九段坡上占地约九万九千平方米的所在由明治天皇下诏奠基“东京招魂社”，并于十年后基于由美国“黑船”舰队出现带来的欧美列强的威胁与刺激，由天皇正式赐名“靖国神社”，为即将来临的日本国民的牺牲提供国家权神的祭典基地，同时也揭开了靖国神社至今为止的罪恶与可悲的历史。明治



⁸1991年，我在岛根县的一个渔村调查时第一次注意到神社中“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纪念碑在地方村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后常常在人迹地僻的地方遇到它们。围绕着政府应否资助神社发生了不少关于宪法的诉讼（如箕面市），至今还没有分出胜负。

天皇十一回，大正天皇五回、昭和天皇五十四回亲临靖国神社，加上不计其数的以皇室大祭、合祀祭为中心的“英灵参拜”活动，形成了公开的（或暗示出）日本国民的“靖国神社史观”，在各个层次统治、支配、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生活。除了神社设施本殿等外，游就馆（取意于《荀子》劝学篇“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与靖国会馆（原为游就馆附属的国防馆）的内容显示出靖国神社完全超逸出任何意义的宗教职能，是十足的皇权军国主义的遗传。如果把那些法西斯军国主义强权的历史记述也连同遗迹实物一同陈列在华盛顿的“集中营博物馆”的旁边，那么，我们将会认识到这个比纳粹迫害犹太人更普通、漫长的罪恶现实：日本的国家权力如何在践踏、侵略不同民族的同时剥夺掉自身民众的基本人权。

靖国神社的祭典中仍然保存着古来民族传统的祈年祭、新尝祭以及春季、秋季例大祭、但它的引人注目的仪式当然是每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御灵祭和八月十五日的“大东亚战争终战”纪念活动。每到了这个季节，在以天皇历史、战争遗族为中心的“英灵”悼念活动中，实际上根本看不到祈求和平的良心，而笼罩着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刺激整个日本政治的宣泄，他们达到了过去天皇专制下极端少壮派军人的功效，引导整个日本政治的翼赞、右倾体制的形成。当然，从“会报”、“战友连”（全国战友联合会）等传单可以知道，自从战败政教分离以来，靖国神社的存立也不容易，虽然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界名人的支持，但丧失了“国民神社”地位的靖国神社唯一能够打动人心的就是那些同时作为加害者的战争受害者（以及家族）的感情。作为战争的性质而言本来没有多余说明的必要，但统治集团却相当成功地把天皇·国权等同于国家·民族，使得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抱着为国（其实是为天皇）的信念开赴战场或承受牺牲。甚至，如果我们只观察某些细部表现，那些为了战友、为了同胞而选择牺牲的每一个单独的日本民众（而不是统治集团成员）体现了人类的善良、高尚的性格。正如《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的那样，普通善良的民众常常身不由己地被置身于对立集团（民族、国家、宗教等）的悲惨命运之下，我们不能绝对地以“侵略战争”定性而全盘否定被迫附属于某一集团之中的民众的行为。那些死于战争的三百多万日本人中

的大多数民众虽然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更大程度上，他们与被侵略的中国等亚洲民众一样，是日本天皇·军国主义的牺牲品，⁹理解并同情他们（特别是广岛、长崎的死难者）的立场、感情，也是我们这些受侵略民族的民众不被新的国家权贵利用为“爱国主义”手段的责任和良知。当我们看到那些战伤者、战死者家属，¹⁰那些跪在路边行乞的老兵，深深为日本这个民族忧虑和悲哀！因为按道理，日本国家在惩治日皇等战争犯人的同时给予普通受害者以国家赔偿（因为他们是被国家权力支配从事战争的），自然使义理分明、社会公正得以伸张；但日本统治阶层却不肯放弃对民众的支配，首先竭力保存下天皇制，然后又利用东条等军事战犯的自杀“尽忠”行为，¹¹把他们打扮成为国民英雄，这样，祭典放置东条等灵坛的靖国神社就完全成了军国主义教育的道场。“靖国神社的英灵”过去成为停战、和平的阻挠与借口，今天则强制日本国民不去反省、认识自身的犯罪行为。

明治以来，御用文人伦理学者们找来武士的道德作为日本人的光荣传统并赋予其“国民道德”的地位。但“武士道”并不同于出家武士的道德，出家武士的道德在实际历史阶段中存在并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有武士对主君（但不是天皇）的直接忠勤，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主君对武士（离家来京的单身求职者）的义务。两者的关系与其说是奴隶主与奴隶的隶属关系或封建领主与农奴的从属关系，倒更象今天的资本经营者与职工的契约关系，我们在外表行动上看见武士为

⁹据藤原彰《饿死的英灵》研究揭示：二战中死去的230万日本军人多数并非战斗死亡，而是饿死、病死的。见日本新時代社《かけはし》周刊2001年9月10日第1697号或本书前面的读后感（平井纯一）译文。

¹⁰我在大阪大学人间科学部的五年半学习期间，与守门的川端老人接触较多，因为日本大学的文科师生都不常来学校，职员都按时上下班，只有我经常留在大楼里与老人聊天。他在上海作战时左腿受伤，幸好国家照顾他给了这份工作，使他得以度过晚年。

¹¹原陆军省兵务局长（宪兵）少将田中隆吉在《直言太平洋战争的败因》改订版（长崎出版1984年5月发行）中谈到远东裁判时，叙述了日本上层如何说动（许诺把东条等人的死说成是舍身护皇）并达到让东条等人“成仁”的效果。刚开始时，战犯们尚持“天皇无罪、自己也无罪”的态度，但他们的阶级身份已经决定了只有为天皇分罪才能最终解脱自身的命运。

主君在战场上卖命，实际上在战斗之前存在着计算恩赏的军忠状，武士的道德正如我们今天的商业道德一样，并没有“绝对献身”的性质。在这种双向性的契约关系中，主君方面也负有同武士一样的道德义务，即在战败时尽可能把后果承担起来，甚至以自杀等行为来求取胜利者不虐待自己武士的承诺。例如日本人认为是“忠臣典型”的赖朝家臣富山重忠，刚开始是平家的家丁，参与对赖朝的讨伐，后来因为赖朝提供的条件更高而“跳槽”。如果忠实地按照这种武士的道德，在天皇与国民的关系上，裕仁简单地自尽好了，¹²或者宣称放弃皇位并废弃之，也可算“立地成佛”吧！

武士道把主从关系规定为无条件的“献身的道德”，就不再与世俗生活中的武士的道德相同，而完全是国家统治阶层人为制造出来的借天皇的绝对权威统治民众的政治制度。¹³这种由皇室御用的“文化”传统越被强调为“国体的精华”、“万邦无比的日本精神”，就越严重地阻挠真正的日本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历史上，朝廷也曾对佛教的“镇护国家”功能抱着过分的期待（741年圣武天皇），与个人修行达及正果的佛教经典并不相关，此举被后来兴起的净土宗（1224年）改革所扬弃，日本朝廷才转而制作神道。神道由对天皇个体的崇拜，转化成对以天皇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服从。明治以来，除了国家机器中的神道灌输外，统治阶层很容易在初期阶段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用国家权力对其注入神道的精神，以支持财阀的形成。¹⁴日本的财阀虽经战后美军的强制解散，但很快就在大藏省等的推动

¹²不必假意在麦克阿瑟面前表白，以“感动”对自己握有生杀大权的战胜国将领。日本的御用学者甚至声称麦克阿瑟本打算惩办裕仁，但为天皇的德行感化而改变念头。

¹³参见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第五章 封建社会成长期的文化，岩波新书 367号，1959年版。

¹⁴至今，以银行为中心的日本大企业在每年度新职员入社仪式中都要去神道设施参拜。1992年3月我以“新入社员”的身份体验过这一场景，也记得一个银行管理阶层职员向留学生推广神道文化的热情。神道是日本大型商务活动中旧来的一种信赖保证，背后必有政府的默许。近来，这种情况开始改变。

下再行合并或形成“系列”，¹⁵把位于“系列”下层或“系列”之外的中小企业排除在正常竞争的市场之外。

日本政治构造从明治以来的发展结局必然是战争的投降，它为日本政治构造带来了新生的转机。从形式上看，新宪法虽然由于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国的内战悲剧（蒋介石政府为了获取内战的胜利不可能具有代表全民族的对日政策）保留下日皇使之继续存在，但从主权在民、基本人权保障以及和平建国的基本理念里，提供了日本社会在各个领域里不断斗争和改进的可能。实际上，战后日本社会的许多进步法律的制订如工会组织权利、罢工权利、男女平等权利等等，都是民众通过一次次的斗争，最终迫使统治阶层让步，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进一步保障了普通的国民不必再经过艰苦的挣扎也能享受一部分宪法的恩惠。除了外部环境，民主主义（如解散财阀、制订《反独占法》）正是日本经济快速复苏、成长的最根本保障。但日本的民主主义在政治上并没有得以顺利展开，比当初制订宪法时的期待反而退化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对日占领政策完全操纵在美国政府手中，美国很快放弃了改造日本社会的兴趣，转而支持、鼓动反民主主义中的亲美势力的抬头。如果战前的皇道派右翼中起码还包括有部分反抗美、欧在亚洲殖民的民族主义倾向的话，今天残留的民族主义者已被列为政府通缉的恐怖分子（如“日本赤军”派）。¹⁶

日本民族从根性上讲，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种族，那些驻留在日本的140处占地10亿平方米，每年花掉日本国民6千亿日元税金的美军基地就是日本尚无政治主权的证明。前不久，那些为美军基地服务的日本工作人员要求按照日本的新法律缩短劳动时间，美军就要求日本政府再增派3千名工作人员（达到2万5千人），一向精明善于算计的日本人对此并没有什么反抗和疑问。¹⁷我们看到，近年来反对扩

¹⁵ keiretsu 已成描述日本企业特征的专用英语词汇。

¹⁶以东京都知事石原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右翼有时也以民族主义的面孔对美国说“不”，主要目的是向美国讨价还价，并不敢挑战美国。

¹⁷1994年8月我们兴致勃勃地登富士山，在山脚下御殿场市的公路上突然目击了正在演习的全副武装的美军车队（黑人士兵的脸部看得很清楚，我们本能

军的各种努力很轻易地被代表大财阀利益的日本统治阶层¹⁸所击破（如社会党的“牛步战术”在国会中拖延但未能阻止海外派兵法案的通过）。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的反民主、反人权政策正好成为日本、美国扩军备战的最佳借口，日本国会、政府在天安门事件问题上，在战后五十周年的决议上坚决不肯明确表态（担心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在反对中国的核试验方面却丝毫没有暧昧，在南中国海域的争端中异常兴奋地报道中国的军国主义威胁。

日本有能力与意愿继承美军在亚洲逐渐减弱的势力空白，但它缺乏亚洲各国的容忍（如连亲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政府都反对美军的撤离）。在亚洲各国尚未达成国民主权与基本人权之际，协助这些国家的政府共同抑制亚洲民众的奋起（其中必然包含反日要求）、收买拉拢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僚，就成了日本达到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外交手段。如日本的 ODA（政府开发援助）资金的运用，最近开始被用来配合日本的上述政策（如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政府表面上为 ODA 加上“人权、民主”的条件，但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各国宣言制裁，唯独日本政府不动声色，一九九五年却又以中国的核武器为理由要删减 ODA 数额。当然，中国政府还没有堕落到完全被日本收买的程度。不过，这种最后由两国政府的幕后交易种下的祸根最终会引发两国国民感情的敌视与对立。

近几年来日本政治构造的迅速保守化、右倾化、国权化，超出了人们的一般预想。其没有进一步达成宪法理念的政治构造正把日本拉回类似战前的轨迹，简单地从国会级别的政治势力看，过去最大反对党社会党在日皇、国歌·国旗、自卫队定位、安保条约等重大政策方面完全堕落，与自民党没有区别，公明党、民社党等反对政党则完全

地恐惧那枪口是不是会转过来对准自己），这才是象征日本和平的富士山的政治实情。

¹⁸今天的日本统治阶层主要由国家官僚主导，例如在关于海外派兵与否的争议期间，日本的外务省和防卫厅（连文部省也参与了）就早已着手派兵的准备，甚至让假意反对派兵的公明党议员去参观“和平维持部队”训练。在海部首相还难以下决心时，由外务省事务次官（最高行政官僚）等以既成事实促使他批准。

蜕变为强权政治翼赞势力，只有共产党不改初衷，略为吸收了一些革新民众的支持，但其狭隘的意识形态与缺乏民主的组织运营方式注定了其不会获得更大的空间。一个不承认亚洲民众基本人权的日本正迅速地向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强权膨胀，再考虑到没有达成民主主义的中国民族主义随着经济发展的增长，亚洲地区的和平尚没有奠立起基于民众间相互尊重、平等的保证，新的更大的危机正逐渐明晰起来。

19

[赵京，1995年8月6日，静冈县三岛市]

¹⁹此时，正好从电视上传来纪念广岛被炸五十周年的祈祷和平的钟声，我也由哀地为日本的民众祝福，期待他们早日得以摆脱国家统治强权的制度以及精神的奴役，成为亚洲民众可以信赖的人类同胞。

11. 从加藤、志位对话看日共向自民党接近

山田明人

1997年1月10日、11日的《朝日新闻》登载了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志位和夫与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紘一的“广泛对话”。自称遵守政治节度、讲究道理的日共会怎样与自民党展开议论呢？让我们看看以“民主规范”和“安保、自卫队”为中心议题的自、共对决是怎样一回事吧！

一、民主规范与庞大政府

首先、加藤向志位道贺，说通过这四年来的政治混战，结果只剩下自民党与日共这两家老铺。加藤话锋一转：日共总不能老是抵抗，也该具有建设吧！志位答复道：“共产党从来没有甘居于抵抗政党的意思。我们前不久刚出版的《新日本经济的建议》就主张改善现在的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方式、制订出欧美那样的民主规范制约经济活动。这样就可以同时提高国民生活又发展经济”。也就是说，日共不想打倒资本主义，而是追求欧美那样规范的“民主变革”，它随时都准备好对案，从抵抗政党向现实政党过渡，以改善停滞的日本经济与国民生活。这是彻底的屈服于大资本支配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改良主义主张。

加藤把日共引到“现实建设性”的立场与“民主规范”的主张之后，又批判日共“反对行政改革”。本来，从九七年度的财政预算来看，自民党议论别人的“行政改革”政策，已经够无耻的了。这位自民党干事长引出话题：“这也是一个制造规范的议题。我们认为政治干预经济过多，所以正缓和节制任其自由，而共产党却要强行再分配财富、强化节制，是一个反对行政改革、反对缓和节制的政党，与自民党正相对立”。也就是说，自民党主张小政府，日共主张大政府。

且看志位如何反驳：“不，我们并不是无原则地要求强化节制。那些对于国民生活反动的有害无益的管制应该取消，但要保持那些保障弱者公平竞争、雇用的制度。桥本首相不也说‘无原则的变动制度会带来混乱’吗？”

这就是对加藤的反驳吗？无论是“缓和节制”还是小政府论，都首先全面认同市场经济、弱肉强食的社会，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全面屈从。日共要求的“为了国民对经济加以民主节制”，与桥本的说法相差多少呢？如果它真的对“民主节制”有自信的话，本该明确承认大政府的立场。实际上，它至今为止的斯大林式的国家论就是大政府论，以各种各样的国家政策实现大众社会福利保障；它不断赞美俄国革命的意义在于社会保障制度、强调福利国家论的价值。

但一遇到“行政改革”，日共就不敢坚持大政府论了。作为“现实政党”，面对如此深刻的财政危机，不得不考虑“行政改革”。不过，这可不容易含糊过关。加藤追问道：“当然，要尽量减少负担，在最终决策上，我们选择自由活动，共产党朝着控制事态的方向行动。这就是将来的两大政党时代的最重要对立轴”。

不过，自民党真想实行小政府行政的话，加藤首先必须解释自民党今年度的预算案：提高消费税、提高医疗负担、在国家财政赤字的情况下不大幅裁减公共事业、原案通过新干线工程、继续农业的差价政策等等。自民党做了哪一件行政改革的实事呢？它有什么资格批判日共“反对行政改革”呢？但是，志位却不能从正面批驳加藤的虚伪，因为日共反对的只是大公司独占的公共事业，并不反对中小企业承包的公共事业（反而要求扩大）；在保护（衰退的）农业方面，日共比自民党更热心。志位被加藤一路穷追：“共产党只是个混乱政府而已”，他只能申辩道：“不。如果将来自民党认为国民负担率在45%与50%之间的话，我们也可以认同45%”。

日共就这样认同、自满于与自民党的接近、卑劣地屈服于自民党，哪里可见“对决”、“反论”呢？

二、安保与自卫队分离的考虑

这个对话里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安保（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与自卫队问题。志位把废除安保条约与解散自卫队分离考虑。当加藤问到如果日共执政是否保持一定的自卫军队时，志位回答道：“不，日本虽然有自卫权，宪法第九条却不允许保持常备的军队”。“废除安全保障条约后，日本变成非同盟、中立、独立，亚洲的局势会一下子变

得和平起来。不过，也有人认为废除安保条约后自卫队仍然必要。所以，我们主张在废除安保条约后不立即解散自卫队，而是等待国民总意成熟再逐渐解散”。

让我们不去管“亚洲一下子变得和平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愿望，因为这里提到的分离安保条约与自卫队问题、废除安保条约后自卫队暂时存在的发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是承认自卫队的第一步吗？后面加上“国民总意”的说法，与过去的“民主联合政权构想”时的“在国民总意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前进”提法同出一辙。如同它过去用别种提法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埋没于现实政治一样，今天日共已经开始部分地承认“违宪”的自卫队了。

其实，日共已经承认了“民族固有的自卫权”，作为这一理论的归结，承认“自卫军队”并不离奇。志位本人就理解宪法虽然不允许“恒久的常备军”但允许“非恒久的军队”，那么，废除安保条约后（这样的情形谁能保证不发生呢？特别是将来，日本很有可能成为军事大国后从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中“自立”出来），日共会“暂时性地”承认自卫队的存在。志位面对加藤的“共产党中也有人主张‘废除安保保存自卫队’吗？”提问答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中，是有这样的人”。实际上，这表明日共正在争取这部分人的选票，日共自身同时也变得不一定反对自卫队了。

狡猾的加藤下结论了：“这是共产党的最引人注目的、安保废除之后仍然可以保持武力的发言。这不是最危险的自主防卫论吗？再进一步就是军国主义了”。

冷战后欧美各国的军事力量竞相削减，而独有日本的军事开支不断增大，但统治这样的日本政府的自民党竟能指责日共是“自主防卫”、“军国主义”！无论志位怎样分辨，日共既然承认了“民族自卫权”，当然要考虑安保条约废除之后以自卫队为中心的“自主防卫”问题了——当然，其要防卫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或“工人国家”，而是独占资本支配的国家。原来，日共至今为止对自卫队的非难在于自卫队没有防卫日本而是成为美国霸权的雇佣。那么，安保条约废除后自卫队就能防卫日本吗？这就是事实上的“自主防卫”论，

与自民党鹰派、右翼的主张重合。日共的分离安保与自卫队的民族主义路线，归结到承认独占资本的军队（自卫队）的地步了，它告诉我们：日共多么接近于自民党。

三、“对决”还是“互送秋波”

志位接着说：“五五年体制下，自民党与共产党在对极上，中间夹入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政界再编的过程中，自民党分出来一部分把社、公、民吸收吞并。……长期来看，自·共对决成为政界的主轴”。

但从政治的实际来看，自共与其说是“对决”，倒不如说越来越接近了。两者的接近在去年的国会中颇有成效。志位提请加藤注意日共去年国会中在“住宅专门会社”议题上的对应（特别是致力于“国会正常化”的表现），说要把论争弄得简单易明一些。加藤回答：

“赞成。我们也接受简明论争应战。去年的‘住专’问题，确实应该给予共产党一定的评价”，让志位感到很自得。不过，那次日共的对应，实际上帮了在去年预算案上无法自拔的桥本政权的大忙。日共表面上说“自·共对决”，实际上在各方面都帮助自民党执政。正如志位所说：“国会在‘住专’问题受新进党骚扰陷入胶着状态时，我向你呼吁正常化、使国会朝着建设性的方向进展。今后请以这样的新视野共事”。最后，当加藤表露自民党今后要“不通过经营者直接与劳动者沟通”时，志位也声明：“我们也会与商工会议所等处的经营者阶层对话的”。这样的“对决”，在劳动大众的眼中，叫“互送秋波”。

最近，新闻媒介也开始吹捧日共了，其内容却都是腐朽的论调。在“自·共对决”的虚伪看板下面，实际发生的只是日共单方面地向自民党的靠拢与“暗送秋波”，单方面地向自民党、独占资本支配的卑劣屈从。

[赵京译自日本《海燕》周报 1997 年 1 月 19 日 614 号，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7 年第 3 期]

12. 作为帝国主义渗透手段的日本对秘鲁经济援助

隅谷优

一旦占据秘鲁首都利马的日本大使馆，“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MRTA游击组织即宣称：日本的经济援助只是为一小部份人服务的。日本外务省马上发表申明反驳。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现拟就日本对秘鲁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研讨其政治、经济功效。

人质中的援助相关人员

1996年12月17日占据事件发生以来，MRTA释放了几次人



质。在12月22日第二次释放人质中，包括日本企业上、下水道设计的职员，他们是担当利马首都圈上水道修理与下水道紧急处理的咨询技术员。

这是日本ODA有偿援助（用日元借款，用日元偿还）84亿2700万日元的项目，世界银行也分担了1亿5千万美元，于1996年3月正式投入。秘鲁的首都圈集中了全国2300万人口的30%，上下水道的普及率只有50%左右，而且设施都非常陈旧，地下水污染严重，未处理的污水流入河川，严重恶化了卫生环境。1991、92年传染病蔓延，几万人城市人口病倒。很显然，上、下水道修理是一件紧急的工程。

MRTA释放这些技术员，据认为是出于“人道援助”的考虑。同一天，国际合作事业团JICA的两名职员也被释放了。JICA是外务省管治下的特殊法人，负责派遣各领域的专家，训练研修生并无偿援助各种开发调查。1991年7月，三名JICA农业专家遭到游击组织的杀害以来，JICA停止派遣长期住留的专家，在占据事件之前，正考虑再派遣这类专家的可能性。游击组织这样快就释放JICA职员与上下水道公司技术员，也是考虑到这一层理由的。

2月16日为止，扣留在大使馆里的日本人人质，除了以青木大使为首的十二名大使馆员以外，几乎就是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丸红、松下电器与丰田汽车等大资本企业的当地头目了。据报导，占据行动的最高指挥官塞尔帕说：不会释放残酷压榨劳动者的家伙。他们区分对待人质，很显然就是为了确保“保释金”，也唤起舆论的同情。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除了属于“社会开发”援助（教育、医疗、卫生等）的上、下水道修理外，1993年还决定贷款22亿日元帮助设置公共医疗设施向低收入阶层提供服务。最近数年来，这样的援助，不仅限于秘鲁，不断增加，从1991年的12%比例上升到1995年的27%。与此同时，日本援助的主要款项，仍然集中在海湾港口、机场、发电、通信、铁道、公路等经济基础建设项目，其比例由1991年的40%上升到1995年的44%。

对秘鲁的援助也呈同样倾向。至1995年为止，以社会开发为中心的无偿援助实施396亿日元，技术援助实施337亿日元。与此同时，日元贷款累计达1875亿日元，其半数以上都是用于对应债务危机的“政策性金融”，除了七十、八十年代的大规模开发项目，没实施多少援助。

1995年开始实施基建项目援助，首先批准了港湾建设的388亿日元。1996年8月桥本首相访问秘鲁时，作为“礼物”带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621亿日元贷款，重点是基建项目：利马南部的下水道修建（127亿日元），建设水力发电所（330亿日元）与修筑地方公路（164亿日元）。与此同时，1995年日本向秘鲁的输出达到280亿日元，其中汽车等运输机械占58%，再加上别的机器类达到86%。输入额500亿日元中，铜等金属（原料与加工品）占67%，食品占22%。

从资本的分布看，日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金属关系投资，丸红与加拿大企业合办精炼亚铅、三井金属矿业与金属矿业事业团开始采矿

（铅、亚铅）、探矿（铜）。这两个公司的当地支社长都被扣留作为人质至今仍在大使馆内。

1995年9月秘鲁的外国投资达到48亿美元，其中旧宗主国西班牙占46%，其次美国占17%，日本为4千万美元不及1%。不过，以基建为重点的经济援助，具有促进企业投资（资本输出）的强有力功能。例如日本对越南的基建项目贷款从1993年才开始，但到1995年一举达到1730亿日元。日本企业的投资紧跟而至，从1993年的4千6百万美元一下子增加到近100亿美元，成为最大的投资国家。对秘鲁的投资虽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惊人效果，日本的国家资本输出（日元借款）用于基建项目，为“民间”独占资本的渗透创造了很好的投资环境。

藤森政权下援助大增

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秘鲁在所有的中南美各国中得到日本突出的援助。这是在藤森上台后发生的，从日元借款数字看，到1990年度为止累计不过472亿日元，但藤森上台后第二年的1991年度就达546亿日元，到1996年度为止，累计已达2496亿日元。与此同时，日本对巴西（秘鲁人口的七倍）的援助至1995年度为止是2322亿日元，对墨西哥（秘鲁人口的四倍）的援助至1995年度为止是1450亿日元，可以看出日本对秘鲁的优待。1995年度日本对中南美33国提供17918亿日元的有偿、无偿与技术援助，其中秘鲁占14.3%，仅次于巴西的16.2%。现在，日本正在对全世界12个国家（年度协议对象国）进行全面性的重点援助，其中亚洲占9国，非洲占2国，中南美洲的唯一国家就是秘鲁。

当然，日本的援助对象仍然倾重于亚洲，1995年亚洲占54.4%，非洲占12.6%，中南美洲占10.8%，中近东占6.8%。不过，与1990年相比，虽然全体增加到1.14倍，但中南美洲增加到2倍多，这其中以对秘鲁援助的增加最为显著。另外根据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的统计，1994年发达国家对中南美洲的援助总额为45亿美元，日本

占 18%，仅次于美国的 30%。从美洲开发银行（IDB，对中南美洲各国的开发资金进行融资的地域开发银行）的出资率看，日本的 22 亿美元虽然远不及美国（270 亿美元），也比德国、法国（约 10 亿美元）高出许多。

总之，说日本政府通过经济援助支撑着藤森政权并不过份，这就是游击组织的反对目标。

援助的政治战略化

1995 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量是 2500 亿美元，其中 ODA 占 600 亿美元（日本从 1991 年占四分之一以来，一直是世界第一）。另外的 1900 亿美元是对各国的输出信用机构的融资（OOF，其他政府资金）与民间资本，比 ODA 的条件苛刻。所以，不应过大评价 ODA 的影响，相反，如上所述，ODA 的功能更在于促进投资的“经济战略”，日本的情形特别明显。同时，ODA 作为“政治战略”工具的特性也越来越明显。1994 年的数字表明，美国为了与以色列维持坚固的同盟，向中·近东援助是世界援助总额的 43%；法国由于旧宗主国的关系援助非洲（占 28%）和大洋洲（占 47%）；德国为扩大在原东欧圈的影响，负担了欧洲的 29% 的援助总额。1990 年至 91 年的海湾战争时，日本提供 110 亿美元的战费和 20 亿美元的 ODA 给周围 3 国，明显用于反伊拉克的政治目的。为了进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非常任），日本在去年选举为止的几年内，向非洲各国紧急增加援助以获得选票，向帝国主义大国的道路前进了一步。

为了隐瞒这种野心，日本政府于 1992 年制定了 ODA 大纲，规定在提供援助时“留意”受援对象国的军事开支增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开发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状况等。²⁰日本政府实际上也以上述理由停止了对尼日利亚、苏丹、海地、危地马拉等十多国的援助。但对军事政变的泰国、残杀东帝汶住民并镇压反对党与劳动运动的印度

²⁰ 译者注：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的对中政策（包括对待我们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受到国际指责，制定此大纲应付。

尼西亚，却丝毫没有追究。对于秘鲁，当藤森于 1992 年 4 月强行解散国会时，日本没有任何反应。对于日本而言，最高政治就是确保独占资本的利益，那些政治经济上关系密切的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独裁体制，都不会影响援助的实施的。这就是援助的战略随意性。

“援助”真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借款竞争，日本也以政府、特殊银行，财阀的形式提供了巨额贷款（特别在铁道权益的获得方面）。当然，今天的融资条件（1995 年度平均利息 2.54%，平均偿还期限 29 年）与那时不同；不过，现在的独占资本主义各国的援助仍然是扩张本国权益的有效重要手段，日本对中南美洲援助的增加，表明它的帝国主义扩张伸到亚洲以外了。

外务省 1996 年版《O D A 白皮书》中，强调人道性的“以人为中心的”开发援助理念。确实，O D A 中也有“人道援助”项目并有所增加，但这只是为了缓解发展中国家民众对日本企业露骨渗透的反感而已。M R T A 对日本 O D A 的批判揭示了这一点，使外务省无所适从不能有力反驳。当然，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不能指望政府的对策，只能依靠建立劳动者政府、依靠民众之间的真正的支援与团结。

[赵京译自日本社会主义劳动者党机关报《海燕》1997年2月23日第619号，首次发表于《中国与世界》1997年11月号
www.chinabulletin.com/z/zs9711e.htm#4]

13. 《被封锁的对话：秘鲁日本大使馆占领事件反思》书评 平井纯一

1996年12月17日，日本在秘鲁大使馆招待秘鲁政府官员、各国驻秘鲁外交使节、日本驻秘鲁企业主管等，召开盛大的庆祝日皇诞生宴会，遭到 MRTA 游击队的奇袭，被一网打尽，全部成为俘虏。整个事件持续了 127 天，直到第二年 4 月 22 日 MRTA 全员遭到枪杀为止。

那是整个日本新闻界为之关注的事件，此书的作者小仓英敬当时作为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一等（政治）秘书也成为人质。与众不同的是，小仓虽然是外务省职员，但同时又是秘鲁现代史、现代思想史研究者，他利用这次事件，在占领期间与 MRTA 队员不断交流，对支配 MRTA 运动的思想意识、今日拉丁美洲的社会矛盾及其解决展望，都有了特别的理解。大概没有别人比小仓更能对此事件“实事求是”了吧！

首先，与日本媒介赞美藤森的大合唱相反，小仓对秘鲁藤森政权的军事“解决”行为进行彻底批判。第一，藤森政权面对许多外国政府、红十字会、罗马教厅等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正式接受加拿大（其驻秘鲁大使本身成为俘虏但也得到释放）等第三国际机构的调停，但实际上只是以此欺骗国际社会的视听；第二、日本政府事先也没有得到通告，其驻秘鲁大使馆遭到秘鲁军队的奇袭，是又一次“主权侵犯”；第三、秘鲁军队对于毫无反抗准备、已经被解除武装的 MRTA 队员十四人全部现场格杀，是犯罪行为。这不由得使读者再次回忆起 MRTA 游击队的革命人道立场：他们当场释放了妇女、儿童以及普通职员；对于俘虏人质，也没有任何虐待和杀害。唯一的不足是藤森本人当晚没有出席宴会。

过去日本政府在处理日本赤军劫机事件时，表现出尊重人质安全“一人性命重于地球”的口号，但这一次除了“全面拥护藤森总统与秘鲁政府的决断”外，一气展开了“强化危机管理”、“自卫队与警察特殊部队海外派遣”的论调。如果与同时进行的美日防务指南修订关连法案的制定等联系起来，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反对恐怖主

义”、“痞子国家”主权限制论等旗号下迅速展开的帝国主义性质全球化特征。MRTA事件是继墨西哥萨巴提斯原住民抵抗运动后，反抗全球化进程的第二个政治性典型事件。²¹

作者把秘鲁的全球化与五百年来的欧洲征服联系起来，指出秘鲁社会的抵抗阶层主要由原住民以及下层混血人种构成。他们从农村流入都市，在原住民与寡头支配层之间，正形成新的 Nation（民族）文化、思想、运动。这一点，与墨西哥萨巴提斯民族解放军（EZLN）具有同质性：在那里，以原住民为主体的运动最先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抵抗全球化的征服。

作者也指出：EZLN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溶入原住民生活中，形成独特的思想文化，但MRTA却僵硬地搬用马克思、列宁的教条，以纯粹军事冒险的手段把理想加于现实。作者声称MRTA的人质期间，在理解MRTA运动的同时，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MRTA指挥官放弃这种手段，而应该在秘鲁现实中形成适应社会的左翼进步势力。读到这段珍贵的经历，译者也不知道到底是秘鲁MRTA还是这位日本外务省政治秘书更理解秘鲁社会了。²²

总之，这是一本引人深思的难得之作，值得向大家推荐。

[赵京译自日本新时代社《桥梁》周刊2000年10月9日第1653号]

²¹参见前文隅谷优“作为帝国主义渗透手段的日本对秘鲁经济援助”《海燕》1997年2月23日第619号。笔者译文发表于《中国与世界》1997年11月号。

²²译者那时刚从日本逃抵美国，连护照也没有，只好打消了去秘鲁帮助MRTA的可能念头。美国等西方社会的“进步势力”或“左翼力量”缺乏理解，帮助第三世界民众的认识和决心，而日本国会级别的“唯一的反对势力”日本共产党对此事件上的态度比日本政府更“爱国”（实质上，那些日本人俘虏都是政府官僚和大企业主管，普通职员都已经得到释放），只有“社会主义劳动者党”等微弱势力表达了“拍手喝彩”的态度。

14. 日本红军来自狱中的声明

日本政府最近单方面宣称：“日本红军骨干份子五人在黎巴嫩遭到囚禁，不久将被引渡到日本来。”不过，至今为止、黎巴嫩政府并没有正式承认囚禁的事实，当然谈不到引渡之事。虽然如此，日本政府与日本的新闻媒介，却把与日本红军的关系都无法证明的四名合法黎巴嫩、日本公民也称之为“嫌疑犯”。请问，是什么嫌疑？就算她们与日本红军有关系，这又算什么罪呢？难道你们要把与日本红军有关系的巴勒斯坦人民、黎巴嫩人民都以“嫌疑犯”对待吗？

在此，我们就冈本同志等五人被囚禁一事（如果日本政府的发布属实）发表下述声明：

1、停止对日本红军的“恐怖份子”的责难。日本的新闻媒介把当年的（以色列）利达机场战斗称为“无分别的恐怖行动”，但在冈本同志下落不明的今天，阿拉伯的新闻媒介仍然如此报道：“冈本在阿拉伯世界里地位特别，不能把英雄出卖给日本政府”。我们再次向利达斗争中被无辜卷入的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般旅客表达内疚，但请不要忘记被以色列军乱射所杀害的死伤者，更不要忘记这次行动是来自巴勒斯坦的对以色列军滥杀无辜、犹太复国主义者无分别恐怖主义的报复作战。

2、如果这一次日本红军被黎巴嫩政府囚禁的报道属实的话，这并不是因为日本报道所称的“日本红军已经成为谋求中东和平的阿拉伯各国的包袱”的原因，而是日本红军输给美国的情报战的结果。美国中央情报局把日本红军视为世界革命运动团结的中心，1995年以后加紧了毁灭日本红军的攻势，这一次很可能是美帝国主义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向黎巴嫩政府施压的结果。苏联解体后，在美帝国主义的一元支配下，阿拉伯各国无法对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压力。在目前的局势下，黎巴嫩政府的态度会有所变化，但这并不表明日本红军已经失掉了与阿拉伯人民、黎巴嫩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连接纽带。日本红军与阿拉伯人民的友

好关系不会改变。

日本政府正是害怕阿拉伯人民与阿拉伯新闻媒介的“反对引渡”舆论，才在未取得黎巴嫩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发表“囚禁”的事实，逼黎巴嫩政府引渡。但“引渡”迟迟不能实现，已经表明了日本政府企图的失败，这也表明了日本红军在中东的重要地位。

3、日本红军虽败犹存；即使我们全体成员都被逮捕，日本红军依然存在。日本红军 25 年来积蓄的革命思想是不灭的，不会因日本政府的镇压而消亡。日本政府把日本红军描写为“国际恐怖组织”，向黎巴嫩等政府宣称日本红军与另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联合红军”一样，是“大量杀害同伙的恐怖集团”。日本红军的战斗，是行使反抗帝国主义的抵抗权；日本红军的目的是，不是武装斗争，而是实现日本的人民革命，即彻底实现人民的自治与民主主义，我们现在声明：人民不希望武装斗争的话，我们就不会拿起武器。

4、日本政府以“杀人嫌疑”非法通缉利达斗争中的冈本同志并要求引渡到日本。但冈本同志并不是恐怖事件的“交换人质”，而是由国际红十字会与奥地利作中介，基于日内瓦条约交换的战争俘虏，日本政府完全没有理由以“杀人嫌疑”通缉他。就连以色列军事法庭在 1972 年判处冈本同志“无期徒刑”，禁锢了 13 年于 1985 年释放后，也没有发出逮捕令。日本政府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与日本宪法第三十九条。

5、日本红军不与任何阿拉伯国家为敌。1976 年日高同志在约旦被害，我们也没有敌对约旦政府。日本红军真诚地期待中东和平，以及黎巴嫩内战的终结与主权的恢复。如果日本的报道属实、日本红军被黎巴嫩政府囚禁的话，我们在此要求黎巴嫩政府释放他们。

6、为了人民的自治与共存，我们将战斗到底。

日本赤军：浴田由纪子、吉村和江、丸冈修

1997 年 2 月 28 日

[赵京译自声援日本红军囚徒的“归国者裁判再考会”发行的月刊《护照是什么》网址<http://plaza4.mbn.or.jp/~hannichi/ekita/>。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7年第4期]

15. 日本官私合营第三形态七成陷入赤字

—放纵经营的后果被转嫁到住民头上—²³

田口骥一郎

最近，日本全国各处的由地方政府与民间企业合资设立的第三形态方式的事业不断陷入赤字破产。据《日经新闻》调查，约七成的第三形态处于累积赤字状态，其中的半数以上事业完全没有减轻赤字的可能。所谓靠导入民间活力来振兴地方经济的政策到处都走入了死胡同。以下，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大阪府泉佐野市的第三形态“泉佐野国际都市”是地域都市开发的一个典型。大约十年前由大阪府、泉佐野市、银行、大型建筑公司合资设立的这个第三形态计划在丘陵地建设，产业都市开发区吸引尖端电子工业的研究机构。作为其中的一环，花费 18.5 亿日元的“上乡立体交叉枢纽”（连接关西空港高速公路）于 1993 年完工。

“泉佐野国际都市”得到大阪府与银行的融资，以 85 亿日元买下山林与农地用于开发。但泡沫经济破绽之后，预定进入的企业纷纷撤走，使得这一块用地没法开发动工。“泉佐野国际都市”只好于 1995 年 3 月决定放弃开发事业、背负 620 亿日元破产。

去年二月，大阪府提出方案：由大阪府支付 183 亿日元买下用地作为公园，其余的负债由银行自动放弃债权。府议会否决了这个方案；另一方面，因为大阪府在向建设省申请修建交叉枢纽时曾经承诺“由大阪府负责财源”，所以银行方面坚持大阪府应该承担负债。为了清算债务，官司打到了裁判所。

第三形态方式的目的，本来是利用民间资本和管理技能更有效地实施公共事业，但地方政府的行政弊端并不易改变。在这个例子中，本来在泡沫经济破绽之后就知道事业没法继续下去了，却一直没有处

²³所谓“第三形态”，是指由地方政府与民间企业共同出资、经营的，不同于完全公共或全部私有的组织方式。第三形态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前期，由日本政府推导和泡沫经济催动达到高潮。译者其时受雇于日本咨询公司，参加了一些第三形态的设计、调查项目。译文略有改动。

理，让负债持续膨胀，直到两年前负债达到 500 亿日元才公布事业的破产。

“泉佐野国际都市”又被称为立交枢纽开发方式。本来，开设高速公路的立交枢纽，必须由“国土开发汽车干线建设审议会”审议决定；但八七年以后，只要地方上负担费用就能设立。建设省出此主意，让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获得无利息融资设立第三形态开发工业用地，以开发利益充当立交枢纽的建设费。这样一来，全国各地冒出很多开发计划，成立了 31 处第三形态开发立交枢纽。与“泉佐野国际都市”一样，许多第三形态不但提供不出枢纽建设费、还得背负更大的开发债务而破产。

去年秋天完工的花费 14.3 亿日元的山口县美弥市的中国高速公路“美弥西立交枢纽”又是一例。

第三形态“美弥南部开发”的 8 亿日元资本金中，美弥市出资 4 亿。山口县出资 3.25 亿，虽说是“活用民间资本”，除了周围的市町村，只有包括农协在内的三家民间企业共出资 5 千万日元。美弥农协支店连办公桌都没有，市长也承认其为“皮包公司”。这是由市与县政府包揽的形态，原计划在枢纽边的树林里建设流通开发区，但找不到进入的企业只好冻结，由市政府偿还融资。

高速公路立交枢纽间的平均距离约为 11 公里，而所谓“立交枢纽开发方式”设立的全国 31 处立交枢纽，平均距离只有 6 公里，开车 5 分钟就到，几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除了枢纽本体工事外，接续的道路建设与开发用地，浪费了大笔的税金，压迫着地方财政，只有少数卖地的地主与承包项目的建筑公司得利。也有不少地方政府以第三形态方式建造了巨大的办公楼、因入居率太低而陷入累积赤字状态。大阪府与大阪市设立的各个第三形态，为了竞争“西日本最高”而建造办公大楼，很典型地说明了问题。

大阪市为了在面向大阪湾的南港地区建造办公大楼“宇宙塔”，于 1989 年 4 月设立了第三形态“大阪世界潮流中心建筑”，由市政府出资 25 亿日元，三井不动产等 27 家公司出资 69 亿日元。原计划

是 33 层 150 米高，费用 520 亿日元，这将变成大阪的新都市中心的中心建筑。

与此同时，大阪府在新开张的关西空港附近的泉佐野市积极推动另一个办公大楼“关口塔”的建造。为此，大阪府出资 51 亿，日本开发银行等 126 家公司出资 99 亿日元，设立第三形态“临空关口塔建筑”为建造主体。

大阪府发布了“250 米高度”后，宇宙塔变更原计划，两年后开工建造 252 米建筑。当关口塔变为 255 米（56 层）后，宇宙塔又变为 256 米（55 层），使得建筑费膨胀到原计划两倍的 1090 亿日元。据《读卖新闻》1997 年 8 月 19 日报道，原来负责高度建筑竞争的一位宇宙塔负责人承认：招集入居者是别人的责任，我不管租借户进不进来。

“西日本最高”的竞争后果马上就显露出来：宇宙塔办公楼的入居率只有四成，关口塔的入居率虽有七成仍然没法营利。去年，宇宙塔开张两年后累积赤字为 113 亿日元，关口塔开张十个月后累积赤字为 23 亿日元。为了减轻赤字，大阪府把融资 150 亿日元变为“建设工事负担金”的补助形式支援第三形态，大阪市则不断地“买下”部分设施。大阪市九五年把收买设施的费用转嫁到“大阪湾填埋关连事业费”，被发觉后在市议会遭到批判；但大阪市第二年又用 80 亿日元买下一部分停车场，“支援”第三形态。至今为止，府、市双方已经投注了住民的 230 亿日元税金。破产了的大阪府不得不实施最后的“改革”手段：削减公务员薪水。

与大阪相类似，东京临海副都心的“东京电子港口中心”（建造电子通讯中心大楼）“东京临海副都心建设”（建造三幢大楼）“竹芝地域开发”（建造旅馆与商业楼）的三大第三形态，到去年底累积赤字已达 497 亿日元。都是因为入居率远远低于计划的结果。

更有甚者，开张七年以来被认为“连续营利”的运营千叶县幕张新都心的主要设施（国际会议场、国际展示场、活动厅三设施）的“日本国际会议中心”实际上也是赤字经营。中心本身拥有会议场与活动厅；展示场是受千叶县的委托在运营。但中心又把展示场的运营

租让给别家、靠委托费（1995 年度为 6 亿日元）差额补填另外部门的赤字。因为千叶县每年注入的“委托费”，方造成中心“营利”的假象。

千叶县为什么每年花费如此巨额的税金维持这样的第三形态呢？此中心资本金 40 亿日元，千叶县出资 25%，千叶市出资 12.5%，其余的出资来自 97 家民间企业或团体。但在其六名全职干部中，社长是原通产省副大臣，专务是原千叶县企业厅厅长，常务是千叶市都市局局长，变成了官僚退休后养尊处优的肥缺。千叶县填充赤字的补助金就是为了确保退休官僚的肥缺。当然，第三形态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由各省厅出资维系的各种“特殊法人”，其头目不多是退休官僚吗？由这些“民间人士”组成的各种“审议会”提交的咨询报告往往比政府直接的政策更有“代表性”。这说明了第三形态“民间活力”在为谁谋利。

最近，费工 1 兆 5 千亿日元的联接神奈川县川崎市与千叶县木更津市的东京湾横断道路“东京湾水路”包括（桥与海底隧道）开通了。这是中曾根内阁的三大“民活”项目之一（另两项为国有铁道民营化、关西空港建设），由道路公团、地方政府、民间企业各出资 300 亿日元设立第三形态“东京湾道路株式会社”为建设主体，完工后交付给道路公团，建设主体的第三形态不对道路的赤字负责。

建设省强调民间企业对财政的贡献，在资金调达、经营管理方面都借鉴了民间企业活力。实际的事业费大半来自公共资金，由政府包揽，8 千亿来自财政投 / 融资借债、1875 亿来自国家的道路整备特别会计的无利息贷款。

企业界确实在积极推动横断道路建设构想。1972 年，以企业界为中心成立了“东京湾横断道路研究会”，八五年又变成社团法人“日本项目产业协会”，其会长正是新日铁公司的会长齐藤（后为经团连会长）。新日铁于七十年代前期预先买下了木更津市内的山林土地、八十年代卖给千叶县用于开发区吸引技术研究机构。千叶县等投入 500 亿开发这块土地，只吸引到七家公司，实际只有两家公司签署了

土地的买卖 / 租赁契约。新日铁贯彻的是资本的铁则：不能获利就没有“民间活力”。

政府出资 25%以上的场合规定要接受议会的监督，但经营的内容由于涉及民间企业往往无法公开，直到宣布破产。在“民间活力”的旗号下，第三形态遍及地域 / 都市开发、观光游乐、商工、交通运输、公共福利等多种部门，多数实际上与“特殊法人”一样，变成由政府补助、融资的退休官僚的“经济补偿”（因为他们在位时不能象私营企业那样为自己设定收入）。在他们的放纵经营下，多数第三形态往往陷入赤字直到破产，而几乎所有的债务都落到地方政府、即转嫁到住民头上；那些吸尽了第三形态利益的民间建筑公司、融资银行、买卖土地的不动产公司可以推脱责任。这就是第三形态的现状和实质，它反映了地方国家政权的颓废与腐败。

[赵京译自日本《海燕》1998年1月11日第661号，首次发表于美国《中国与世界》1998年4月号]

16. 志位和夫批判

山田明人

著名的理论刊物《世界》在1998年1月号上登出了日本共产党秘书长志位与《世界》编辑部的对话：“日共能与无党派市民共斗吗？”志位在这里主要谈论“有规则的资本主义”（以批判日本当前的“无规则的资本主义”），其中关于利用现成的资本主义“形态”，关于日共所揭示“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的论调，有必要论考一番。

整个对话的内容，是重复日共最近的吸收无党派市民“共斗”（即争取选票）的政策；为此，日共必须修正自己的路线。在最后关于经济政策的回答中，志位把日本经济的特征定为“大企业横行的无规则的资本主义”，所以，当前的课题是“民主改良”，在劳动、环境、金融等领域制造“民主规范”。至于社会主义性的根本变革，只不过是“理论展望”、“长远的过程”、“无法描绘具体的蓝图”。志位具体地举例道：Sony盛田会长的“社会系统全体改革”论与我们的“大企业民主规范”论“几乎是相等的”，去年来日的美国劳联——产联AFL-CIO会长的对于“规制缓和”²⁴的批判也“与我们的主张相近”，“那些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凯恩斯左派的论调与我们有相当重合”。

这样一来，听者（《世界》编辑部）不得不发问了：“马克思主义失去意义吗？”

“不”，志位回答道：“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正确地掌握了资本主义矛盾以及其运动发展法则。”这个公式表述太抽

²⁴ “规制缓和”本来是美国促使日本更开放国内市场，多买美国产品的要求。日共以此争取没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小业主（特别是农业）选票，强烈反对“缓和”。《赤旗》曾不正确地报道泰国米中有老鼠，引发日本人对外国产大米的反感。

象，日共如何制定向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政策呢？“最近我们尤其注意马克思、列宁关于如何利用现有的形态向新社会转变的想法。……国家独占资本主义形态已经存在，国家与经济有切不断的联系，问题在于大企业的资本积累成为国家最优先的政策。相反，我们的政策是转变全部机构由国民控制，把大企业置于民主规范之下。”

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教训，指出劳动者阶级不可能利用现成的国家机构为自己服务。志位是明白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他在此用“现有的资本主义形态”这个含糊术语为其改良主义辩解，冒称是来自《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的启示，实际上“修正”、歪曲、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所以，《世界》编辑部的听者很符合（志位）逻辑地判断道：“总之，你的谈话可以归纳为：首先，日共否定暴力革命、靠议会多数实行改革；其次，实行党内民主、坚持多党制，基本政策是实现‘有规范的资本主义’。请问：为甚么不能称其为社会民主主义呢？”

且看志位如何回答：“这里有一个误解。你们总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倡导阶段性的逐步改良，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谋求跳跃式的变革。这是不对的。”

嗯？听者（当然具有不低的理论素养）更糊涂了。再听：

“我们本来就是阶段论者。社会发展就是像登台阶那样一步一步往上攀、在一步一步的改革积累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社会进化论者。”志位进而发挥道：社会民主主义才谋求跳跃式的变革。“看看历史就知道。战前、日本共产党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分水岭就在于：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信奉立即建设社会主义论，我们只是追求日本的民主主义。其结果是：高唱社会主义革命论的社会民主主义潮流附合天皇制的黑暗政治与侵略战争、成为大政翼赞会的一员。”战后呢？“我们把打倒美国支配获得日本独立的民主改革作为我们的纲领课题。……而社会党战后还坚持社会主义革命论。”

这是对日本社会民主主义的过份推奖。战前、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完全是空谈。战后社会党的破产，并不是因为其“社会主义革命论”高调，而是因为其执行“现实路线”的改良主义政策，堕入小资产阶级“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死胡同里。而志位却还嫌社会党改良主义倾向不足进行批判；同时，志位把“美国支配”定为战后日本社会的“最大中心问题”，完全暴露了日共只是利用日本的民族主义获得选票，根本回避了日本社会的阶级矛盾。实际上，在钓鱼岛、竹岛（韩国名：德岛）、日韩渔业协定等问题上，日共都比日本政府更加坚决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

除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军事同盟政策（加入北约）外，日共与其没有甚么区别，反而不断向其学习靠拢。“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代表国民的要求，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这是历史的事实。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比日本达到了高度的社会保障制度。”志位完全没有提及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战后为本国资产阶级垄断资本服务的功能；相反，相对于没有能力实现西欧式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快速堕落、崩溃的日本社会党，具有“独立组织力量”的日共准备取而代之，与同一（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竞争对手（自民党）争夺议会选票，共同“改良”这个制度。连自民党也承认日共成了体制内（议会选举）的最大对手。

志位在《世界》月刊的这个对话，确认了日共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变质，它告诉我们，日共在这个方向上堕落到了何种程度。对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这是一个警钟。

[赵京译自日本《海燕》週报 97 年 1 月 19 日 614 号，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7 年第 3 期]

17. 日本向何处去？

—读浅井基文《大国日本的选择》²⁵—

日本早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不过，浅井在此书中告诉我们：日本的表现更象一个国际政治上的婴儿。例如 1995 年夏天日本国会于战后五十周年纪念通过的《不战宣言》、为了掩盖政府罪责而设立的“民间”亚洲妇女基金会以补偿战时的“慰安妇”，都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的伪善与荒唐。1989 年中国“六·四事件”以来，日本的政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质：国会批准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 P K O 法案”允许自卫队派兵海外，外务省官僚在没有取得国民共识之前不择手段地推动日本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旨在封杀反对派的小选举区制度，²⁶加重民众负担的“行政改革”、教育制度以及地方自治方面的倒退，和最终的修宪目标等。浅井问道：国际社会（而不是华盛顿）到底期待日本扮演何种角色？日本自身应该如何定位？

至今为止，日本政府与主流媒介（包括所谓“学术界”）成功地对国民遮盖了国际政治议题，我们只能听到来自统治阶层内的“不同声音”。以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方案》为代表，特别是自从海湾战争以来，保守派论客们就热切地讨论日本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军事贡献。浅井指出：他们信奉的是：实力就是正义，正义就是实力（第 80 页）；他们的意图就是推动日本的军备把日本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换（第 6 - 7 页）。

²⁵浅井基文著《大国日本的选择—日本与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339 页，东京：劳动旬报社出版，1995 年。

²⁶过去的中选举区制度允许每个选区选出四、五名国会议员，使得除自民党以外的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共产党、社民联等在野党有机会出线。而 1996 年 10 月 20 日实施的第一次小选举区制度（每区只选一人）国会选举结果是：自民党 239 席（48%）、新进党 156 席（31%）、民主党 52 席（10%）。这足以使自民党与其右翼（新进党）联合，在国会靠法律程序（2/3 以上赞成）修改宪法，他们之所以没有马上这样行动是因为民意不允许。

确实，站在日本统治阶层的立场（或者，一般人如果无视日本战败为止的历史）来看战后日本的历史，没有更多的理由要求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不效仿至今为止的一切国家强权的道路。²⁷在第一章“作为国际社会中大国的日本”里，浅井指出：虽然普通日本国民并没有强烈地感受到，日本确实早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所以统治阶层异乎寻常地抨击日本的和平宪法并在一系列实践中已经把宪法践踏得面目全非了（第32页）。小泽就恶狠狠地咒骂日本民众的普遍厌战心理是“一国（独享）和平主义”、“把日本从国际社会孤立出来”，以此堵上任何反驳的论点（第45页）。对于日本统治阶层的保守派论客而言，他们的“国际社会”就是最有强力的帝国。在他们接受美国为“国际社会”之前，中华帝国一直是日本统治集团想取而代之的唯一“国际社会”。在此“国际社会”中不存在国家、民族之间的平等，存在的是附属藩邦向中央帝国的朝贡关系（琉球、台湾、朝鲜以及东南亚的英、荷殖民地）。

第二章“当今的国际社会与战争”讨论日本应该如何处置国际外交中的冲突。浅井指出：战后日本的统治阶层除了在对美关系上发生180度转换外，完全秉承战前的支配集团。在军备问题上，宪法第九条明确宣示：日本不得保有军队，但日本政府在美国的鼓动下，不断修改宪法解释以“突破宪法允许的极限”，最后连堂堂皇皇的海外派兵也以“国际贡献”之名实行。1980年10月28日，日本政府解释自卫队合宪的理由是因为自卫队的存在“不是为了准备战争”。那么请问日本政府：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队的存在被其政府宣称是“为了战争”的目的呢？更有甚者，在1994年4月22日羽田内阁主导下的“基本合约”中，包括社会党在内的联合执政党派也声称“日本宪法基于联合国的共同安全保障概念”，把国家的明文宪法置于可随意解释的“概念”之下！这个“概念”是“国际性的集团自卫权”、也即

²⁷基辛格、李光耀等一再预言日本将来核武装的可能性，就是基于这样的普通常识。日本并没有优于任何大国的“国家伦理”，只不过经历过战败结果的政治家（如宫泽喜一）没有意志和能力扩张军备，但新一代政治家（桥本、小泽、加藤等）则不必受制于此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主义”。

在美国主导下军事同盟战争权利（第 192-193 页）。羽田下台后仍然很神经质地回顾道：万一美国在没法取得联合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²⁸攻击朝鲜北方“开发核武器的嫌疑设施”，引起朝鲜半岛军事冲突，他的内阁所处的立场远比海湾战争中派出自卫队扫雷艇的海部内阁严峻，就连在日本生活的几十万“在日朝鲜人”就令日本政府不知如何“管制”。²⁹浅井下结论说：日本的未来就看日本国民能否反抗“集团自卫权”这一类的保守派企图（第 194 页）。

第三章“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讨论为什么日本不应该谋求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政府列举了一些理由，其中包括：一旦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日本可以对军备控制与缩减作出贡献。浅井很纳闷日本政府为什么扯上这种无知的论调来欺骗国民：日本政府当然明白联合国安理会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讨论这个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反对）（第 239 页）。美国会容忍这样的日本进入常任理事国吗？事实上，日本是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最多担任理事国的国家，它到八十年代为止一直追随美国的核军备立场。在 1990 年南太平洋非核化决议中，日本追随美国（唯一的反对国）投下唯一的弃权票（其余 150 国赞成）；日本同时也附和英美法反对印度洋的非核化（其余所有的国家都赞同）。

日本积极寻求常任理事国席位是出于美国的推动。虽然日本自从八十年代以来开始摸索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换，³⁰但在美苏中 2.5 极（中国只能算区域大国，不过正好在日本所属区域内）“冷战”构造中无所适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机能几乎瘫痪，国内的反对党虽然不能取代自民党执政但却能有效阻止相关法案的通过。但

²⁸很显然，中国不可能同意把三八线移到雅绿江。

²⁹这一类以“军事大国日本”为前提显露出的日本政府的“无能”为日本统治阶层带来“危机”感，推动着日本政府“危机管理机能”的强化。海部内阁被责难动作迟缓，但桥本内阁在 1997 年 7 月的与日本毫无关系的“柬埔寨危机”时，立即命令自卫队军机去泰国待命！

³⁰主要体现在中曾根内阁（1982-87）时期：教科书检阅、参拜靖国神社、国防预算突破国民总产值 1% 大关等。

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以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得美国得以顺利利用联合国安理会推行其世界战略；与此同时，美国相对下降的经济力量又要求其同盟属国——特别是日本——分担其国际战略中的军事职能（第270页）。³¹在克林顿上台后的第一次美日首脑会谈（1993年4月16日）中，作为“吉田主义”继承人的“保守主流派”宫泽本人对于克林顿的加入常任理事会提议没有正面回应，引起外务省、自民党内“改革派”的不满。日本政府一旦确认美国的鼓动，很容易明白如何向日本国民解释联合国安理会名义下的任何军事行动，正如其一贯无视和平宪法的存在一样。浅井举例说：为了达到派遣自卫队去扎伊尔的目的，日本政府利用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办事处U N H C R要求日本援助的借口。很显然，U N H C R的日本人专员绪方贞子在越权利用国际难民事务帮助她的祖国推动军事大国化。³²作为联合国最高官员之一，作为国际政治学教授，以及作为日本政府推举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绪方不可能不知道U N H C R没有联合国大会决议无权直接要求任何国家的援助（何况是派遣军队），绪方不可能不知道日本的宪法禁止海外派兵（第279页）。外务省官员甚至向社会党首相村山谎报军情，修改现场报告，隐瞒美国劝日本不必派自卫队的建议（第284页）。

浅井在最后一章“战后五十年的国际社会与战败五十年的日本”中指出日本政治正处于越发加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日本宪法的民主权、和平、民主、人权诸原则深入人心；³³另一方面，保守的统

³¹蒙代尔1993年7月28日在国会任命其为驻日大使的听证会上发言：“鼓动与帮助日本扮演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符合美国的利益。”1994年7月14日参议院一致决议：“日本有意愿参与所有联合国和平维持活动是美国支持日本加入安全保障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先决条件”。此决议一举打消了日本人“加入常任理事会但不参与军事行动”的“善良”大国愿望。

³²绪方真该尽职去关心一下日本国内的外国人难民事务，其中有些难民本身就是日本政府造成的。例如“六四事件”后日本与其它西方工业国在巴黎会议上宣称“保护中国留学生”，但实际上只“保护”一个中国留学生败类以迫害广大的在日中国人。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最终不得不逃离日本。

³³1995年初《朝日新闻》公布的一项全国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日本人认为和

治阶层在一系国际、国内政治变动中越来越强大、反动，日本的民众与统治阶层的分离、冲突与斗争会加剧下去（第 338 页）。

浅井的这本书不是一部艰深的学术论著，而更象市民讲座的普及读物。作为前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以及覆没前的社会党外交事务顾问，浅井不得不全心力于关于国际政治的公共政策教育上，这多少也影响了他的立场的中立客观性（如果我们期待政治学上应该有这样的非价值取向的话）。在此书以及所有他的论述中，都刻意回避对中国政府的批判，³⁴给人留下“亲北京”的印象。许多“亲中派”日本人、包括著名的学者、艺术家（如历史学家井上清）都程度不同地怀有政治意图接近中国政府权力，害怕批判中国政府断绝“友好”关系的话，会使他们失去在日本政府眼中的价值。对于作个体的日本人而言，不得罪北京是在日本政治中立足的一个聪明选择（但愿浅井不是如此）：作为组织群体（如覆没的日本社会党）而言，如果连“六·四事件”都不表态的话，就很容易被右翼保守统治集团利用民众的心理摧毁（日本共产党因为很早以前断绝与中共的往来由“六·四事件”得利）。日本的进步左翼势力如果不改善这一点，根本不可能结合成有效的政治力量与统治阶层抗争。

浅井没有为读者提示出这一层的意义，日本政治从“六·四”事件以来的展开，也没有提示出令人期待的未来。实际上，1995 年日本政府在亲中的社会党首相之下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向中国政府传达了强硬的政治对抗信息：借中国的核试验中止了当年度的七千亿日元的无利息贷款；1996 年众议院选举结果实际上宣告了日本议会政治民主主义可能性的终结；1997 年，包含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在内的“美日防务合作指南”毫无阻碍地得到签署，标志着日本以军事背景迈向政治大国的外交政策的确立。³⁵再进一步，如果我们注意到：1997 年同时也

平宪法是日本战后繁荣的首要原因。

³⁴比起对日本外交的态度，浅井禁不住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称赞，其总体评价远较一般外国外交家公允，个别论点也很新颖，但他竟然对“六·四事件”带来的明显倒退效应视而不提。

³⁵中国驻日本大使徐敦信声称：日本的决定不仅不明智而且不可理解：作为唯

宣告了日本经济自九十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灭以来不仅没有复苏反而进一步恶化、暴露出其传统手段不可药救的制度性危机，那么，已经开动起来的军备国家机器必然会强制地利用国际、国内政治手段达成其“危机管理”的目的。那时，我们还能读到浅井这样的论述吗？

[赵京，1997年12月26-27日，美国圣何西]

一核武器受害国强烈反对核试验的话，日本首先应该从最大的核武器大国的保护伞下独立出来，然后才有权利指责别国的核试验。

18. 日本“一坪地共有者”团体宣言

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

目前，日本政府正不择手段地推进成田机场扩张计划。在扩张计划用土地内，我们拥有木根、东峰部落两处的一坪土地。

十五年前，为了表达我们与三里塚农民运动的团结、支持当地的机场扩建反对同盟，我们买下了这两块土地。

我们遵从当地反对同盟的关于土地权利的意愿与决定。也就是说，我们将坚持到日本政府通过圆桌会议最终放弃扩张计划、反对同盟宣告斗争胜利的那一天。那时，我们将会按照反对同盟的要求，解除我们对共有土地的权利。



今天，我们再次宣布：我们将遵守与反对同盟的约定，决不放弃对这一坪土地的权利。

[译者注]八〇年代初，日本政府在未征求当地住民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实施东京东郊的成田机场扩建计划（西郊由美军专用横田基地管制），激起日本全国各地反对美日安保同盟人士的抗议。虽然日本政府经过十多年的威胁、收买，已经买下了绝大部分面积的土地权利，处于扩建机场滑走道中的三里塚几家农民坚决不肯接受日本政府的高价收买，“三里塚”因此成为日语中“不可逾越的难关”的代名词。为了坚定信心，三里塚农家成立反对同盟并把土地权利划出一坪

（3.3平方米）一坪的面积，出让给日本各地的团体或个人，使得日本政府几乎不可能收买所有的土地共同者。这种“一坪地共有”的斗争方式又被广泛地运用到冲绳的被美军占领的土地，日本的外相与防卫厅长官气急败坏地声称，这些共有地的权利者是“手帕（面积的土地）占据者”。当冲绳县知事不肯签字强制征用这些土地时，日本国

会慌张强行通过“特别措施法”，使美军的驻留合法化。今天，“一坪地权利”斗争的意义在于：如果日本政府在此得手，将来日本追从美军在“日本周边”（不是地理概念，可及全球）发动战争时，可以随心所欲地徵用日本全土的民用机场、港口、道路等投入战争，重演军国主义的历史。

[赵京译自日本《桥梁》周刊 1998 年 2 月 23 日第 1523 号，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8 年第 2 期]

19. 美国对日本经济政策的干预³⁶

高岛义一

两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30 万亿日元的拯救银行的政府资金投入，都没有达到预想的刺激景气的效果。1998 年 3 月 26 日，执政的自民党与社会民主党赶在 5 月在英国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之前，又发表了 16 万亿日元多的“综合经济对策”。其中包括补助大型建设公司的公共投资项目、用邮局储蓄、简易保险的资金投入股市以维持、操纵股价等手段。然而，自 97 年底以来低迷不升的股票市场并不为所动。

作为桥本政权最大政策课题的“财政重建”项目，早已灰飞烟灭。桥本政权自身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然，这并不只是由于桥本政权的无能（面对声望不断下跌的桥本，却没有政治家愿意出面来接手），而是由于：（1）越来越恶化的日本经济萧条局势（日本的经济规划厅曾经隐瞒统计数据以安定民心），（2）来自克林顿政权的频繁的“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的强硬压力（逼得桥本政权都以“干涉内政”来形容）。

克林顿政权的对日要求，反映了作为世界赌博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美国泡沫经济不断膨胀下伴随的巨大破灭危机意识。

1997 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为 1137.5 亿美元，达到了 1988 年以来的最高水准。1996 年的财政收支赤字达到 1481 亿美元。自 1994 年以来，投资收支也陷入赤字，达 42 亿美元，九六年更增加到 84 亿美元。这对于超过 9 千美元大关的纽约股票市场价格的“空前繁荣”的美国泡沫经济，随时都可能引发“大爆破”。

支撑美国这个世界最大债务国经济的正是世界最大债权国日本。日本保有 3200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而保有约 800 亿美元美国国债的

³⁶全文论及日本政府投入 30 万亿日元拯救银行以及 1998 年 4 月 1 日开始的日本金融“大震荡”，是事关日本资本主义整体走向的一次赌注。译文仅是九节中之一节，略有改动。

其他亚洲国家，有些（韩国、泰国等）已经开始出卖了。一旦日本由于金融破绽也不得不抛销美国国债，美国的金融恐慌与相关的世界金融系统的危机就来到了。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的对亚洲输入开始减少；同时，对美元兑换汇率大幅下降的亚洲通货，将增加对美输出能力并挤垮美国的同行。美国的贸易收支赤字、财政收支赤字，将随着美元的升值加剧，更加快了不均衡的美国经济迈向破灭的速度。对于克林顿政权来讲，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开放市场、增加因为经济萧条造成的不断减少的来自美国的输入，成为最后一招手段。

如果说，战后以来的受国家保护的金融产业一方面由于与政府、自民党的关系，内部已经腐败透顶；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保障劳动者部份基本权利（如养老金）的功能，支持着带来日本经济奇迹的“终身雇用”等劳资调和型的日本式资本主义形态。以金融“大震荡”为标志的日本经济全面自由化，伴随着《劳动基准法》改恶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改革”，把整个日本经济，包括广大劳动者的基本生计（连养老金在内），都投入全世界规模的巨大赌博系统之中。

[赵京译于新时代社《桥梁》周刊1998年4月6日第1529号，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8年第3期]

20. 赞美侵略战争的电影“尊严与命运的瞬间”

1998年5月23日开始，在一片非难声中，以东条英机为主人公的、描写远东军事裁判(东京裁判)的电影“尊严与命运的瞬间”在全国公开放映。

一、影片制作公司及其母公司

此影片由“东京映像制作株式会社”出资十五亿日元，占制作费中的百分之九十，在“东映”(另一家主要经营放映的公司)京都摄影所拍摄，并将在全国的东映系列电影院放映。东京映像早已被与文化事业毫无关联的、总部设在盛冈(岩手县首府)的建筑公司“东日本住宅”收买，成为其子公司。

东日本住宅在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后异军突起，主要依靠其当家人、现任东日本住宅会长的中村功的特殊销售手法经营成功、连年增大利润。中村功原为出光(一家大石油公司)的推销员。经营成功以后，中村功把社长一职让给藤泽诚一、自己投身于泡沫政治。因与具有朝日新闻“左倾”背景的细川(后成为日本的泡沫首相)不合，自行设立政治团体“渔火会”，又设立极右亲美的“青年自由党”，并自任党首。中村功在波斯湾战争时担心日本政府不力、曾动员日本民间捐款支持美国，将其子推入日本国会，是青年自由党唯一的国会议员。中村功在东日本住宅公司内强制职员齐唱“君主世世代代”的“国歌”、挂日丸“国旗”，除了赞助藤冈信胜(其断言在南京大屠杀中只死了47人)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派的昭和史研究所，还游说全国各地的地方议会通过内容相似的、反对把“慰安妇”纪实列入教科书的议案。正是“六四”事件直接催化了自由青年党等日本极右政治势力的成长。

作为东日本住宅创立30周年的纪念事业，中村功选择了岩手县出身的东条英机。这不是普通的艺术创作，而是赤裸裸的政治宣传。由东日本住宅、东京映像与东映三家公司组成的“制作委员会”决定影片的内容。东日本住宅甚至动员与其有商业关联的公司，在放映之前就买下了90万张入场卷。在此之前，东日本住宅在东映为庆祝宫

泽贤治诞生一百周年放映的“吾心向往银河铁道”时，也预先买下过 10 万张入场卷。

二、赞美侵略战争的“自由主义史观”

由此影片的制作过程可以想见其内容。在远东军事裁判中（插图），印度的法官曾对英帝国主义进行过批判。此影片藉此描绘日本与英、美也不分彼此，只不过是战败了而已。影片中出现一个与日本军合作谋求印度独立的将军，好象日本是印度独立的支持者；而南京大屠杀被描写成“多系传闻”、“证据不足”。更重要的是，战败的日本面对强大的占领军，总得要有人出面承担责任，但这个人决不能是日本天皇；所以，东条就成为“为国捐躯”的殉道者，这也是靖国神社供祭包括东条在内的战犯的理由。



全东映系列的工会组织就此影片内容与公司交涉，东映的社长高岩声称：“我不管是左还是右。请看版本：影片描写的只是事实”。“战争本身就是讲不清楚的东西”。这就是十足的“自由主义史观”。

这部“自由主义史观”影片的公开演出，正好呼应日本国会“劳动基准法”的恶性修改、美日防务指南的立法化等政治上的反动，准备中的影片《昭和天皇》计划也在实施。在日本经济、政治全面再现三十年代形势的今天，阻止“尊严与命运的瞬间”这样的影片的放映，意味着反对把艺术欣赏领域堕落为新的“大翼赞”体制宣传工具的斗争。

[赵京根据日本新时代社《桥梁》周刊 1998 年 5 月 4 日第 1533 号及川恒平文章编译]

21. 日本哪里有打工处

武

我的一位仍在家乡务农的、年过五十的朋友，往往十一月初忙完农活后就自带新米到城里来打工。这几年，他都到横滨我家附近高楼林立的「港口未来区」建筑工地或可收容八万人的「2002年世界杯」足球场建筑工地来打工，一天约有一万两千到三千日元的收入。我们一个月总要喝酒、叙旧一次。

他出来打工，除了元旦回家过年外，一直不停地干到四月开春。除去住宿、饭钱以及两趟来回路费、礼品，实际上只能挣到五、六十万日元，也就是说，一个月的收入只是十万日元左右。这点费用，实际上还不足以添加工具、修整农地。每次喝酒时谈到这里，他都不禁怒髮衝天：那些经营破产的农协、银行为什麼要动用国家预算去「拯救」？

今年他却来不了啦，因为首都附近已经不容易找到打工处了。他结果在长野与岐阜县境的公路修建处找到临时工作，住在生活不便的工蓬里，每天的工资也只是一万日元左右。

不过，他还算幸运。许多与他同样的人还没有找到工作，特别是去年在汽车製造厂打工的人，在正式工人都被解僱的情况下，哪有打工的机会？现在即使是录用临时工，也要看打工的年份与技能，临时工“转职”也不容易。我本来还想，这一次如果他还能在我家附近找到工作，看如何腾出一间房间让他住呢！

[赵京译自日本《桥梁》週刊 1998年11月9日号]

22. 抗议奥林匹克理事会的紧急声明 (日本) 反对奥运会联络网

一、以萨马兰奇为顶点的奥林匹克理事会 (IOC) 已经腐败透顶, 被开除的涉及盐湖城选拔过程的六名委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IOC 不能仅以「改革选拔方式」矇蔽世人耳目。

二、除了盐湖城以外, 对于包括长野在内的召开地的选拔过程也得展开彻底调查。仅由 IOC 向长野市发出询问函, 不能对事态的解明提供任何帮助。长野冬季奥运会把会计帐目也烧毁了, 这本身就表明有销毁证据的嫌疑, 他们把真实与民主主义也化为灰烟。

三、我们将继续要求 IOC 偿还长野县人民为长野冬季奥运会付出的两万亿日元债务, 将继续要求 IOC 恢复长野被破坏了的自然环境。

四、大坂市立即停止主办争取 2008 年奥运会的活动, 并公佈相关的费用账。

五、向候补城市索取贿赂、破坏召开地自然环境和财政状况等的奥运会应立即停止。国际上相关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瑞士政府、洛桑市政府等立即著手对 IOC 展开组织、财政、税务、捐助实情的调查, 解散 IOC。

反对奥运会联络网

日本长野市, 1999 年 1 月 25 日

[赵京译自《桥梁》週刊 1999 年 2 月 1 日第 1569 号, 首发于香港【十月评论】1999 年第 2 期]

23. 广岛县立高中校长被迫自杀

1998年2月28日，就在广岛县立世罗高中毕业典礼的前一天，石川校长自杀。虽然没有遗书，但他留下了“吾行吾道”的遗言。

一般的新闻报道解释为校长夹在县教育委员会的“彻底实施文部省的学习指导要领”要求与教职员工会的反对之间，烦恼之下做出的选择。文部省大臣进而指责“对于教育的来自外部的干涉”（主要指部落解放同盟反对在毕业典礼上唱“君代国歌”、升“日丸国旗”）。

校长的直接死因就是来自县教育委员会的“激励”（县教育委员会教育长在记者会见时的说明）。本来，按照惯例，世罗高中的教职员工会已经在2月25日决定，在毕业典礼上不唱“君代”歌、不升“日丸”旗。还有其他二十几个中学也做出类似的决定。县教育委员会立即派人到这些学校，要求它们执行“职务命令”。

这个事件的典型意义在于：过去，虽然宣扬日本天皇万世统治的“君代”被宣称为“国歌”、在日本的学校里因为教职员工的反对，不唱“君代”歌、不升“日丸”旗，日本政府也无力直接干涉；但所谓“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政治全面倒退、日趋保守反动，在国会等国家权力机构获得决定性支配地位的日本统治势力开始全力以赴，在一系列领域强制推行他们的意志，而在教育领域以行政命令推行唱“君代”歌、升“日丸”旗，就成为显要的突破口。

永田町（日本国会所在地）的自民党（加上小泽自由党等）正在急迫地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君代”、“日丸”的“国歌”、“国旗”地位。而广岛的民众正在署名要求罢免县教育委员会教育长、反对强制实行文部省的“学习指导要领”。

[赵京，1999年3月17日，美国圣何西]

24. 要求哈比比政权立即承认东帝文独立、撤退军队 -印度尼西亚民主人民党中央指导委员会-

基于 1999 年 9 月 4 日联合国总部与联合国东帝文派遣团发表的结果，我们民主人民党发表如下声明：

1. 我们祝福支持独立的东帝文人民的多数派。东帝文人民值得这样的祝福与支持。这六个月以来的恐怖与威胁没有能够破坏他们追求独立的斗争意志。

2. 呼吁双方都要尊重支持独立的东帝文人民多数派的选择。我们必须支持东帝文人民的选择，因为表明了法律的正当性与现实性。

3. 要求哈比比政权立即承认独立、撤退军队。没有必要等到下一阶段的国民协议会来决定。国民协议会对东帝文人民的将来没有决定权力。国民协议会的当局应撤回并废除印度尼西亚合并东帝文的法令。

4. 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尊重“纽约和约”规定，保证东帝文的治安。以此直接投票结果，必须立即撤退印度尼西亚军队。

5. 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停止对支持合并派的民兵的支援。

6. 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得派遣任何军队到东帝文去。

7. 为了保障东帝文人民的生命安全，要求联合国应该立即派遣和平维持部队到东帝文去。

人民团结起来胜利万岁！

民主人民党中央指导委员会
雅加达，1999 年 9 月 6 日

[赵京译自新时代社《桥梁》周刊 1999 年 9 月 13 日第 1599 号，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9 年第 4 期]

25. 开张五周年的关西新机场

1995年9月4日，关西新机场开张5週年了。这五年期间，机场运营的破绽逐渐暴露出来。首先、第一期工事花费当初计画的两倍、达到1万5千亿日元，其中七成是贷款，现在光支付贷款利润每天就要花费两亿日元。其次、98年度的飞机升降次数与旅客人数都比97年下降，新机场的99年度(明年三月为止)决算预计为2百39亿日元赤字、使赤字累计超过1千3百亿日元。



机场週围的所谓第三型团体（主要由政府出资、企业经营）接连宣告破产。引人注目的填湾埋土造成的临空塔，已经完全没有经营可能了，但大坂府以及下属的地方政府仍然不断为其“充血”，拖延破产的到来、进一步加剧赤字膨胀。临空塔的主体建筑大楼只有四成使用率，除了这座大楼与游园地之外，几乎所有的建筑空间都变成空地。

大坂府泉南市议员小山广明报告说：关西新机场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明知不符合经济效益，而最大的债权是用于第三型团体(即地方政府)购买的土地。泉南市当初以每坪165万日元买下的土地，今天只值每坪30到40万日元。这实际上是一种由地方政府把市民的税金通过土地购买、贷款利息转给土地商人与银行的构造。

但是，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关西新机场的第二期工事仍然自7月4日开工了。这恐怕会花费原计划的1560亿日元的两倍。实际上，连填海用的沙土都得从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外国运来，可以想象新机场赤字的进一步加剧。

日本政府强行推进关西新机场的建设，除了所谓“刺激经济”的自民党政策外，同时也包含把新机场用于将来可能的军事行动的意图，这在通过“周围事态法”时的政府言论中显示出来。为了反抗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这种经济、政治上的反动，关西的市民们在明知没有打赢官司可能的情况下，毅然向法庭起诉，要求停止关西新机场的运行与进一步的扩张。我们拭目以待，看日本的法庭将会如何应对。

[赵京译自《桥梁》週刊 1999 年 10 月 11 日第 1603 号，首发于香港【十月评论】1999 年第 3 期]

26. 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东南亚历访看其进一步的右倾化变质 —持批判精神的部份日本共产党员—

日本共产党上层的右倾化变质更变本加厉，除了对于公开要求修改宪法的鸠山民主党竭力奉承、热情欢迎日本政府对于多国部队进驻东帝汶提供资金外，最近对东南亚的首次历访，又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为了推行“重视亚洲”的旗号下的“野党外交”，1999年9月16日至26日，以不破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对东南亚历访，受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独裁开发政府的热烈欢迎。不破等对于与这些政府官僚的交欢深感荣耀，却丝毫没有提到在这些政府压迫下的民众。

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基本上与战前的日本相同，存在着治安维持法，共产党以及各种反体制团体处于非法状态，许多人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和长期监禁。这两个国家确实实现了经济成长，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在皮诺切特下的智利也同样达到了经济的成功。例如马来西亚为了引进跨国公司建立输出加工区，不仅实行税制优惠，而且在1988年为止不容许成立工会。

跨国公司接踵而至，特别是日本自从1985年的日元升高以来，所有的日本大型企业包括日立制作所、NEC、松下电气、夏普、丰田、SONY、住友电气、富士通、三菱电器、日本电装、三协精机、三友等都来到马来西亚。在这些大企业中受雇用的女姓与外籍劳工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在1997年陷入经济危机时首当其冲、遭到解雇等打击。日本共产党不是一贯主张对跨国公司进行“民主规制”吗？它的这些主张跑到哪里去了？

当新加坡政府官员在介绍“雇用法”等时很小心地说明：“我们知道，你们共产党不会同意我们的政策”。但是不破却非常畅快地回答道：“不，日本共产党不在新加坡活动。这是你们的内政。我们日本共产党不会对此说三道四”。那么，请想象一下，如果在日本实行了治安维持令等反动法令，日本共产党等被非法化，当别国的共产党

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与日本政府高官非常畅快地交欢、赞美日本政府的政策，并且对于日本的反动政策评论到：“这是你们国会决定的事情，我们不会说三道四”。日本共产党会如何想像呢？这不是对日本民主主义的沉重打击么！

这次无耻的“野党外交”是日本共产党上层推行其无原则的“21世纪执政战略”的反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破等不惜讨好赞成“紧急立法”的民主党，并准备在当上“政府大臣”后与东南亚的资产阶级政党、政府建立“友好”关系。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忧虑。

1999年10月6日

[赵京译自《桥梁》1999年11月27日第1610号转载的“SAZANAMI 通讯”，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9年第4期]

27. “突破国难”的天皇“元首化”动向

平井纯一

继日本国会通过“日丸”、“君代”（意为君主世代代）的国旗、国歌法案后，11月12日，日本政府又组织了“天皇在位十周年式典”。这是日本从宪法规定的和平国家向进行战争动员的“普通国家”的急速转变的重大一环。

在审议国旗、国歌法案中，日本政府已经明确表明“君代”之“君”为“象征天皇”。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在“改宪试案”（《文艺春秋》1999年9月）中进一步强调“象征天皇”就是国家元首，日本的政体为“立宪君主制”。

山梨学院大学的原武史先生观察到这一次的“国民式典”（虽然只动员到期待目标五万人的一半）与1940年举行的“纪元2600年祭典”的酷似：“这是一次对长期‘历史空白’的回归”，“如果只观察天皇的位置安排，反而令人产生战前与战后的错觉。‘纪元2600年祭典’时更像‘象征天皇’，‘国民式典’反而给人一种‘现人神’的倒错印象”，“那不自然的‘天皇万岁’的高叫，使人感到无论如何也要复活天皇制的焦虑”（《朝日新闻》1999年11月16日）。

与战后因为战败而回避公共活动的裕仁天皇相比，明仁（加上美智子）天皇制以一系列“皇室外交”、“福利活动”活跃在公共场合。在今天的旧型“国民统合”构造崩溃的条件下，作为“历史、文化与传统”的意识形态象征，天皇正逐步“回归”其过去的“危机管理秩序”的认同中心的角色。

[赵京译自日本新时代社《桥梁》周刊第1613号1999年12月20日]

28. 日本年金制度改变法案的危害

高岛义一

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三党联合政权正在联手进行的年金制度改变法案，准备将 20 岁以上所有在日本生活的人强制纳入厚生(医疗等)年金、国民(高龄)年金制度，并将年金的储备金投入低迷不振的日本股票市场。这将会为信托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巨额利润，而使今天辛勤劳动的民众的将来更加动荡不安。

年金储备本来是为了退休后的不能工作者的最低生活保障。在美国，企业年金由从业员自己负责在股票上运作(即所谓 401k 计划)，因为近几年美国经济的泡沫膨胀而大为流行。今年一月，柯林顿政府试图把社会保险年金的一部份储备也投入市场，遭到包括国会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理事会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但日本从 1996 年以来，本来由大藏省保存的储备金就交给厚生省的特殊法人“年金福利事业团”、再由其“委託”(支付)给信託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资股市。据厚生省年金局长在国会的答辯，1998 年支付的手续费是 390 亿日元，累计达到 3372 亿日元。那麼结果呢？是 18400 亿日元的亏损。

年金福利事业团以及受其委託运营储备金的年金保养协会的理事长都是厚生省退休的官僚；具体运营资金的咨询机构年金资金运用中心的研究员都来自都市银行、信託银行、生命保险等大型金融机构派出的人。这些金融机构每一家管理一万亿日元年金的运用。

年金的运用方式仍然是重複带来了今天的经济危机的金融机构的泡沫式投机：在决算时把股市抬高、增大股票的利润分配，用于填充陷入危机的金融机关自身 (Price Keeping Operation)。只不过，这一次，在失业率达到战后最高、连续十年的经济危机后，政府还支付「手续费」让他们去盈利。不用说，这只会带来更深刻的经济危机。

这一次的年金制度改变，使厚生省在应用方面不再同大藏省商量而自由运用，运用金额也从现在的大约 25 万亿日元到所有年金储备（144 万亿日元）。在幕后推动此案的金融机构希望帮助脱离危机，但大藏省、厚生省、以及「年金福利事业团」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对年金储备的亏损负责。

日本的法人税、最高所得税等都已经低于美国。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大藏省用老百姓存在邮局的储备（本来因为那里最安全人们喜欢存在那里）等购入大量国债，投入到为大型建设公司谋利的“公共投资”中，加深了日本国家的财政危机。日本中央与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早已陷入无法偿还的破产地步。

1999 年度第二次修正预算又追加了 7600 亿日元，使 1999 年国债达到 38 万亿日元，为国家财政预算的 43.4%，国债相对于 GDP 的比例已经达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的水准。等待著日本民众的不是日本政府宣称的“景气恢复”，而是国家财政的进一步恶化、国债的暴跌、金利的上涨、通货膨胀以及更大规模的失业的到来。

[赵京译自日本新时代社【桥梁】週刊第 1613 号 1999 年 12 月 20 日]

29. 日本战后左翼人物的命运

樋口笃三

《战后左翼人士群像》(柘植书房新社出版, 2300 日元)作者增山太助是战后点燃革命运动火炬的“读卖(新闻)斗争”的领导人, 由他来对那些共同战斗过的人物写评传是很合适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书物成千上万, 在日共的正统历史中, 就有《五十年党史》、《六十年党史》、《六十五年党史》、《七十年党史》等。在日共党主流以外, 有《德田球一》、《神山茂夫》等个人传记, 但却没有像《史记》那样的列传。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关于日本革命运动持有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日本帝国军队式性质。本书可以说是日本第一本革命列传。

书评者樋口笃三 1947 年加入日本共产党, 历经两次被开除仍坚持劳工运动, 他对于“日本革命史=日本共产党史=宫本显志史观”有深切的体会。除了“日本的列宁”(宫本)以及作为批判、迫害对象的“日本的毛泽东”(德田)、“日本的刘少奇”(志田重勇)外, 日共正统史观里的日本革命运动、劳工运动史上看不见“人”的影子。为了对日本革命的失败进行历史性的总结, 首先必须不分功名败对代表性人物进行综合评论。本书虽然对个别具体人物的评判不一定正确, 但从整体上看, 是非常有价值的。

本书列传的一百人中, 有 29 名日共“职业”党员, 两名非日共职业革命家(平冢、凡冈秀子)、11 名劳工运动组织者(包括日共党员)、13 名文学家、13 名艺术家、10 名学者、13 名新闻界人士等。樋口虽然比作者年轻 15 岁, 但也直接在书中 30 多人的领导下工作过, 与书中数人也共同工作过。

除了山口武秀(农民运动)、铃本市藏(国铁工会与“二·一”总罢工)没有列入外, 结集在列传中的人物代表了日本“革命党”第一流的良心、野心、正义感、人格与事业。其中包括日共的德田、野阪参三、志贺义雄(所谓“三巨头”)、金天海、神山茂夫、宫本、裤田里见、黑木重德、志田、椎野悦郎(所谓“重建七干部”)、春

日庄次郎（社会主义革命与构造改革论）、西泽隆二、安齐藏治（“毛泽东派”）等；也有战后工运巨头细谷松太、高野实。书中特别提及在日朝鲜人日共干部金天海、保阪浩明、车永秀，冲绳人德田、高安重正。至于文学艺术家太宰治、河原宏等，今天的日本人一般只读其作品，不知道其政治立场。可以说，在战前天皇制国家、军国主义统治下奋斗的日共的道德与良知，在战后的民主革命鼓舞下一举开花结果。可悲的是，如书中所列大多数人物一样，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活动家，都被日共踢散了。



在 1947 年的日共创立 25 周年纪念集会上，中野重治（插图）做诗“那些人们”歌颂那些没有正式成为党员却为日共牺牲、奋斗的人们，今天读起来还令人感动。那是对日本革命、对日本共产党充满希望的时代。可惜，中野三年后作为“国际派”被开除；后来虽然在日共六中全会恢复名誉，却于 64 年再与神山一同被“永久”开除，此后在日共党史等文献中再也见不到其名。

“人民之敌”中野去世时，在宫本、藏原支配下的日共，没有人敢表示悼念。

今天，研究中野的单行本就有 247 册，这是任何日本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诺贝尔获奖者大江健三郎就公开表示：只要日共不改变对中野的态度，他就不会与《赤旗》交往。增山在书中高度评价中野：“我对于文学家中野重治曾经是日共党员这一事实充满自豪。我们之间当然有细微的差别，但日共党员中野的存在，本身就为日共的马克思主义增添了人性良心的光辉。”除了中野外，野间宏、佐多稻子、安部公房等著名作家，都没有出现在日共的宫本史观中。日共的《六十五年党史》只提及宫本百合子（宫本显志夫人）的《播州平野》等作品。虽然连通口本人也是 50 年日共分裂时宫本的最热烈支持者，但在宫本 40 余年专制性地支配日共期间培植起来的庞大的宫本史观，将来总会遭到彻底废弃。

书中的长谷川浩（原日共政治局委员、工会部部长）晚年表示：有上百万人脱离了日共。日本研究马克思、列宁、格拉姆西的泰斗石堂清伦也说有 50 万人脱离了日共。总之，这是非常庞大的数目，更令人寒心的是：这些人中，有 95% 以上的人都不愿再提日共了。我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一位被开除的原日共东京都委员表示如果日共自己批判，愿意回日共。实际上，此书的百人中，竟然有 60 人是脱党或被开除者。

战败后的数年中，日本的民众为每日的食粮奔波。樋口这样 1948 年成为党专职（职业革命家）的人常常领不到工资、空腹工作。井上光晴的“反党小说”《不能书写的一章》就写实地描述他在长崎县作为党专职工作人员的生活之苦。白川晴一（政治局委员）、渡边四郎、内藤知周（曾是宫本派中心人物之一，当上中央委员后脱党）等形容自己到 70 年代还是“赤贫如洗”，更不用说在日朝鲜人党员们的生活贫困了。车永秀 80 年以后与通口亲交，告诉通口他 48 年时在党本部工作时午餐就是一个干面包、一杯白水，但宫本在大家面前独自吃着白米加炒鸡蛋。志贺、野阪也同宫本一样，而志田、德田则与大家同食，很得人心。增山曾去宫本、志贺家做客，为其豪华住宅惊异。

比起经济生活的贫困，政治生活的变幻更令人心寒。小松丰吉可能是命运最悲的党中坚干部吧！他是东京的三大日共据点工厂组织的领导者，特别在朝鲜战争中作为军事委员会负责人锋芒毕露。54 年被志田委派与椎野、吉田同赴北京（后两者知道命运不祥拒绝前往），在北京被裤田里彻彻底整肃，对党绝望之余以酒消愁。归国后无法工作，被开除后病死在路上，连家人也不认他。当时的川崎市东芝堀川町组织，在 4500 名工人中有 380 名党员，是日本最大的共产党支部。当时的支部长 K 君才 23 岁，他后来与小松命运相同，死在横滨的街路上，无人认领。党中央的 S 君也是如此。虽然自己应该负一部份责任，但多数的责任是由于日共党的政治方针从来没有为“专职党员”的生活着想。结果，那些把生命献给党的事业的人，或者死心塌

地追随宫本迫害同志，或者被开除出党又没法在社会中生存。在日共，宫本的“辉煌”路线下，堆积着过去的同志们的累累尸骨。³⁷

在朝鲜成长、在中国从事活动的安斋库治（日共中央委员、候补干部会成员，67年被开除）晚年反省到：“日共在战前、战后总是在斗争的最困难关头把朝鲜同志们分派到最危险的地方。这样做，即使自身没有意识到，也反映了日共的民族排外主义与皇道思想。”（72页）

保阪（因与日本人医生结婚而改成日本姓）在战争时毕业于东京大学，在46年1月的日共五大上是三名朝鲜人中央候补委员之一。他在京成电铁、京滨的东芝、读卖新闻斗争等运动中出尽风头，在49年时作为东北地方委员会议长领导占领平警察署以及东神奈川人民电车事件等极端战术。他在日共六中全会的会议上自我批判时同时也承认“因为自己是朝鲜人始终受到歧视，因而发展成那样的极端行动”，使整个会场肃静无声（74页）。

樋口与保阪共事三年，也因为不满他的权力欲而提意见批判过



他。后来读到他的遗稿集，其中提到他与典代恋爱时，同时羡慕典代的日本人警察调查保阪的出身，在典代面前辱骂他：“朝鲜人也想靠近日本姑娘！”并殴打他。没想到他受到如此歧视。这使人想到美国白人革命家拒绝与黑人同志握手的情形，这在日本也长期存在。出身冲绳的德田球一（插图）又是一例。

德田在故乡名护市自80年代以来由市政府公报等追颂为“乡土英雄”、“国际政治家”，由社会党的户口市市长到保守派的比嘉市长、今天的岸本市市长带动，出资四百万日元（加上各界捐款共两千万

³⁷ 托洛茨基临终前在逃过一次谋杀后对 KGB 揭露，指出正是那些犯过错误但已经紧密依附党的机器、没有能力从事别的工作并习惯于特权位置的人，可以被 KGB 变成唯命是从的工具，担当无恶不作的勾当。见李时译《托洛茨基文集 1939-40 年》“斯大林谋害我的生命”，香港《十月评论》2000 年第 4 期。

日元），花三年时间建成德田纪念碑。自民党、公明党、社会党的市议员们都赞成此项提案，只有共产党的市议员没有表态，这是因为日共党本部的宫本对德田的偏见所致。

1970年“冲绳回归运动”时的日共相关负责人牧濑恒二曾对增山讲过：“德田实际上不认为冲绳是大和（日本）。冲绳共产党不应从属于日本共产党。那样的话，冲绳人的自主性就丧失了”（250页）。牧濑还说：“宫本坚持把（冲绳）人民党组织解散、把冲绳的共产主义运动置于日共的中央集权之下，高安重正（战后日共的冲绳政策负责人）可能是因为坚持德田的意见而被日共开除的”（255页）。

在日本革命运动史和日共党史中，最“空白”（或者称为歪曲）的部份是在朝鲜战争时日共的军事斗争准备。《日共五十年史》把朝鲜战争定义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称日共的武装斗争是“极左冒险”。《日共六十五年史》称为“德田派极左冒险主义”，《日共七十年史》又称为“德田、野阪分裂派别的武装斗争路线的破产”。总之，这不是以宫本为正统的日共的行为，而是在中国、苏联指使下德田等分裂主义者们的自杀行为。

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在50年代，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第三共产国际）的绝对领袖，日共不可能违抗。实际上，宫本等在“恢复党籍”时承认“我们必须开始武装斗争的准备”（220页），虽然他们可能没有被安排到直接的这一类工作。但是，早稻田大学的日共支部负责人由井誓在恢复党籍后，作为惩罚，被派到东京最艰难的奥多摩的小河内工作队，准备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山村政府。50年秋天，九州地方委员会山本议长因为持有麻药而被逮捕，被新闻大肆报导为日共地下武装准备的证明。日共党员一直听信正统党史，以为那是日本政府的谎言，但后来知道那是事实。

按照本书的材料，在山村建立武装斗争据点是日共四次会议（51年2月）军事方针“志田构想”的一部份，由被麦克阿瑟肃清出日本社会的党员等两千五百多人组成五十五个中核自卫队与独立游击队（213页）。据小松丰吉证实，他看到“从日本偷渡到中国的青年组

成“日本人民军”在沿海接受登陆作战训练”（215页）。与此相关的是在与中国往返中活跃的“人民舰队”组织者永山正昭以及为了“特殊财政”（抢劫资金）组成的“卡车部队”队长大村英之助。大村曾是日共的文化部长，颇有文才，是经团连会长植村申午郎的亲戚。但他被任命为“卡车部队”队长，成为日共武装斗争失败的替罪羊，被日共在六次会议上以“贪污无耻”罪赶出日共并因此被投入监狱。大家长期以来都认为那家伙臭名昭著、罪有应得。而实际上，“特殊财政”的部份资金被志田重男贪污，在东京的神乐坂高级餐厅挥霍浪费。此事被佐和庆太郎揭露后（235页），宫本只好开除了他的这个亲信。

谁也不知道因“贪污无耻”罪入狱的政治犯大村的命运。还有小松丰吉，姐牙仁郎等成为“废物”在新宿开小面馆为生的人，他们曾经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迫害他人，最后又被党开除，无法回归社会，他们的心灵会安宁吗？与那些被敬贡在“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之墓”、被合祀在“日本共产党常任活动家之墓”（东京都八王子市上川灵园）的幸运左翼人士相比，谁去悼念那成千上万的为日本革命事业奋斗牺牲、经历悲壮人生的“无名战士们”呢？

更有甚者，在国家权力高压之下，革命运动内部弥漫着疑心重重的气氛，在“肃奸”中演出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日本革命运动内部的“肃奸”行动完全践踏了许多革命分子的基本人权。

在天皇制国家权力之下的日本革命运动，完全谈不上什么情报战略，总是在历史上要求革命运动领导人民时，被“特别高等警察”等一网打尽。在日本国家权力宣告投降的短时期内，有不少日共党员、革命人士得以进入司法、行政、立法的握有一定资源的职位。但这些人被日共如实地按照政府法令登记报告，当美国占领军改变政策、扶持被打败的日本统治阶级时，这些在行政、司法部门的人便被一扫而尽。

《战后左翼人士群像》记载到：1932年日共在工会中强制推行“打倒天皇制”计划，为此从肉体上消灭反对强制推行的工会积极分子。其中，在朝鲜人最受信赖的“全日本劳动工会协议会”的尹基协

被日共中央委员会以一票之差断定为内奸而被射杀。当日共中央的绀野与次郎命令日共东京分部负责人村上多喜雄执行决定并交给村上手枪时，村上强烈抗议：“尹绝对不是内奸！”“党中央内有内奸！”结果，尹基协被混入日共的最大内奸松村（真名饭冢盈延）枪杀。半年以后，特高警察借此机会一举逮捕四千五百名工会协议会成员，把整个协议会摧毁。曾是日共政治局委员的白川晴一回忆此事时总是落泪不止：“村上与尹都是优秀的党员啊！”

更可悲的是，全日本劳动工会协议会干部松原（本名宫上则武）、平安名常孝连日共党员都不是，却因为不推行日共计划被定为“超级内奸”、被赶出协议会并遭到日共的审问。

1933年12月，日共中央委员逸风重雄（第三号负责人）、宫本显治（第四号）、候补中央委员裤田里见（第五号）审问中央委员大泉兼藏（第一号），小铧达夫（第二号），结果把无辜的小铧杀害，把真的内奸大泉放掉，导致后来宫本等又被警察抓进牢里。裤田被日共开除后，在《致昨日的同志宫本显治》（新潮社1978年出版）中，详细叙述宫本是用柔道功夫把小铧杀害的。

由绀野与宫本等人开始的杀害“内奸”传统在战后变成私刑式的党内审问。1951年2月，日共东大支部负责人户家秀夫、不破哲三、高泽寅寅被日共隔离审问两个月，遭受了残忍的暴行（安东仁兵卫著《日本共产党私史》）。

当然，日共史上最大的“内奸”事件是伊藤律冤罪事件。伊藤于1953年被日共中央委员会以“内奸”罪名开除，但此“中央委员会”本身后来被宫本主持的六届全体协会判定为“德田分派北京机构”。后来日共的《五十年史》、《六十年史》、《六十五年史》都不提伊藤是“内奸”，而用“捣乱者”称呼。“捣乱者”与“内奸”当然有本质不同的政治意义。

日共之所以无法明确称伊藤是“内奸”，是因为伊藤在长达27年的北京监狱中始终没有认罪。当时日共北京机构的负责人裤田在牢中不断胁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认罪，就可以保住性命。”（《伊藤律回想录——北京幽禁27年》）。伊藤不但没有认

罪，当1980年9月被中共政法负责人乔石接见宣布释放时，伊藤还以为“组织”决定派他回日本从事革命呢！

当时，几乎百分之百的日共党员相信“党中央”的决定，认为伊藤是内奸。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这是日共党史上最大的冤罪，开始为伊藤恢复名誉而活动。与伊藤共同工作过的日本农民运动领袖（组织最有战斗性的常东农民运动、当过两次国会议员）山口武秀在伊藤的追悼文中愤慨地批判宫本以及日共组织的非人道性。“马车夫国会议员”木村荣（1947年四名日共国会议员之一）见到伊藤时不住地流泪，责骂宫本“不是人”。当野阪参三因为在苏联出卖同志的证据被发现而被开除后，日共又诡称伊藤的命运是野阪参三与周恩来决定的，日共中央委员会无法负责。

与宫本至今为止的顽固态度相比，曾经参与处分伊藤的藤井冠次（原NHK工会负责人）深为自己的罪过内疚不安，害得自己也脑充血、语意表达不清。

连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尊重的革命运动内部，还谈得上什么“同志之爱”？

[赵京摘译自日本新时代社《桥梁》周刊2000年10月23日-12月4日号、2001年1月29日-2月19日号，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1期。]

30. 庆祝日本废止按捺指纹制度

从今年4月1日起，强制了45年的“外国人登录法”中规定的按捺指纹制度终于完全废止了。

虽然所有的外国人在日本超过90天都得到地方政府去登录并被强行要求按捺指纹，此制度的主要对象是在日本居住的第二、三、四代朝鲜(韩国)人。1980年9月，韩宋硕在东京新宿区拒绝按捺指纹、拒绝“随时携带登录证”、拒绝“更新”、拒绝“家族登录”，成为反对指纹制度的先锋。因为拒绝按捺指纹，已经有22人遭到逮捕、107人不能再入国、6人的“在留更新”得不到批准，有一百多人还在打官司。

正是由于这些反抗斗争，日本政府在1993年不得不改正“外国人登录法”，允许16岁以下的朝鲜人后代不必按捺指纹。去年8月，日本国会终于通过决议，从今年4月1日起，全面废止按捺指纹制度。

4月2日，相关的人士在东京的韩国YMCA亚洲青年中心举行了庆祝集会。会场中还展示了1983至87年运动期间的图像和1995年去世的崔昌华的相片。大家共同宣言，要继续斗争，直到彻底废除“外国人管理法”中的其他各种歧视制度(如选举权、朝鲜“国籍”歧视等)。

[赵京译自《桥梁》周刊2000年4月10日第1628号，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0年第2期]

31.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铺路 高岛义一

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为公约的小泉纯一郎当上日本首相，尽管遭到包括中国、韩国、朝鲜等国政府的强烈批评，仍然没有改变态度，反而要求亚洲各国改变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情绪。小泉诡辩道：“参拜靖国神社，悼念那些为了今日的和平与繁荣为国捐躯的人，正是为了不再发生战争”。那么，靖国神社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设施呢？

1869年，明治政府为了悼念自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为政府而战死的属员，设立了“东京招魂社”，这就是靖国神社的前身。自从日本政府第一次海外侵略的出兵台湾（1874年）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此设施改名为靖国神社，变为显彰为天皇制国家战死的军人的中心设施。

一般的神社由民间经营，在内务省统一注册，但靖国神社一直都属于陆军省与海军省管辖，其“神官”也由陆、海军省任免。其悼念的“神”或“英灵”包括从明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死亡的246余万军人，却没有包括平民等“一般战死者”，连战时被动员起来的“铁血勤皇队”民兵、学徒后备队也没有被包括在内。当然包括东条英机等13名A级战犯在内的战争决策人都作为“昭和殉难者”被祭贡在设施内。

把天皇祭为活神的靖国神社通过各种礼仪、活动、展览，就这样成为国家政权动员民众全面投入侵略战争的工具。在这个国家神道观下，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宗教徒，都因为拒绝参拜遭到迫害。

战后，宪法明确规定思想、信教的自由（第19条）、政教分离的原则（第20条）。靖国神社按照宗教法人法注册为宗教团体，小泉以一国的首相名义参拜此一宗教团体设施，当然是违反宪法的。实际上，连自民党政府在1980年11月也不得不承认：正式参拜不能否定违宪的疑问。

实际上，1991年1月仙台高等裁判所、1992年福冈高等裁判所、大阪高等裁判所，以及1997年日本最高裁判所都确定，日本首相等以政府官员资格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反宪法的。

但对于日本统治集团而言，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形成能从事战争的“普通国家”体制的不可缺少的国民公众意识的第一步。以改宪为目标的曾根康弘在1985年8月15日首次以首相身份参拜之前就扬言：“如果我们国民不感谢那些为国捐躯的人，谁再会为国赴难？”时为法务大臣、自民党靖国神社委员会委员长的奥野诚亮元（其本人战前为秘密警察官僚，参与销毁秘密文件的行径使许多战犯漏网）更明确地叫嚣：“自卫队战士的灵魂祭奠在靖国神社，我们作为国家的代表却不能代表国家去悼念，怎么可能维持国家的独立呢？”

小泉这样迫不急待，除了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右倾、军国主义动向外，也是出于在“全球化”浪潮下日本经济的进一步衰退激化了社会矛盾，日本统治集团急于找到通向战争的途径来转移国内危机。这就是参拜靖国神社的危险本质。

[赵京译自新时代社《桥梁》周刊2001年7月16日第1690号，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9月]

32. 大量失业与小泉政权的破坏雇用政策

高岛义一

今年7月的完全失业率，自从1953年的调查以来，首次突破5%的大关，失业者人数达330万人。当然，实际的失业人数远不止如此。

按照日本的失业统计方法，即使在调查月的最后一周有一个小时收入，都不叫「完全失业者」。与此相比，法国的失业者是指每月工作36小时以下的人。另外，那些在每月最后一周没有找工作的人，都被划为「非劳动人口」。根据日本政府总务省今年2月的「劳动人口特别调查」，所谓希望就业却没有就业机会的「非劳动人口」达982万人。这样算来，日本实际上有1,300多万的失业者，失业率达17%。

就此，小泉对记者答道：「在改革期间，失业者增加是不可避免的。」厚生省5月3日的协议会上，小泉提出改变以终生雇用为前提的现行雇用制度，「如果企业可以先雇用两、三年，再可以自由解雇的话，就可以增加雇用。」实际上，各企业已经在削减正式职工的雇用，大量雇用临时工、派遣（合同）工人了。现在，不仅中高年劳动者，连大学、高中毕业生也越来越多地刚出校门就找不到工作而失业了。

那么，是不是日本真的缺乏工作机会呢？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东京都产业劳动局今年4月发表的「关于劳动时间管理的实态调查」，39.4%的工人有免费加班，16.6%的工人要把工作带回家裡加班。日本实际的劳动时间应为标准（正常）年间劳动1,800小时，加上300小时的加班时间，比欧洲工人的年1,500小时多50%。如果把这些时间的劳动量雇用失业者，日本会出现人手不足的现象。

所以，我们应该要求取消免费加班、取消加班制度，制定35小时工作周制度，制定限制解雇的法律，赋与临时、合同工人同样的社会保障权利，增加医疗、福祉、教育、防灾等公用范围的雇用。

[赵京译自日本新时代社《桥梁》周刊 2001 年 9 月 3 日第 1696 号，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 年第 4 期]

33. 太极旗是朝鲜民族的象征吗？

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本来与民众生活无关的太极旗突然飘扬在韩国的大街小巷，成为朝鲜民族的象征被崇拜起来。

120年前，朝鲜因为云扬号事件受到日本的侮辱，被迫开放门户。当时的朝鲜派往日本的使臣金弘集一行从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一书中受到启发开始设想“朝鲜国旗”。黄遵宪劝告朝鲜人就用清朝的龙旗，向世界宣示朝鲜是大清帝国的属国。朝鲜政府询问清朝该用哪种颜色，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回答用清朝的四角龙旗即可，但朝鲜“国旗”的龙爪只能有四个，以示诸侯国与天子国（五只龙爪）的不同。朝鲜政府没有采纳。

太极旗被广泛认知为另一个驻日本使臣朴庸和（音译）在其一行到达神户时首次飘扬在他们的住屋上。那么，这第一面“朝鲜国旗”是如何诞生的呢？

从记录马建忠（清朝派驻朝鲜使臣、主导签署朝鲜与美国通商条约）与金洪吉（音译）对话的《清国问答》上知道，正是马建忠提议在白布上画上太极并配置八卦作为朝鲜的国旗。朝鲜在壬午军乱后被迫与日本签署济物浦条约，朴庸和作为使臣被派往日本去谢罪，在开往神户的日本籍“明治丸”一船中设计朝鲜国旗时匆忙决定用马建忠的图案。明治丸船长是英国人詹姆斯，当时的英国驻朝鲜领事伊斯坦也同行，他们觉得八卦太复杂，建议只留四卦，并旋转45度，更显美观。太极旗就是这样诞生的。

朝鲜文化中本没有《周易》、八卦的传统，怎么把太极旗朝鲜化呢？1957年“国旗保养会”著的《国旗解说》宣称自从檀君圣祖以来朝鲜就把太极八卦作为国旗利用。1995年大韩民国国旗宣扬会在举办太极旗变迁史展览会时宣称1392年的梵钟上就刻有太极旗，但谁也未见过这个梵钟。李承晚政权下的文教部长等特别从埃及、罗马、希

腊、拜占庭等古代遗物中找出与太极、八卦有点类似的地方，说明太极不是中国的特产，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宇宙观。

当然，除了韩国政府的曲解、利用外，在抗日独立运动以及光州事件这样的民众运动中，太极旗也确实被民众作为正义的象征飘扬。朝鲜统一后还会用太极旗作为国旗吗？这要看朝鲜将如何实现统一了。

[赵京编译自日本新时代社《桥梁》周刊 2002 年 7 月 15 号转载的韩国报刊，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2 年第 3 期]

34. 从日本银行买进私营银行股份看日本金融危机

高岛义一

今年9月18日，日本（中央）银行召开政策委员会会议，为了避免越来越深刻的金融危机，决定直接买进私营银行的股份。这意味著日本银行不惜以中央银行的财务健全性以及日元这个国际通货的信任性下降为代价，把日本的国有资金投入，以支撑股票市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政策，由中央银行操纵股票市场，虽然可以一时延缓金融危机的爆发，但会加重股票、债券与日元通货同时暴跌的危机，显示日本经济已进入走投无路的死胡同。

与世界股市全面下跌同样，日经平均股票价格在9月以来跌破8千日元大关，回到20年前的水平。各大银行的股票损失早已超过4万亿日元，根本不可能决算。特别是银行界必须按照国际决算银行的新基准在04年9月为止减少股份在“中核自身资本”（资本金等）以下，这迫使银行要大量卖出与大企业的相互持有股份，必将导致股市的进一步下落。

今年3月底时，12家大银行的股票价值为25.6万亿日元，中核自身资本为17.3万亿日元，有8.3万亿日元的股票必须卖出。但是，如果银行把持有的临近破产的大企业的股票抛出，只会加速这些企业的破产，更降低股市，使银行的股票损失更加重，陷入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恶性循环。而且，这些银行股份找不到买主。

日本在今年1月曾设立“银行等股份买进机构”，准备4万亿日元消化银行放出的股份。不过，为了防止股市过份下跌带来的损失，银行必须支付卖出股票价格的8%。这使得银行不情愿卖给这个政府机构。这一次的決定，取消了这个8%的支付条件，当然受到银行界的欢迎。日本银行准备以国有资金填补亏损，并放置10年不会卖出。正如《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媒体9月19日的评论所示，这实际上是强迫全体国民分担股市危机的“杀手锏”，已经违反《日本银行法》的规定了。

实际上，日本银行早已丧失了中央银行的立场与功能，在用尽了减低利息（已经为零了）、每月购入 1 万亿日元国债等等手段后，再开始买进明知在下跌的股票，把日本国家推向破产。可以预想，超过 30 万亿日元的国债发行必将导致国债暴跌，引发持有大量国债的银行的危机，促使大量资金週转短缺的企业连锁地破产，把普通民众强制推到更底层的失业与贫困状况中。

[赵京节译自新时代社《桥梁》周刊 2002 年 9 月 30 日号，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2 年第 4 期]

35. 世界水论坛推行水的商业化和私有化

小林秀史

世界水论坛于3月16日至23日在京都、滋贺、大阪召开。这是继1997在摩洛哥、2000年在荷兰召开的会议的第三次，有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地区的近八千人参加。论坛包括“水与贫困”、“水与管制”、“水与粮食、环境”等22个论题、249个科目以及部长会议和一连串活动。

水资源已经成为人类21世纪前期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报告，因为水资源的污染和浪费，人类在21世纪中期可能会有70%的人口面临供水不足的问题；人活动每排出的一升水将污染八升淡水；人类可用的水量，在今后20年间，将减到现在的三分之二。

主持世界水论坛的世界水委员会“作为有关水的国际政策研究的思考库，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水资源学会等国际机构与学会为中心，于1996年设立”。在2000年荷兰海牙会议上发表的“水规划”中，提倡“所有用水要导入价格设定”、“大量增加水的投资”，要求全面导入市场原理，让跨国公司来控制用水。

对此，国际公务员工会等组织共同发表声明，主张“清洁健康的环境和基本的上、下水道利用”是普遍的人权，不能象商品那样去买卖。关于水的利用，必须从WTO等服务·贸易组织协定中废除。

但是，世界水论坛的目的仍然是推行“缓和管制·私营化”路线。在“部长会议宣言”中，强调“活用民营资金与技术，建设安全饮用水和下水道设施”，并提议增加“官方、民间共同运营模式”（《每日新闻》3月5日）。3月7日的《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年内可以把水道业务面向民间开放”：“供应生活用水的水道业务有三万亿日元的市场规模；虽然同为公益业务，电力和煤气可以民营，水道业务却被地方政府独占；开放后可望得到外资企业的投入。”

实际上，从去年 9 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地球环境首脑会议上看来，跨国公司在“有效利用资源、能源”，“保证环境商业可行性”的旗号下，要求废除各种政府管制，确立全球范围内的寡头支配。这一次的世界水论坛就是为跨国公司支配水资源服务的。

为此，日本的非赢利、非政府组织将在 3 月 22 日举办“从 NGO 看世界水资源问题”的研讨会，邀请所有被排除在世界水论坛之外的组织和个人参加，并向市民传达按照住民意愿决定用水政策。

[赵京译自新时代社《桥梁》周刊 2003 年 3 月 17 日第 1772 号]

36. 日本国民保险制度的崩溃

日本政府社会保险厅 2003 年 7 月 24 日公布国民年金（保费）的状况如下：2002 年度的保险金缴付率为 62.8%，比上一年度减少 8.1%，为历史最低水平。所有年龄层，所有都道府县都呈减少趋势，而年轻人最为显著：25—29 岁的缴付率为 49.4%，20—24 岁缴付率为 47.4%。

在社会保险厅对未缴付者的调查中，64.5%回答“保险金额太高，经济上很难缴付”，15%回答“不对国民年金报希望”，4.5%回答“缴付多于所得”。未缴付者中有 53%加入私营的人寿保险，11%加入私营的个人年金保险。

引起缴付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金额免除基准的强化。2002 年度金额免除者是 144 万人，为 2001 年度的一半。这 144 万不符合免除基准的人中，只有 14.5%缴付保险金。这可以说是经济萧条状态下的实况吧！另外，从 2002 年度开始，年金征收的业务由各市町村移管到社会保险厅，专职人员不足，也是缴付率下降的一个原因。

国民年金制度是为自营业主、农林水产业者、无职业者、学生等设立，2003 年 3 月底有 2237 万人加入。保险缴付额是每月 13300 日元，加入 25 年后满 65 岁开始领取年金。加入 40 年可以得到每月 6 万 6 千日元，不到 40 年的领取额逐步减少。

在公司和政府部门工作的职员，由单位在发薪金时自动扣除“厚生年金”与“共济年金”部分，没办法选择。否则，许多人也会拒绝缴付的。³⁸目前，日本政府正在策动“强制征收”立法来提高国民年金的缴付率，以支撑崩溃的国民年金保险制度，真可谓本末倒置。

[赵京]

³⁸ 译者在日本公司工作时，明知不可能领取年金，曾要求免除缴付厚生年金，未果。

37. 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保守化

2003年11月9日日本众议院480席位全部改选，在300个小选区（即只选出一人的选区）中，社会民主党只获得一席，共产党未获一席。在比例选区的180个席位中，社会民主党只获得五席，共产党获得九席。这样，自战后以来领导反对党政治的两大政治势力，在今日的日本众议院中加起来也只有大约3%的席位。

社会民主党的席位从18降为6席，其“党首”，原社会党委员长土井连盘踞几十年的选区也输掉了。土井的政治生命已经接近尾声，如果她辞去“党首”职务，社会民主党就没有全日本知名的人物了，作为政党的生命也将宣告终结。曾经在1956年获得166席位的社会党演变到今日的社会民主党小团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非常独特的教训。

日本共产党的席位从20席降为9席，并没有教育其上层集团反省其不断右倾、保守、甚至反动化的路线错误，反而会加速其进一步融入入现行体制中，力图靠巴结“野党”民主党讨一个政府大臣位子。

在为数不多的十来名独自参选人中，唯一的一名进步市民派女士川田悦子也未能保住席位。在这个选举中成为最大赢家的民主党（177席位），由自民党的最左、最右派别分裂出来招纳大部分社会党议员组成，与自民党并没有多大差异。日本政治的结构在国会级别，已经确定成为美国式的两大执政党轮流坐庄的体制，为进一步修改和平宪法、迈向军国主义提供了立法上的保证。

[赵京，2003年11月9日，美国圣何西]

38.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资本主义法律体制

高岛义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于10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此会议的最大特征就是接受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强烈要求，维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撤消所有限制私有资本积累的经济政策，从法制上确立已经变成资本主义体制的中国经济体制，以便在明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修改宪法，明确加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条款。

在“关于经济所有制的决定”中，股份制被规定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非重要产业的国营企业将被私有化，由市场决定其命运，同时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关于金融改革的决定”中，除了确认正在全面进行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外，将把中国人民银行以外的所有国营银行都民营化。在“关于对外开放的决定”中，以WTO规则为最高“宪法”，保证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地位，同时推动中国企业积极向跨国公司转化，成为全球资本化的主角之一。

中国经济已经全面完成向资本主义体制的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中共官僚体制用“反革命”罪残酷镇压劳动民众的抵抗，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提供最大的保障。中国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了。

例如，四大国营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于2002年7月在香港上市，正准备在纽约上市。它与美国摩根斯坦莱合资成立的中国最大对外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就是金融投机。中国的国营银行已经作为资本主义金融赌博的一个赌徒登场了。与日本的8百多万个人投资者相比，开设10年的中国证券所已经有6千多万“股民”了。实际上，在亚洲自由贸易协议FTA的形成过程中，中国政府已经越过日本，主导跨国资本的全球化了。

自从去年11月中共第十六次修改党章，把中国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转变为“全民政党”以来，大量的资本家入党，在“五·一

劳动节”中也有许多资本家受到表彰。中央党校的御用文人们登场解说资本家的贡献大于工人，反映出资本家阶级进一步影响、掌握中共和国家权力的现实。

从另一个层面上，在中国的统治阶层完全与资本家阶级结盟，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之后，中国民众的斗争，将不仅仅停留在反抗本国统治集团的范围内，而具有更深远的世界意义。这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继续，需要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度里的劳动阶级的支援与帮助。

[赵京译自新时代社《桥梁》周刊 2003 年 11 月 17 日第 1805 号，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3 年第 214 号第 30 卷第 3/4 期]

39. 强烈抗议立川警察署与东京警视厅压制言论自由

2004年2月27日，立川警察署与东京警视厅以“非法入侵住宅”为由，逮捕了三名向自卫队基地的住宅区邮箱内散发反战传单的市民，并对他们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搜查，没收了书刊、电脑等。

3月3日，51名在日本的大学从事法律教学的学者联合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警察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他们指出：

一、邮箱内散发传单，并不构成刑法一三〇条“入侵住宅”罪。邮箱与大门内的住宅不同，是外部与私有住宅的联系空间，从来没有听说因为有人向邮箱投入广告而被逮捕的例子。

二、警察采取的手段，意图是要切断自卫队士兵与市民的接触，这违反了宪法第二十一条保障的言论自由。其实，自卫队派兵伊拉克，本来就有违宪的嫌疑，对此感到忧虑的市民通过邮箱这一交流途径与自卫队士兵交换意见、交换情报，是很普通的方式，无论如何不会构成“入侵住宅”的刑事犯罪。

三、对于没有犯罪的市民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搜查、没收，才是真正的“非法入侵住宅”罪。

总之，警察的这一次行为，已经对保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基干构成了挑战，动摇了民主主义的基础。我们强烈抗议这个压制行为，并要求立即释放这三名无辜的市民。

[赵京译自新时代社《桥梁》周刊2004年3月15日第1821号]

40. 现代日本社会急剧增长的高龄犯罪 义

2004年5月31日NHK电视台播放了“急剧增长的高龄犯罪”特集，报道说尾道市的高龄监狱已经满员，服刑者平均年龄74岁，监狱的走廊里排放着轮椅、步行器等。有的犯人还需要护理，每天早上要给他们发药袋。当然，犯人们每天必须工作6小时，这对于高龄者并非易事。

监狱中许多人是65岁退休后才初次犯罪的，80%以上是重复犯罪，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出狱后一年内再次入狱。例如，有一对73岁的夫妇，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去夜间小店偷东西被抓获。一个单身的心脏病患者，因为护理他的人不肯继续护理，发生口角而打伤了护理人员。一个从北海道刚出狱的老人，到他唯一的亲戚弟弟家里被拒绝，身无分文的他便到餐厅里大吃大喝一顿，餐厅的人叫来警察把他再次送回监狱。

一位83岁的老人出狱时，照例接受监狱长的鼓励：“恭喜你获得自由，从今以后，要找一个正当的工作，自食其力。”对于没有亲戚帮助的83岁的老人，到哪里去找雇用他的雇主？他们要租房子时，没有保证人、保证金是不可能的。而没有住房，他们也就无从接受生活的保护。他们已经被这个社会抛弃了。

为什么日本比别的工业发达国家多出许多倍的高龄犯罪呢？日本社会的高龄化背景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不健全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却是直接的原因。日本的年金制度要求交纳40年的保险，才能领到每月六万日元的国民年金。领取年金的最低资格是交纳25年的保险，如果差了一个月，就领不到分文年金。日本社会目前有890万人靠只领取年金生活，占高龄者人数的59.6%，其中近半数的人只领到三万日元。如果要付房租的话，每月三万日元是无法生存的。日本宪法保障的“最低限度的健康、文化生活权利”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再考虑到日本的年金制度本身不但没有得到加强、改善，反而趋于崩溃（连多数国会议员也不交纳年金保险）这一现实，日本贫困的社会保障更体现出现代日本社会的危机。正是因为看不到退休后的生活保障，日本中高年龄层的自杀、过劳死也急剧增加。小泉的所谓“自己负责”口号下的年金制度进一步恶化，正在把高龄者们推向监狱。

[赵京译自新时代社《桥梁》周刊 2004 年 6 月 7 日第 1832 号]

41. 抗议日本政府长期拘留外国人的不当行为

北野

2004年10月13日傍晚，约有40个民间团体的750人在日本法务省前围成人轮，把法务省大楼几乎完全包围，抗议日本政府长期不当拘留外国人，要求保障1435名被无罪“收容”的外国人。除了当事者外国人的亲身诉求外，国会议员福島瑞穂、嘉納昌吉也到场致词。被拘留在东日本入国管理中心（茨城）、东京入国管理所、西日本入国管理中心等处的外国人也通过24小时绝食、联名抗议等形式配合这次行动。

在美日的“对恐怖主义战争”借口下，在日本的外国劳动移民面对越来越严酷的压力。日本政府去年公布了“五年内减少一半非法在留者”，通过入国管理局的网站公开鼓动日本人提供“非法在留者”的情报，加剧了强制遣送外国人的行动。

抗议团体向法务大臣提出下列要求：1、不得拘留无罪的外国人，特别是难民申请者及其家属、儿童、老人、孕妇、病患者等。缩短拘留时间。2、尽可能批准难民及其家属、儿童、老人、病患者等等的在留资格，特别要废除“难民锁国”的政策，展开停止政治迫害的和平外交。3、制定并实施多民族·多文化共生社会的政策。

[赵京译自新时代社《桥梁》2004年10月25日第1851号]

42. 安倍政权粉墨登场

2006年9月26日，以“建设美丽国家”为旗号的日本安倍晋三新政权正式成立。除了自民党内部各派系的论功行赏外，安倍也塞如了他与他亲近的右翼国家主义集团的代理人士。例如，它设置的五个“辅佐官”（国家安全、经济财政、朝鲜绑架问题、教育再生和広報宣传）就是典型的代表。安倍模仿美国白宫的能集中信息、快速决定的机能，加强首相官邸的权力。

从短期来看，安倍首先必须打破前任小泉纯一郎留下的对中、对韩外交僵局，收敛起未当首相之前的露骨右倾军国主义言论，获得了于十月访问中国、韩国的机会。就在安倍出访期间，传来了朝鲜进行核试验的消息，这将加速日本在安倍执政期间向右倾军国主义的转变，特别在如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在未能修改宪法之前，践踏宪法，以政府的正式立场允许日本行使“集团自卫权”。所谓“集团自卫权”，实际上就是在美日安保条约下把日本“自卫队”派往世界各地的权力。日本宪法第九条本来明确规定日本不得拥有军队，但日本政府以“专守防卫”的借口建立、扩张世界第一流的“自卫队”海、陆、空军。现在，正如安倍把自卫队侵占伊拉克赞为“历史上的伟业”一样，日本的自卫队不仅只限于保卫日本，也可以用于“保卫”与日本结盟的“集团”（目前日本的军事同盟国只有美国）。例如，当日本的盟国美国自称受到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首先发动战争“自卫”时，日本基于“集团自卫权”也可以与美国一同参战。

二、完成小泉任期内未能通过、保留“继续审议”的“共谋罪”法案。此法案的根本性格就是制造“警察国家”那样的监视社会，使人们在思想、言论上都制约自己，远离任何反对政府的行为、活动。日本政府以“国际组织防止犯罪条约”为理由推动“共谋罪”法案，但据日本律师联合会的调查，连美国都以各州法律不同为理由对此条约的第五条有所保留，并没有强制设立“共谋罪”。如果“共谋罪”法案通过，安倍政权将进一步推行计算机通讯监视法案，把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通讯秘密”的自由也践踏掉。

三、修改教育基本法，限制民主、人权的内容，突出“爱国心”教育，把拒绝演奏、齐唱“君代”（天皇国君千秋万代）国歌、起立致敬“日丸”国旗的教师开除学校。这在以石原慎太郎为知事（市长）的东京都特别突出。值得庆幸的是，9月21日东京都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十六部判决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强制演奏、齐唱“君代”、起立致敬“日丸”是违宪、违法的，必须向受处分的教师、学生支付慰问金。可以想像，安倍政权会多么急迫地想修改现在的教育基本法，让法律为国家权力服务。

四、修改劳动基本法等劳动契约法规，特别是在就业保障方面，把创造了“日本奇迹”的带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日本式资本主义转换成自由放任的英美式残酷竞争体制，配合日本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右倾、军国主义化。

五、日本统治集团已经成功地在“冷战”结束后垄断性地控制了国会等立法机构，自民党、民主党、公明党等已经占据三分之二以上席位，足够修改现在的和平宪法。当然，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还牵制着日本统治集团立即修宪的企图。安倍任内，可能会完成“修宪程序”法案，同时也进一步诱导国内舆论，为下一个政权的正式修宪开路。

被逼入“核武器试验”死角的朝鲜北方正是华盛顿的帝国主义、东京的军国主义和北京的一党专政的恶果。实际上，由于美国深深陷入阿富汗、伊拉克侵略战争泥潭之中无法自拔，又得加紧对伊朗的威胁，没有能力对应朝鲜危机。只有日本不顾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自行实施制裁。以“核武器威胁”为借口的安倍政权将会更肆无忌惮地推行极右强权的军国主义政策。

[赵京，2006年10月15日，美国圣拉蒙]

43. 悼念新美隆律师

内田雅敏

去年12月20日，才59岁的新美隆律师因病去世。自从1974年为抗议福特总统访日的斗争进行辩护以来，新美参加了叛军士兵裁判、阻止三里冢机场建设决战、机场管制塔斗争裁判、电通工会反裁判员裁判，以及中国被害劳工的“花冈事件”诉讼等战后补偿裁判、在日外国人强迫按捺指纹问题、因国籍而在工作中受歧视问题、直到最近东京都要驱赶东京朝鲜第二初级学校的“枝川诉讼”等等。大家都熟悉这位总是为弱者权益战斗的有信念的律师。

新美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权律师呢？那要从三十多年前他刚跨入律师行业的震惊日本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事件开始。

1974年8月30日，东京都内繁华区的丸内街的三菱重工总部被爆破，造成八人死亡和多人受伤。到这一年的冬天，间组（建筑公司）、大成建设、鹿岛建设江户川作业所、三井物产、帝人研究所等公司又相继遭到爆破，一个听起来很不顺耳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组织的“狼部队”、“大地之牙”等名义发表声明对事件负责。其声明概要如下：“日本在侵略中国等处的战争中屠杀了数千万东亚民众。但战后日本不仅不反省战争罪行，反而利用赔偿问题继续经济侵略、榨取东亚人民、掠夺资源、破坏环境。而正是这些建筑公司、贸易公司成为尖兵、祸首。今天，我们与东亚人民站起来展开反日武装斗争。”这是非常先驱、前卫的理念和行动。我们当时都没有理解这一层含义。我们那时只有阶级斗争的概念，不理解为什么“反日武装战线”这个怪物不去爆破自卫队、警察署、政府大楼等国家权力，而去找私营企业的麻烦。伴随当时的新闻媒体，我们也以警察、检察当局用语“魔鬼”、“冷血动物”来看待这些人。当我本人看到1975年5月19日晚刊的逮捕报道时，首先感到的是：谁敢为这些人辩护？只能由政府指定律师了。

在这种全社会非难的气氛中，“救援联络中心”出面了。联络中心完全出于人道的理念，对于弱者伸出救援之手。我接到联络中心的

要求，答应下来，却完全不能理解这是些什么日本人，为什么要为他们辩护。反日武装战线的战士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对于法庭上的裁判斗争丝毫不抱幻想。实际上，“大地之牙”的齐腾和就在被捕后用携带的剧毒自杀了。这些战士认为来辩护的律师是警察当局派来的特务，完全不信任律师。许多律师也借故脱身，到了公审开庭阶段，只剩下五名刚从事律师职业的年青人：庄司宏、高桥耕、铃木淳二、新美隆和我。

我经过半年的辩护活动，开始理解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各位的逻辑和偏窄性。实际上，“狼部队”的大道将司就承认爆破三菱重工的方式不对，把自己孤立于大多数日本人民之外了。在以后的十年法庭斗争中，我们五名律师谁也没有退缩，一直打官司到最高法院。其间，我自己也因为抗议法院的蛮横被警方用“关于维持法庭等的秩序的法律”关进东京收容所十天。以此事件为契机，法务省、检察厅甚至提出所谓“免除律师”法案使得法院可以在律师缺席的情况下判决。我们日本律师协会全力以赴，为阻止此法案而斗争。这真是难得经历的辩护斗争。

这次事件的中心其实被检察当局隐瞒下来，连警察也不知晓。实际上，“狼部队”的各名战士原来制造炸弹是准备在荒川铁桥上安置好爆破8月15日（日本战败日）从那须休养宫回东京出席战死者追悼会的日皇的列车！“狼部队”在前夜安置炸弹时遇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现场察看，只好放弃原计划。他们感到挫折之际，突然看到韩国文世光枪击朴正熙总统事件的报道，下定决心把没能利用的两个炸弹用于爆破三菱重工公司。检察当局生怕影响重大，把列车爆破关连的资料全部锁进金库不让警察和外界知道。所以，当我们辩护律师团从“狼部队”各位听到这个计划时深感震惊，不知如何处理。那时，日皇正准备首次出访美国，如果社会上知道了此计划，说不定有些极端右翼势力会危害“狼部队”成员的家族。我还记得我们如何把关于此计划的纪录藏起来的紧张感。

不知道怎么搞的，朝日新闻最终把此计划报道出来，“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爆破事件的中心罪名就转成“天皇列车爆破未遂事



件”，“狼部队”的各成员被判处死刑，关进小营监狱（未执行）。那些终身在监狱中服刑的成员以及劫持飞机后转战在阿拉伯世界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斗士们（插图为在阿拉伯世界中驰名的日本赤军战士冈本公三），是如何看待本来该遗臭万年衰亡下去的天皇却在 1989 年死去时被为政者利用成为全民祭奠、备受哀荣的呢？

今天，日本产生了战后出生、不知战争为何物的首相要简单清算战后的日本民主制度，我们怎么不怀念新美这样的为民主、人权奋斗的律师呢？

[赵京译自新时代社《桥梁》2007 年 1 月 15 日第 1960 号]

44. 夕张市是如何破产的

矢野薰

2006年6月，北海道的夕张市正式宣布破产，变成“财政再建团体”。这是自1982年福冈县赤池町宣告破产以来历经十四年发生的事情。夕张市负债总额是632亿日元，1万3千人口每人平均负担近5百万日元。今后20年内夕张市为了还债，只得大量减缩市民服务；同时，有不少市民已经开始外迁。这是“自治体破产制度”导入以来，把自治体（地方市、县等）放入“市场”的波涛之中，把政府的运行置于“市场”和银行的控制之下，让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崩溃下去。

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自从泡沫经济破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就开始扩大。去年读卖新闻对全国市、町、村的调查（回收率97.6%）结果，有52个自治体答复将变成“财政再建团体”，可以预料将会有新的夕张市出现。一般新闻报道都把地方财政危机归罪于地方政府“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经营感觉”，有的干脆直接说是地方住民的责任（因为他们选出了“放纵经营”的政府），应由他们自己负责。这是很站不住脚的。

就夕张市而言，这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产生并成长起来的。自从1891年开始采炭以来，夕张市作为煤炭镇以三井、三菱系列的企业为主，一直为国家生产，在最盛的1960年有24个矿井，人口达到12万人，但随着国家能源产业的转换，自从七十年代以来，三井、三菱等企业相继撤退，九0年三菱关闭矿山后，完全停止了煤炭生产。³⁹

³⁹译者就职于日本公司时，从事“地域开发”相关的调查、咨询工作，对此报道印象深刻。除了经济因素外，把工人集中起来进行相同工作的煤炭产业很容易使工人团结起来。在三池煤矿的罢工斗争中，差点造成政府警察镇压工人的惨案。所以政府很害怕煤矿工人的政治诉求倾向，有意图地解散这个产业的工人。

这些企业在撤退时，把附属的基础设施、服务设备卖给夕张市，让夕张市负担总额达 583 亿日元的“矿山关闭处理对策费”。此时，日本处在“泡沫经济”的高潮，全国各地都在政府的鼓动下大建游乐园以“振兴地域经济”，夕张市就只能向“观光都市”转换，计划“煤炭历史村”、滑雪胜地、电影节等等，为此不得不大量举债。其结果可想而知，在有名的“海底散步”（宫崎县）、“志摩西班牙村”（三重县）等所谓的“第三形态”（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法人团体）⁴⁰投资事业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夕张市的“地域振兴战略”只有失败一途。与那些撤退的企业（如松下兴产）不同，夕张市为了保护当地的那些依赖滑雪场、旅馆生意的小业主，只得忍痛买下明知不能赢利的滑雪场、旅馆等。这就是所谓的夕张市政府官员“缺乏经营头脑”的证明。实际上，这正好说明日本政府推行的“振兴地域”的巨大开发政策，是为了给大企业提供赚钱的机会，以“观光产业”使地方的原有矿业、农业、渔业等彻底衰落，把负债留给地方政府。⁴¹

使地方政府破产的最大因素是日本中央政府为了恢复经济实行“地方交付税措施”，其实质是把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负担的公共服务等转嫁给地方政府。各地方政府“各显神通”，但不外乎把公共服务“外包”、转手给私营企业。这不仅造成公共服务的缩减，还造成各种事故。例如，富士见野市把市营游泳池委托给企业管理，削减了四成经费，却酿成了中毒事故。我们最近听到的建筑公司谎报耐震强度的报道，也是因为本该由政府检查的事情让企业去干才发生的。

日本政府去年进一步推出“市场化试验法”，让所有公共服务都由企业竞争承包，为企业提供 50 兆日元的商业机会，我们今后将不

⁴⁰见本书“日本官私合营第三形态七成陷入赤字”。

⁴¹译者曾在世界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系列任职。电通利用在媒体、政府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向日本每一个地方政府推销雷同的“振兴战略”。译者曾经为静冈县有 8 万人口的滨北市模拟计算一个大型体育设施的投资回报计划，用于说服市议会批准。后来从报道上得知其市长因为在这个项目中受贿被逮捕，这个导致滨北市破产的项目没有上马，真是滨北市民的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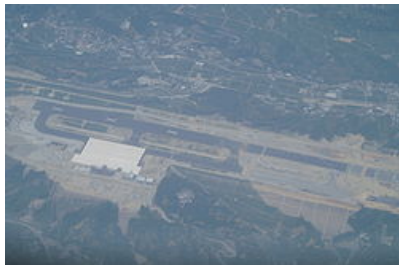
再可能利用免费或便宜的游泳池、公园、体育馆、公共交通了。这与国际货币基金 IMF 向债务国强行推销的“结构性改革”（将公共服务私营化）计划同出一辙，把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从经济、财务上解体。

回忆起 1998 年，日本政府未追究银行的金融犯罪和投机失败，向濒于倒产的都市银行注入与国家预算规模相匹敌的 60 兆日元税金，今天对于一万三千市民的夕张却见死不救，这就是安倍首相所声称的“美好日本”的写照吧！夕张的破产，市民们作为受害者，将在今后几十年中为付费而挣扎；市政府的官员们负有一定的“经营”责任，但最大的祸首是推动“地域开发振兴”的国家和获利（或转嫁债务）的大型企业。

[赵京译自新时代社《桥梁》周刊 2007 年 1 月 29 日第 1962 号]

45. 静冈县民抗议开发机场自焚身亡

当我九十年代初在静冈县的一家咨询公司就职时，就知道在石川知事（县长或州长）推动下修建新的静冈机场（插图）的计划。那时候，虽然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石川等官员宣称日本经济 3-5 年后会复苏，而机场建设是长期发展计划，现在建成正好为几年后的经济成长所利用。我所在公司的顾问曾经是石川的秘书，积极为公司在机场开发的过程中试图拉一笔生意。



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日本的泡沫经济不可能再现，连“关西空港”那样的最大机场都由于人流不足陷入深刻的赤字，使大阪市宣布“财政危机”，静冈这样的中等城市更没有指望会有大批乘客涌来。静冈的县民们十几年来，组成“不需要机场县民会议”，以各种形式阻止机场的强行施工。特别是反对修建机场的拥有附近土地的农民，把前来测量、施工的县政府官员、公司职员阻挡住，从法律程序等方面挑战石川当局的强制决定。石川原是日本中央省厅的官员，返回静冈竞选知事成功后，利用关系得到相关省厅的支援（如补助金等），听不进“八成县民不会利用此机场”的调查和“每年五亿日元赤字”的分析报告，一意孤行，不建成机场死不干休。县民们的抗议也达到了极点。

终于，一位 58 岁的县民在 2007 年 2 月 6 日留下抗议信后自焚身亡。抗议信原文如下：⁴²

“至石川嘉延：

阁下违反县民的意愿，强行修建静冈机场。现在使用强权夺取农

⁴²译自新时代社《桥梁》周刊 2007 年 3 月 12 日第 1968 号。

民的土地，把众多的支援农民的县民强力排除掉，用谎言让县民为毫无必要的机场永久浪费税金。你与那些把机场吹嘘得如何有用的欺骗县民的建筑业犯罪者们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将为县民留下百年的祸根。面对这样的不能饶恕的罪恶，我今天以生命为代价表示抗议。

静冈县民 井上英作”

面对这样的静冈县民，以石川为代表的当局还会继续开发静冈机场吗？

[赵京]

46. 日本政府推动在靖国神社“合祭”战犯

最近，日本国会图书馆发行了《新编：靖国神社问题资料集》，暴露出日本政府厚生省推动靖国神社共同纪念包括 A 级战犯在内的战死者。

至少从 1958 年 4 月开始，厚生省援护局就开始建议先悄悄地把 B 级战犯以下的战死者收入靖国神社合祭。靖国神社于 59 年开始实行。为此，援护局复员课在“内部联络”中特意指示：“鉴于将来合祭在实际上会出现麻烦，希望不要对外公布合祭中也包括上述战死者的事情，让事态随着舆论的反应自然地推移。”

1958 年 9 月的时候，厚生省鉴于“新闻界怎样报道此事会带来国民什么样的反应，非常严重”而没有讨论 A 级战犯的合祭问题。但 1966 年厚生省却把 A 级战犯也记入“祭神名册”中交给靖国神社，在 1969 年的两者会议中决定了也合祭 A 级战犯。在那次会议中也决定不对外发表此事。

靖国神社从 1978 年以后才开始合祭 A 级战犯。可惜这次公布资料只到 1970 年为止，至此以后的厚生省与靖国神社的互动关系不得而知。尽管如此，靖国神社合祭包括 A 级战犯在内的战犯，是由日本政府暗地里主导的事实，却非常明确，是对宪法第二十条“政教分离”原则的践踏。进一步讲，厚生省把“遗族援护法”规定的“公务死”名单交给靖国神社，就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为此，在 1991 年仙台高等法院对岩手靖国神社的诉讼，1997 年 4 月最高法院对爱媛玉串料支出的诉讼，2004 年福冈地方法院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诉讼，2005 年 9 月大阪高等法院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诉讼，都做出了违宪的判决。

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的日本外交危机为契机，日本支配阶层在考虑“A 级战犯合祭”、“靖国神社的非宗教法人化、国营化”、“建立非宗教的国立战死者追悼设施”等等，并放出“昭和裕仁天皇

也不高兴去靖国神社合祭战犯”的记录。在自民党 2005 年 11 月传出来的“新宪法草案”中，虽然也加入第二十条“政教分离”，却套上“超出社会礼仪或习俗社会的范围”的定语来限定宗教的含义，让政权可以与不“超出社会礼仪或习俗社会的范围”的宗教结合，使“政教分离”的原则名存实亡。这一切，当然是为了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让被派遣到海外侵略而战死的“英灵”能够以国家的名义被追悼、祭奠、赞美。

[赵京译自新时代社《桥梁》2007 年 4 月 16 日第 1973 号]

47. 福田政权的修正路线走向

一年前，笔者以《安倍政权粉墨登场》简要介绍了试图“克隆”（低劣冒仿）小布什政权的安倍内阁的丑角特征。战后出生的安倍狂妄地把推翻日本宪法中的和平条款设定为自己最大的政治目标，妄图在自己的任期内把“集团自卫权”合宪化。所谓“集团自卫权”就是指当日本的军事同盟国（目前只有在“安保条约”体制下的美国）行使“自卫权”（例如小布什政权“预防性自卫”侵略伊拉克）时，日本“自卫队”海外出兵“集团”参战，是符合宪法中的“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条款的。

这样的“法匪”逻辑在安倍登场后的一个月以后的美国期中选举（2006年11月初）中落为泡沫。在安倍的主子小布什无法控制美国



参、众两院的情况下，日本的选民在今年七月的参议院选举中使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公民党丧失控制多数席位的地位。按照普通常识，安倍就应该下台，尚不失体面。但不知羞耻的安倍在9月8日的会谈中向小布什效忠，保证自卫队继续支援美军（插图为护卫舰上的海上自卫队），获得美国主子的支持而拒绝卸任。在“九·一一”以后，小布什当局利用美国民众的惊恐发动了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当时的小泉政权利用日本民众的部分同情心制订了所谓“反恐特别措施法”支援美国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其中包括派出自卫队在印度洋公海上为美军加油等。作为侵略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早已告一段落，此“反恐特别措施法”也将于今年11月1日失效。但为什么安倍甘心以政权为赌注要延长此“反恐特别措施法”呢？因为此“反恐特别措施法”实际上偷换为支援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日本自卫队在印度洋公海上为美军加油的数量从对伊拉克开战前的每月20万加仑到今年9月的80万加仑。日本对美军在伊拉克的战争的主要实际支援就在于此，失去日本支援的美军会进一步加深小布什当局继续伊拉克战争的危机。

安倍在获得小布什的赞许后回到日本，立即召开临时国会，发表演说，摆出架势要强行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继续执政。不过，这一次，在野党早已看出安倍的花招，连自民党内部的麻生等实力派也在准备新的法案以备后路。走投无路的安倍在两天后就只得宣布辞职，逃入医院，结束了短暂的安倍政权。

在这样的闹剧中诞生的福田政权当务之急是收拾安倍抛下的烂摊子。为了执行日本首相向美国总统许诺的“国际公约”，福田必须取得反对党自由党的同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任自由党党魁小泽正是冷战结束以来推动“集团自卫权”合宪化的祸首。现在，从小泽的口中竟然冒出“宪法”的重要性以牵制自民党，可见日本宪法对于政客们是多么的一钱不值！

毕竟，福田政权的成立是对安倍军国主义冒险路线的否定，同时也迫使它对小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进行修正。可以预测以下几点变化：

一、在外交方面，福田政权将与小布什当局稍微保持一定距离，而准备与明年美国大选后的政局配合，在某种场合（例如，11月1日以后由于“反恐特别措施法”的失效而被迫暂时中断自卫队对美军在印度洋上的加油支援）会请求美国的“谅解”。同时会加强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联系。例如福田已经表明在任内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如果朝鲜北方在“六方会谈”中就解除核武装达成实质性的进展，日朝关系可能向正常化方向发展。

二、在内政方面，福田政权会向自由党妥协，接受甚至采纳一些自由党的主张，因为它们之间本为一党。考虑到日本经济（特别股票市场）的低迷，这两大政党背后的财团会促使两党合作，在诸如“政党资金报告透明度”方面会达成一致，减少由此带来的丑闻导致政局不安，甚至会出现超级联合执政局面。这两大政党，加上公民党，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会席位，可以毫无障碍地制定任何法律。这可能带来日本战前那样没有反对党的“大翼赞”体制，使国会民主体制名存实亡。

三、在社会政策方面，福田政权会修正极端私有化、一味强调自

由竞争的加剧贫富差距的小泉·安倍路线，回到传统自民党的“共生”政策理念上，力图减轻社会矛盾。例如，日本政府在教科书检定中取消了关于在冲绳战时日本军队强迫民众集体自杀的记述，引起强烈抗议，福田被迫表示要重新考虑。

[赵京，2007年10月3日 美国圣拉蒙]

48. 日本爱媛县警察当局的组织性犯罪

远山裕树

2008年9月30日，日本高松高等法庭判决确认爱媛县警察仙波敏郎巡查部长控告爱媛县当局因为揭露警察当局贪污而被打击报复的国家赔偿要求，维持2007年9月11日在松山地方法庭判决的结论。爱媛县警察当局在向县议会报告中，承认“不就事实进行争论。经过详细检查的结果，找不出上告的理由。”相当于全面认罪。

以警察厅为中枢的全国警察组织，自从2003年北海道警察当局贪污事件（伪造收据）被报道公开以来，连续被揭发出同类事件，在国会也被在野党议员追问，警察内部抛出一些替罪羊，全面抗拒。尽管文书管理规则要求保存五年以上所有收据，但全国有326个警察课或署在过期以前，把大量的搜查费证据、伪装出差的旅行费等文书销毁，显示出这是来自警察厅的指令。

早在2004年5月，受到北海道警察当局贪污报道的刺激，大洲警察署的原会计课长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到：“大洲署的搜查报酬是伪造的。”警察厅和县警察当局表面上承认过失，暗地里全面动员，孤立会计课长。仙波看在眼里，知道腐败透顶的警察系统已经不可救药，坚定地站出来，真名实姓地召开记者招待会支持会计课长，被当局24小时监视起来。

在2005年1月2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仙波以自己38年警察生涯的真实体验，揭露警察的组织性犯罪：“1972年9月自己升任三岛署巡查长以来，平均每年两次接到会计课长的指令，每次要求伪造三份收据。当我问为什么这样做时，会计课长都回答说：这是组织的指令。从我在1973年到1995年的七个警察署的工作期间，都被这样指令。作为执法的警察，我不能伪造文书，一次也没有合作。这样，从24岁升任巡查部长以来，尽管在考核中名列前茅，在32年的工作生涯中，一次也没有机会得到提升。”“搜查警察从来没有对提供情报的合作者支付过报酬金。伪造的出差费也是同样为了警察上司的吃喝

玩乐。”“伪造收据成为升职的一个条件，不肯同流合污者就不能升职”。这就是警察系统性犯罪的实态。

县警察当局一周后马上把仙波从铁道队调到只有一张桌椅的通讯室，同事也不理他了。仙波毫不畏惧，于2月11日以“因为被报复调动而遭受巨大的精神、物质痛苦”为由向松山地方法庭提出控告。据日本共产党根据公开的资料，他们调查过约二十名提供情报者，都没有收到过警察的报酬金。但县警察局不由第三者确认，自行调查247个相关人物，声称“没有找到伪造收据、假出差的事实。”但这一次法院判决是对警察组织性犯罪的确认，是对2006年起实施的“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的具体执行，保护从内部揭发政府（特别是公安政治警察）、企业犯罪的良心公民。爱媛县的人事委员会也已经认定取消调动，让仙波回到铁道警察队。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统治体制，正是因为（在美军支持下）维持了警察系统才维持了自战前以来的统治。日本的政治结构，除了外交，基本上没有变化。所以，对于警察系统的组织性犯罪很难得到揭发，即使揭发出来，也很难绳之以法（如过去对日本共产党干部住宅的偷听，现在对反战人士的镇压）。希望这次仙波的法庭斗争胜利是一个契机，要彻底追究日本警察全国性的组织犯罪（特别是政治性镇压）的责任。

[赵京译自新时代《桥梁》周刊 2008年10月27日第2048号]

49. 以“靖国史观”武装起来的日本自卫队

日本防卫相滨田靖一 2008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深夜举行紧急记者会，宣布罢免自卫队航空幕僚长（相当于空军司令）田母神俊雄的职务。理由是田母神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否认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行为，并且呼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当天晚上，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也谴责田母神的论文有欠妥当。他说：“即便是作为个人发表的论文，也与他目前的地位不符，有欠妥当”。

田母神的论文获得日本一家经营连锁饭店的阿帕集团（APA GROUP）主办的第一届《真实的近代史观》有奖征文最优秀奖，并于星期五刊登在阿帕集团的网站。田母神在论文中称，说日本是侵略国家完全是冤枉。1995 年日本内阁通过时任首相村山发表的“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沉重损失与痛苦”谈话，麻生上台以后也表明将继承这一立场。作为航空自卫队最高首领的田母神的论文与政府见解背道而驰。日本有分析认为，这对麻生内阁的亚洲外交是一个打击，同时为自卫队供油相关法案的审议增添麻烦。但 11 月 11 日举行的日本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听证会，变成了刚被革职的田母神俊雄的独角戏。

田母神（插图为 2008 年 8 月 19 日访美时）神气地夸口：“如果我让自卫队官兵们应征，马上会有上千篇论文。”简直是向日本的文职政府挑衅。“我只是说日本是好国家而已，以此被解职，不可思议。”

“自卫队官员也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不能被村山的谈话限制。”“如果不说自己国家的好



话，不会有干劲；说自己国家的坏话，会影响自卫队的士气。”当社民党的山内德信议员进一步质问：“你的本意是让自卫队行使集团自卫权，堂堂皇皇地拿起武器去战斗吗？”时，田母神毫不含糊地回

答：“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一事件显示：以田母神为代表的极右“靖国史观”派已经在自卫队中扎下根来。

过去，田母神就利用空军干部学校，组织私下圈子，发行机关报《鹏友》，宣扬侵略战争史观和主张修改宪法。田母神在担任小松基地司令时就与要求采纳右翼教科书的团体串通起来，促使当地的右翼团体结成“小松基地之友会”。田母神 2003 年任自卫队统合幕僚学校校长时，主导设立“国家观·历史观”课程，招聘外面的右翼讲客来兜售充满天皇主义的国家观，否定宪法。在防卫省提交的资料中，把课程的内容和讲师名单都涂黑，不让公众知道。

这一次悬赏论文，就是由田母神向航空幕僚监部的教育课长介绍，以人事教育部长的名义向全国的部队发出应征要领的传真（《朝日新闻》11 月 15 日报道），完全是组织性的行为。对此，原自卫队陆军幕僚监部人事部长志方俊之解说道：“历史观非常重要。如果认为日本过去犯下深重罪行，怎能让年青自卫队士兵自豪地为国捐躯呢？”“爱国的士气，不能由‘自虐史观’培养出来。”（《朝日新闻》11 月 13 日）。这证明自卫队的上层已经形成了肯定侵略史观并进一步系统地灌输给士兵的事实。我们从自民党的国防部会议员们的拥护气氛到互联网上一片“英雄！”的叫好声中，也可以感受到日本社会中，肯定战争历史的“靖国史观”并只是一小撮右翼团体的阴谋，而是在日本政府默视、在财界推动下，正成为统治意识的主流。

麻生首相、滨田防卫大臣赶忙让田母神领取 6 千万日元“定年退職”，而没有“惩戒免职”。反对党民主党在此事件上也态度暧昧，没有就实质性的“文民统治”追究自民党的失职，更不可能深入改造已经被“靖国史观”武装起来的自卫队。据报道，民主党的鸠山干事长曾经与田母神共同出席在阿帕集团的会长家中举办的酒会（《现代日本》11 月 13 日）。

在目前的金融恐慌的经济危机中，很有可能日本的统治阶层会促使执政的自民党·公明党与在野的民主党联合执政，以他们的远远超过 2/3 的议席数目，一举修改日本宪法，把日本推向军国主义的道路，重演日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军人威胁、影响政治的悲剧。

赵 京 编译自日本《桥梁》周刊 2008 年 11 月 24 日第 2052 号

50. 日本“入管法”改恶动向

《朝日新闻》6月7日就日本“入管（外国人出入国管理）法改正”登载题为“要共生而不是监视”的短评，呼吁日本政府不要把对在留外国人“管理”制度改得更无人性。

在日外国人2007年底达到215万人。目前的修改方案是对在留3个月以上的外国人由机场或出入国管理局发行带IC晶片的在留卡，代替过去由地方政府发行的“外国人登录证”。外国人必须随身携带此证，在变换住处、学校、公司等时必须报告，连接受外国人的单位也必须报告。如果违反的话，轻则被罚款，重则被取消在留资格。日本政府借此机会，正好把十几万没有在留资格的外国人遣返出国。这是对没有日本国籍的在日居民的监视制度。

据《桥梁》周刊2009年6月8日号等报道，5月24日有两、三百名日籍和非日籍人士在东京国劳会馆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准备导入新入管法。除了对于在留3个月以上的外国人的监视管理外，对于出身在日本的朝鲜、韩国、中国人，新入管法要发行“特别永住证明”，也得随身携带。当场发言的一位中国人女性，说她祖父辈一百五十年前来到日本，现在还是“永住”外国人，人权得不到保障。

日本各党派正在为修改入管法较劲，准备三年后实施。同时，各市民团体也积极行动起来、抗议法案改恶。让我们拭目以待。

[赵京，2009年6月23日]

51. 从天安门到日本民主党政权

2009年8月30日今天，日本反对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获得众议院480个席位中的308个席位。在日本国会中，众议院比上议院优先，而民主党已经在一些小党派支持下控制了上议院的多数席位。这在是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下，一个反对党第一次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半个多世纪来几乎从未中断执政的自民党从300席位剧减为119席位，总裁麻生太郎已经代表自民党承认选举失败。自民党在小泉政权下的回光返照后几度苟延残喘，这一次用尽了威胁等选举手法攻击民主党是“极左”，也没能阻止保守的日本选民抛弃自民党。民主党领袖和即将成为首相的鸠山由纪夫已经开始对如何接管麻生太郎首相的政府进行商议。

鸠山强调这次选举胜利，除了代表政权的交替外、还要更替利益交换的旧政治运作和由官僚支配的日本主权，并承诺在政府政策上作出全盘的改革。例如，要让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摆脱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将对邻近的中国寻求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将把资金和资源以儿童医疗保健和免费教育的形式从企业界转投注给家庭，等等。不过，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看鸠山的讲演。他本人是日本政治弊端“世袭政治”的典型。他的祖父是前首相鸠山一郎，他的弟弟是自民党麻生政权的内阁成员。

本来是自民党死敌的创价学会在冷战结束后抛弃“人道社会主义”等纲领投靠自民党，以为可以维持自民党-公明党永久执政，这一次从31席位落到21席位，其中，包括其代表在内的政客在只有一人席位的小选举区全部落选，被赶出政权。日本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各自保住了原有的9和7席位。社会民主党席位虽然很少，但因为民主党中还有一些从原来社会党逃过去的议员，再加上工会等团体对双方的支持，对民主党有一定的牵制作用。但愿他们吸取教训，不要为了一个大臣的位子放弃原则而全军覆没。

这一次选举多少摆脱了官僚的支配（自民党议员有三分之一直接来自退休官僚），在鸠山政权下，不会再出现议员在国会宣读由官僚起草

的议案的情况，更不会出现（村山）首相因为不忍心在继续强占冲绳村民土地的文件上签字而被官僚（防卫设施厅长官）训斥的场面吧！当然，世袭政治并没有改善，包括鸠山弟兄、福田、安倍、麻生、原首相中曾根的儿子、原首相小泉的儿子、原首相田中的女儿（从自民党换到民主党）、原首相小渊的女儿、原自民党总裁河野的儿子、原首相竹下的儿子、后藤田的儿子等第二、三、四代议员，还是日本政坛上的主角。他们惯于选举、缺乏知识和视野、对政策不感兴趣，不可能像他们的祖父们那样在战后带领日本复兴。他们当中，只有臭名昭著的小泽一郎与众不同，超过其父。

在日本（以及亚洲）的冷战，结束于1989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对天安门的占领。从此，日本的统治阶级知道：日本第二大的政党社会党加上所有的打着各式“社会主义”旗号、亲近中国的反对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连）已经不可能取代自民党执政了。他们当中的有识之士（如京セラ Kyocera 公司的稻盛和夫名誉会长。）意识到要模仿美国、开始推动形成能够取代自民党的另一个自民党，而能够担当此重任的只有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泽。

这一次选举最大的胜利者是小泽一郎。小泽本来应该坐在今天鸠山的交椅上的。但是，在日本政界翻云覆雨的小泽毕竟在政府官僚（特别是警务系统）中也树敌不少，在今年5月突然被警方搜查其秘书的违法献金。大家都知道，除日本共产党议员以外，每一个日本政客（包括鸠山，其捐款名单中竟然有死人的名字）都接受违法献金。小泽刚开始决心抵抗到底，但不久突然宣布辞职。据每日新闻2009年5月15日报道，小泽在宣布辞职的前一天，秘密会见了稻盛和夫。可见小泽是在日本财界的意向下，“舍身”保党，才实现了民主党今天的胜利。



如果我们再回顾起台湾的反对党（民进党和新党）、韩国的反对党也都出自执政党的历史，更能体会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促使共产党分化

的必要。当然，这种分化，必须有客观的环境。前不久，我联系到“六四”后出掌北大党委的学友，希望被江泽民赶出中国政界的他能够审时度世，学习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或者俄罗斯的久加洛夫，挺身而出，聚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也可以摆脱政敌加给他的“李鹏死党”的冤名。他也同意我的“中国革命的成果已经被江泽民集团出卖殆尽”的判断，但毕竟不敢“背叛”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的父亲。他承认目前“物质力量不够”，因为他曾撰文要求“我党要有驾驭资产阶级的能力”而被“驾驭我党”的“物质力量”（资产阶级）的代表势力赶出北京。将来，中国的新的“物质力量”也不会选择他来当中国的小泽一郎吧。

从天安门事件到民主党执政，日本用了 20 年时间完成了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结构的转换。在这二十年间，美国的单独超级强权地位已经终结、日本的经济超级大国地位也早已凋零，而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崛起更显出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中国的民主化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我们不必期待新上台的美国奥巴马和日本民主党政权能够支持中国的民主、人权（维权等）运动，但要坚决抵制 20 年前那样的自民党政权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出卖和压迫，更要进一步联合世界民众，共同推进民主、人权进步。

[赵京，2009 年 8 月 30 日]

52. A Letter to the Japanese Premier Hatoyama

September 23, 2009

Mr. Yukio Hatoyama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1-6-1 Nagata-cho, Chiyoda-ku,
Tokyo 100 - 8968, Japan

Dear Mr. Prime Minister:

I am a U.S. citizen from China and Japan. I have waited for twenty years for the day (September 16, 2009) when Japan's regime changed. In fact, I appealed to the Japanese citizens to change regime at Asahi Daily's interview on February 10, 1990, when I w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Osaka University (Exhibit 1). As a victim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under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since 1989, I welcome you being elected Japan's Prime Minister. Now is the time for me to seek justice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under you and your Democratic Party. This is also the opportunity for Japan to play an active and positive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 was unexpectedly pushed into the complicated wor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young Chinese student organizing democratic activities in Japan. It was in 1989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The LDP Japanese government handed us Chinese students over to the Beijing regime, even though Japan also signed the "Declaration on China" during the G-7 Summit in Paris. Here are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of the statement on July 15, 1989:

We have already condemned the violent repression in China in defiance of human rights. We urg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ease

action against those who have done no more than claim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to democracy and liberty.

This repression has led each of us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xpress our deep sense of condemnation to suspend bilateral Ministerial and high-level contacts, and also to suspend arms-trade with China, where it exists. Furthermore, each of us has agreed that, in view of current economic uncertainties, the examination of new loans by the World Bank be postponed. *We have also decided to extend the stays of those Chinese students who so desire.*

The Chinese Ambassador Yang Zhenya claimed that no Chinese student would be affect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Exhibit #2: Asahi Daily, June 29, 1989). He deceived the public. In the mean time, the Education Minister Nishioka stated at the Japanese Congress that the Education Ministry had prepared to legally protect and financially compensate any Chinese student affected by the Tiananmen incident (Exhibit #3: Mainichi Daily, June 24, 1989). We believed so because Japan was internationally regarded as a democracy. When I was suspended of my scholarship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 visited the Education Ministry officials at Osaka University. The officials frankly told me that the Japanese Congress and Education Ministry declarations were lies to deceive the Japanese public.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did nothing besides such lip service.

Furthermore, when I consulted the Justice Ministry's Immigrants Office in Osaka because I could not renew my PRC passport, I was told that all Japanese governmental officials had been instructed to prevent Chinese students from seeking protection from Japan. They told me, "You must go back to the Chinese Consulate to apologize for your mistakes. Your government has promised us that they will forgive you. If you cannot renew your passport, you become illegal in Japan. Go back to China!" Other Chinese students also received similar threats, "Just submit a letter of apology for your dissident activitie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you'll

be fine... You are ruining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t i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for you to seek help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top acting like such a baby.” (Jap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cited from Edward Friedman,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East Asian Experienc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104) Finally, I was forced to sign a statement prepared by Osaka University in Japanese. The signed statement was sent to the Chinese Consulate, and I got two-year passport extension. This episode was reported twenty years later, at Asahi Daily on June 8th, 2009 (Exhibit #4).

In 1990, my fiancé fled from China to Japan for an academic conference. We first went to the Osaka Office of the Immigration Bureau to seek for her visa extension. The officials told us to go to Tokyo. We then went to the Immigration Bureau at Tokyo to ask for her to extend her stay in Japan. Again, we were rejected. We consulted a lawyer, and he told us both (because she herself had not been involved to political activities) to apply for political asylum. Since she received her Ph. D from Osaka University in 1988, we also consulted with Osaka University and expressed our desire to live together in Japan. However, I was threatened that Osaka University was preparing to expel me with the excuse of “unable to continue study” if I decided to apply for political asylum. To help me stay and continue my study in Japan, my fiancé made the painful decision to return to China. This was reported at Asahi Daily on October 20, 1992 (Exhibit #5).

Under the pressure from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LDP Japanese regimes, all institutions in Japan closed their doors to me, for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the Sino-Japanese friendship." I could not find an academic/research position in Japan even though I was the first graduate student to receive Ph. D in Sociology at Osaka University. Another Chinese student leader could not receive Ph. D from Rikkyo University even he had finished his dissertation. Many other Chinese students fled to the U.S., Canada, Australia, Singapore, New Zealand, and even to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hich did not require visa for PRC passport holders.

The Japanese police, both local offices and national secret agencies, followed me everywhere I moved in Japan. When I protested, they said, “We are protecting you. Otherwise, we cannot guarantee your safety in Japan.” Again, they lied. When I was heavily beaten by a Chinese agent (who was hired as a law professor at Kobe University to spy on Chinese student activities) in Tokyo in 1992, I reported the case to the Tokyo police. A uniformed policeman and a secret police officer collected information at the site from me for five hours. I also submitted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record showing that my injuries sustained over two weeks. However, after several weeks, when I asked for the investigation progress, the police said they could not find any record of this case. I was warned not to pursue this case anymore because it may turn against me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may expel me out of Japan.

It was reported by the Hong Kong magazine “Cheng Ming”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a secret agreement not to accept Chinese political asylum.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e LDP government refused Nan Zhao’s asylum application, the first case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for many years. There are many other brutal human rights violation cases by the LDP government. Here is a citation from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1992 – Japan” (<http://www.unhcr.org/refworld/publisher,HRW,,JPN,467fca5122,0.html>):

Our primary concern continued to be Chinese dissidents who were in Japan at the time of the June 4, 1989 crackdown in Beijing or who later fled to Japan. Althoug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romised at a 1989 summit of industrial nations in Paris that it would offer refuge to dissidents who feared persecution if returned to China, it has not granted political asylum to a single Chinese dissident.

...The exception was the case of Lin Guizhen, a democracy activist from Fujian Province who entered Japan in September 1989 and was forcibly repatriated to Shanghai on August 14, 1991. The deportation

came on the last day of a high-profile visit to Beijing by then-Prime Minister Toshiki Kaifu. Lin was sent back despite two lawsuits pending in the Japanese courts related to her claim for refugee status. ...Japan's action had violated the 1951 Refugee Convention, which Japan ratified in 1982.

These human rights abuses by the LDP government manifest the problem of Japan as a democracy as well as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ty. Since we could not hold the LDP accountable for the commitment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made two decades ago,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your government to solve this problem for us and for Japan. As the first step, your government should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publicize relevant Tiananmen documents to handle Chinese students' status in Japan.

Sweden passed a Freedom of the Press Act in 1766 to legalize the publication of government document and provide public access to government documents because the new majority party wanted to see the documents which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had kept secret. The United States passed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in 1966 at the height of President Johnson's Great Society legislation. Hungary, Germany, and South Africa also passed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s when regimes changed. Now it is Japan's time to do so.

Today you and President Obama in New York stated to enforce the Japan-United States alliance. The alliance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nd this human rights case is a test of your new government. *I request that your government set up a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LDP government's abuses against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during and after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I and others will cooperate with you. This is the first and only step to make conciliation, and to make Japan-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based on the solid principles of peace and justice.

Exhibit #4: Asahi Daily June 8, 2009

<http://www.asahi.com/special/kajin/TKY200906080132.html>

日本で旅券更新、課された反省文—第5部〈天安門記〉

「日本は民主や自由を掲げているはずなのに、守ってくれなかった。そう感じている元留学生は僕だけじゃない」

89年の天安門事件当時、大阪大大学院で社会学を研究していた趙京（チャオ・チン）さん（46）の言葉に憤りがにじむ。

中国政府の国費留学生だった趙さんは、事件後に発足した民主化組織の関西地区代表を務めた。旅券の更新期限が迫った91年夏、大学当局に相談すると、指導教授から中国総領事館あての「反省文」への署名を求められた。「学業以外の活動に没頭し適切でなかった。今後は学業に専念する」。そんな文面だった。

この出来事について、指導教授は「痛い記憶だ」と振り返る。民主化運動に取り組む趙さんに、中国当局は奨学金打ち切りなどの圧力をかけた。趙さんの旅券が更新される見込みはなく、指導教授は総領事館に何度も働きかけたが、無視され続けた。

途方に暮れていた91年8月ごろ、指導教授は奇妙な体験をした。

研究室に一本の電話が入った。男の声で名前も言わず「ちよつと来て欲しい」。趙さんの件だ、とピンときた。大学から遠くない指示された場所に急ぐと、看板もない殺風景な事務所だった。奥にいた日本人の初老の男は、机の上のファイルを開いて見せた。趙さんがいつ、どんな集会に参加しているのか、詳細に記録した資料の束だった。

「指導教官失格ですな」。男は決めつけ、「日中友好にひびが入りますよ。総領事館に謝罪した方がいい」と続けた。そして趙さん

が反省文を書くこと、邪魔が入らない深夜に総領事館を訪ねて謝罪すること、の2点を助言した。

数日後の午前0時過ぎ、総領事館に行って頭を下げた。そして、反省文をつくって趙さんにサインさせ、総領事館に送った。まもなく旅券の更新が認められた。

男の正体はわからない。指導教授は「早く事態を收拾しろ、というのが権力の意向だと理解した」と振り返る。

趙さんは95年、日本での生活に見切りをつけ、米国に渡った。いま「中国政府の顔色でなく、僕という個人に向き合ってくれそうだったからだ」と理由を語る。

日本政府は天安門事件以後も、人権問題で中国を批判するのを控えた。趙さんの件があつたころ、海部首相が西側首脳として事件後初めて訪中し、一時凍結した円借款の本格再開を表明。対中関係の全面修復にかじを切った。

当時、外務省アジア局長だった谷野作太郎・元中国大使は「中国を締め上げることがアジアの平和と安定につながるのか。将来的に中国を国際社会にどう位置づけるか。隣国としての第一の課題だった」と振り返る。

青山学院大の高木誠一郎教授（国際政治）は「日本が中国の人権批判を控えた理由の一つに、歴史問題があつた」と指摘する。中国政府に戦時中の日本軍の行為を持ち出されないか、との懸念だ。

体制の異なる隣国と、日本はどう向き合うのか。天安門事件が突きつけた課題は、今も続く。中国当局の「磁力」は海を越え、在日華人を縛りつけている。（林望）

53. 日本之行观感

8月4-12日，我持刚拿到不久的护照，15年来第一次重返亚洲，访问日本。

到达东京的下午，我直奔赵南经营的家庭饭店。这是一个僻静的所在，对于多年没见的老友之间的会谈固然很适宜，但当我注意到整个晚上除了我只有两次客人，不禁感慨自己当年政治上的幼稚，无能领导在日的民主运动。在分手的地下车站口，我勉励道：“我们的民主事业一定会胜利，我们不久就会相会在北京的。”晚上，我去新宿的胶囊便宜旅馆，体会现实的日本生活。沿途注意到许多在餐馆、旅店服务到深夜的女子。

第二天中午，我与三位首次见面的日本朋友会餐。Kikuchi Yumi是我们组织日本的反战运动时共同为 Kucinich 竞选美国总统从网上认识的有名作家。她的主要工作是对日本翻译、介绍美国的非主流媒体观点（例如认为“9-11”是美国政府的操作等）。可惜她对中国不



感兴趣，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河内谦策律师也是因为反战运动从网上认识的。他是传统的日本左派，对于中国的“六四”以来的政治倒退、朝鲜北方的绑架事实等很痛心，现在愿意与中国的维权律师合作。我从东京回美国时，他又一次来见我，送给我一副精致的日本画。我深深地体会到他对我们下一代改变世界的期待。麻生晴一郎是一个自由作家，在东京大学就学期间就开始放浪中国等，致力于追踪日本的主流媒体不报道的中国社会现实。我只翻了几页他的小书《反日、暴动、泡沫——新闻电视不报道的中国》，主要批判日本只看中国政府眼色行事，立即意识到他正是我在日本寻找的同行，真正地愿意为中日民众的友好献身。

晚上，我见到民主中国阵线的林飞，去年我们共同为近百日坚持在东京成田机场过道的冯正虎呼吁，非常感谢他这样的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强战士。我又去见杨中美，谈起 89 年日本的民主运动，都不由得为混进民运队伍、向北京和东京政权出卖我们的某学贼（现在是“上海交大法学院院长”加“摩根斯坦来中国大区执行董事”）的人性罪恶感叹不已。当然，除了我们的头脑单纯外，国家政权的卑鄙是制造中日当代史最黑暗一页的主要原因。只要中国没有实现基本的民主自由人权，中日关系永远不可能“正常化”。

6 日，我们乘新干线去关西。我访问了当年愿意帮助我们的大阪律师大水，也拜访了当年参与民主运动的姚渡生的家庭。他们夫妇都因为松下公司把业务迁移海外而失业，无法支付房屋贷款。谈起当年我们的捐款，因为那个现在腰缠万贯的学贼的出卖，至今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7 日，我去大阪产业大学出席“全球化与社会变动”研讨会并发表“全球化时代的企业社会责任—硅谷的中国人权政策”论文。8 日，在大阪见到从美国赶来的姚明龙、从中国赶来的马燕、从和歌山赶来的王妙发等，讨论了尽快转送 89 年关西民主运动捐款到天安门受难者手中的问题。



9 日，我和姚明龙、王妙发到京都与小野（及其助手田中）、川村律师会谈，正式要求他们把 89 年关西民主运动捐款送给天安门受难者。10 日，我继续与小野、川村律师会谈。在 89 年民主运动以来与我们接触的川村女士明白了事实真相，很想尽快完成这个过程。但后来被那个学贼拉入捐款管理的小野很难、很不愿接受他自己也被蒙骗的事实，自己不肯也无力转送捐款不说，面对“人道中国”预先转送支付的捐款收据，也要刁难。连这样单纯的事务，拖了二十年还办不成，可见中国民主事业的艰辛。这进一步说明，中国的民主事业不是简单的政治活

动，而是更深入的社会变革，每一个人的人性、灵魂都得到表露和洗炼。

9日晚，我抽空去拜访松尾一家。他们夫妇幸好都有工作，可以抚养三个小孩的教育。谈到日本的两大政党自民党和民主党，松尾愤怒地痛斥它们都是为资本效劳的一路货：“为什么只能提高消费税才能解决日本的财政危机？难道不可以提高所得税和企业税吗？”他现在只投日本共产党的票了。我10日去京都大学会见在那里工作的小弟，在大学校门的正面，看到两个破烂的工棚，原来是两个被解职的大学图书馆职员在罢工抗议。我与他们交谈，知道他们已经在这里坚持一年多了。从他们给我的资料和网站<http://extasy07.exblog.jp/>，可以知道这是日本大学及其他机构的雇用形态转换趋势。日本资本主义的终身雇用“神话”已经瓦解，所有的员工每隔几年以后都要重新雇用，而受害的总是下层民众。其实，我二十年前在大阪大学已经目睹了没有得到继续雇用的女职员的抗议游行，京都大学在现在才执行，已经是全日本最“人道”的机构了。我掏出一千日元，鼓励他们：正是你们的存在，才表明京都大学是日本最自由的学府，坚持下去！要是能够把这样的抗议扩展到天安门广场、白宫、日本皇宫等全世界统治集团的心脏，才说明民众有起码的言论自由。

过去读荷马史诗，很羡慕自己不能置身其中。现在，我们正经历着比任何史诗都惊心动魄的全球化转换时期，人类的文明走向（无论是光明还是堕落），基本上可以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确立下来。我为自己能够置身于这个时代并为社会尽到自己的良知而感到幸运。

[赵京，2010年8月17日，美国圣拉蒙]



54. 日本政府的信用等级

日本副总理冈田克也在2月7日的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正式向80岁高龄的原《每日新闻》记者西山太吉谢罪：“由于国家的密约问题产生了受害者，为此向作为记者而行动的西山表示敬意。”

“至少到1990年左右为止，历代的首相、外相尽管接到外务省关于密约的报告，一直在国会否定其存在，难以容忍。我们作为议员应该深刻反省。狡辩是不会得到谅解的。”⁴³西山过去因为揭露美日之间关于1972年交换冲绳的密约，被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定罪⁴⁴。读到这个消息，使我愿意把日本政府的信用从“垃圾”等级提升一级。

这使我不由得回忆起1989年我们在日本经历的当代中日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日本政府在巴黎的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保护中国留学生”的国际宣言，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在国会答辩中声称“已经做好准备帮助因为参加游行抗议而被取消奖学金的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但当我被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委的奖学金（直到今天，教育部和外交部还没有给与我任何说明）而到大阪大学的文部省办公处查询时，那个课长哈哈大笑：“你来日本也不短了。怎么不知道日本国会是在吹牛撒谎的殿堂、而日本政治家都是骗子？你讲的那些国际宣言、国会答辩算什么？我们文部省从来没有传达一文要保护你这样的人。保护了你，我的脑袋哪去了？”当然，在后来的黑暗日月里，我们知道日本政府与操握我们在日中国学生命运的驻日公使唐家璇有密约，包括准备以“无完成学业可能”借口把我赶出大学⁴⁵、由国立神户大学提供“法学部副教授”给一个中国学贼打手出卖在日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等。

⁴³<http://www.asahi.com/politics/update/0207/TKY201202070462.html>

⁴⁴<http://www.asahi.com/digital/mediareport/TKY201111090337.html?ref=reca>

⁴⁵ 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完成学业的原因之一。虽然我获得大阪大学第一个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无法在日本的社会学和“学术界”找到饭碗，从此到处流浪打工。

2009年9月23日，我致函刚取代自民党政权的民主党首领鸠山首相，要求日本政府公开当年出卖我们在日中国留学生民主人权运动的密约，至今没有回应⁴⁶。法国作家左拉1898年1月13日在为被诬陷的犹太人军官辩护的至法国总统的信中呼吁道：“当真相被埋没后，它会成长、壮大，直到有一天突然爆发，展现出一切事物的本原。”⁴⁷总有一天，那些埋在东京、北京、台北、华盛顿档案中的各种见不得人的密约会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此，我可以再等23年。

[赵京，2012年2月7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⁴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

⁴⁷ J' accuse, Emile Zola. Law Lit, ed. by Thane Rosenbau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 p. 34.

55. 综合灾难后仙台法庭对日本企业不当行为的判决

2011年3月11日在东日本发生海啸、地震、核事故综合灾难，已经确认近2万人死亡、失踪，近40万户房屋倒塌（引自日语维基百科）。除了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对失当以及原子能开发政策受到批判外，日本企业的不当行为很少受到关注。一般而言，日本企业都宣布不会因为灾难影响业绩而解雇员工，但普遍削减工薪、降低待遇，这得到几乎所有员工的配合或接受，当然其中伴随着人事斗争。例如，在美国的日资企业K在硅谷的公司就由日本人经理乘机对当地的员工进行清算，而中国员工首当其冲（公司害怕白人或黑人员工起诉）。例如，尽管平均削减幅度为5%，一个年龄偏高的高级软件工程师因为与日本人经理关系不顺利，被削减四分之一的待遇，但因为目前市场上很难再找到工作，也只好忍气吞声。

在这样的气氛下，受灾地区最大城市仙台市的地方法院今年2月27日，就齐藤和歌子被公司不当解雇的诉讼，做出“解雇无效、补发被裁减工资”的痛快判决，值得借鉴⁴⁸。

齐藤2001年以临时工身份加入写测（测量）公司，后转为契约员工，2008年成为正式员工，月薪20万日元。在这之前的2007年，公司因业绩不佳，被东京的FM公司购买，由FM公司的董事佐佐木当写测公司的会长，独断专行、滥用权力。例如，他要求员工每天写“日报”，由他擅改后在公司内阅览，其中有“大脑还正常吗？”“你不配做我的弟子”等批示，给员工造成精神压力。齐藤女士对会长每天要求提交“日常生活的心情，高兴或烦恼等状况”的指示，痛苦万分，无法完成任务。2009年4月，公司进行“工资体系变更”，齐藤被降为每月18万日元，2010年9月以来更被降为每月16万日元。两个月后，齐藤突然接到公司的惩罚解雇通告，理由是：1、不提交作文，2、不见会长，3、抗议削减工资，4、无故缺勤（完全是捏造）。

⁴⁸引自东京《かけはし》周刊2012年3月第2214号。

这在日本社会，是对一个女工非常残酷的打击。同事们为了自保，都不敢为她声张正义。齐藤被迫每天自问：“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最后，她找到宫城（县）工会的执行委员长星野宪太郎，得到工会的支持，毅然上诉法庭。在法庭上，齐藤面对公司的谬论，堂堂正正地反论：“拒绝提交侵害人权的作文和不同意被无理削减工资，都是劳动者的权利。不能因为行使了劳动者的权利，就受到公司的惩罚！”得到满堂来支援的工友们的喝彩。从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不都是源于民众对经济人权的自发追求吗？如果世界上的劳动者们都这样意识到并行使自己的权利，资本和政权还能随意主宰劳动阶级的命运吗？

在综合灾难一周年之际，除了为受灾难民祈祷外，让我们为齐藤这样的普通女工庆贺，也像她学习，为就业权利和人的尊严抗争。

[赵京，2012年3月11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56. 如何翻过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89年“六·四”事件之际，中国科学院长卢嘉锡正在大阪大学访问。我因为对前任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印象不太好（他原是我们的系主任），觉得那个位子上的人远离科学精神，没有去见卢嘉锡。后来，听姚同学（他与卢同一专业）讲，卢不愧为一科学家，他不仅赞扬“八九”民主运动精神已经超越“五·四”，还纠正正在会的同学们：“邓小平不是老糊涂，而是发疯了！”。卢归国之际，他的秘书请我们“包涵”，我们同学中也没有人去密告。

我现在回忆起这个情节，表示出一个正直科学家当时的朴素感情，由此可以想象我们绝大多数在日同学的情形。后来，我们陆陆续续地知道：当时的三位最高权力掌握和执行者中，邓小平的后人试图为邓小平减轻责任，直接调动军队镇压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另有意图，而宣布戒严的总理李鹏为了洗刷自己，甚至把“正指挥”（屠夫）的头衔安在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头上。今年，被江泽民关押后释放的陈希同在仍然能够公开抗议“六·四”镇压的香港出书为自己叫冤，并承认“六·四”镇压是一场不应该发生、也可以避免的悲剧（我主要是根据 Wall Street Journal 的报道来源。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版常没有翻译出版一些敏感的英文报道）。我也相信，英国金融时报等外国媒体关于当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现任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内部提议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报道是有根据的。不承认“六·四”民族悲剧、阻扰解决“六·四”悲剧的，已经不是直接镇压民众和平请愿的决策和执行参与者，而是靠民族悲剧发迹的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在日本，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个“神户大学法学部副教授”的残羹给一个“披着人皮的学奸”，出卖、镇压了我们的民主、人权运动。

我在1995年底逃离日本之前，不断地批判文部省、大阪大学、神户大学、外务省、出入国管理局、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秘密警察）、东京警视厅、兵库县警等日本当局机构不要践踏自己的国际宣言和国会诺言把我们留日学生作为交易筹码。直到2009年9月23

日，我还致函刚上台的日本总理鸠山，要求他公布“六·四”时期自民党执政的相关资料⁴⁹。今天，我也再次呼吁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驻日大使杨振亚、驻日公使唐家璇，至少也要向陈希同那样，拿出勇气，回复我当年对你们的敦告和要求，公开你们当年与日本当局合作把我们赶出日本资料。只有这样，才能翻过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年6月4日]

⁴⁹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

57. 日本迈向核武装的危险立法

2012年6月15日，要求停止所有原子能发电的民众向日本政府提交了78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但野田内阁第二天却决定重新启动大饭的原子能发电所⁵⁰。更有甚者，面对去年的灾难以来反对原子能开发的全民意愿，在民主党、自民党和公明党三大政党绝对控制之下的日本国会于6月20日通过了由此三党提出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设置法》。其中，在第一条里插入将原子能开发用于国家安全“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資する”的条款。同时，1955年制定的《原子能基本法》中有关原子能开发的“民主、自主、公开”三原则的第二条也被此三党偷换，插入了同样的国家安全条款。这实际上是日本迈向核武装的危险立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逻辑解释。

提出法案的自民党议员吉野正芳表示，这个条款是为了把现在属于文科省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安全措施转移到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环境大臣细野豪志、经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官房长官藤村修同样也声称是为了“防止核扩散”，保证日本政府绝对没有想要将原子能转用于军事的意图。但是，IAEA等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机构采取的安全措施（英文safeguards、日语“保障措置”）与主权国家拥有的国家安全（英文national security、日语“国の安全保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日本政府的这点玩弄概念的小把戏可以收起来了。

最早试图把“安全保障”塞入日本原子能政策的是由中曾根康弘起草的1955年9月12日在羽田机场发表的四人“国会议员团共同声明”，但在实际通过的《原子能基本法》中，为了避免党派抗争，全面采用了日本学术会议有关原子能开发的和平利用三原则，去掉了“安全保障”的字眼。但后来历届自民党政府总是念念不忘如何将“安全保障”塞入日本的原子能政策。当时，日本的左派社会党、右派社会党与右翼的民主党、自由党在国会的势力相当；今天，日本的反对党（共产党9名议员、社会民主党6名议员）在众议院国会

⁵⁰此文引用主要来自东京新时代社《かけはし》周刊2012年7月2日号。

(480 名议员) 中微不足道⁵¹，提出《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设置法》的三大政党在众议院占有近九成的席位，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他们修订此法时并未经过听取公共舆论，也没有在国会充分讨论，事前也没有上传到国会的网页上，连国会的另外的小党也是在投票的当天上午 10 点才接到这个长达 265 页的法案，就是怕人事先知道。联系到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立法中也删除了将宇宙航空开发限制在和平目的的条款，《朝日新闻》、《东京新闻》6 月 22 日的社论都强调：“不能容忍在没有国民讨论的情况下修改直接与国家政策相联系的原子能、宇宙开发等科学技术法律。”“民主党和自民党成为一体，隐瞒了修改意图。没有通过正常程序修改了法律内容，损坏了立法部门的名声。”“应该在下一届国会删除此问题条款。”

日本国会基本上完成了向没有反对党的“大政翼赞会”的倒退。6 月 26 日，日本三大党又重演闹剧，把进一步压榨穷人的消费税从 5% 分两阶段提高到 10%。这一次，从冷战以来推动“大政翼赞”过程的始作俑者小泽一郎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野田集团（多出自“松下政经塾”）抛弃，带领 50 名左右的众参两院议员出走，打出了“反对增加消费税”、“脱离原子能开发”的旗号，意图在于吸收被三大政党抛弃的选民，是这位“风云人物”最后的回光返照。

另一方面，对于被金钱控制的代议政治完全失望的日本民众开始了直接行动。7 月 16 日，17 万人出席了在东京代代木公园举办的“10 万人对原子能开发说再见！”集会。在旌旗林立的男女老幼队伍中，连半个世纪前反对“安保条约”的学运旗号也出现了。日本民众在经历了 1989 年冷战结束以来政治经济的连续反动，已经没有撤退的余地了。日本社会两大阶级的阵线越加分明，它们的对垒会越来越激烈。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 年 7 月 24 日]

⁵¹ 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kousei2.htm

58. 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非主权方案

最早对钓鱼岛/尖阁诸岛争执开始独立思考，源于我对日本共产党和天安门六四事件关系的研究⁵²。日共很顽固地坚持：日本从1895年开始宣布尖阁诸岛为日本领土，中国1975年后才开始抗议，所以中国对尖阁诸岛的主权宣称是不正当的。日共虽然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严厉批判，但坚持“尖阁诸岛和侵略非同一问题，日本统治尖阁诸岛完全是正当的，也没有违背事实”，并为此指责历届日本政府立场不坚定，要求日本政府下令加强在尖阁诸岛海域的戒备。这是所有那些自身被“主权”观念蒙蔽或者利用“主权”观念欺骗民众的政党、组织或个人的未开化状态的典型例子。

另一方面，在“主权”观念的信奉者中，也有井上清这样的驳斥日本政府荒谬、主张中国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的历史学者。我因为在日本组织中国民主、人权运动，接受了安那祺主义/无政府主义而被中日两国政权赶出大学以及它们控制的国界，很羡慕井上清还能当他的京都大学教授。我也很羡慕H-US-JAPAN的编辑同事Robert D. Eldridge，因为是美国人，从神户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当上大阪大学的副教授（我1992年第一个拿到大阪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只能进入与中国无关的小公司）。Eldridge向我简要介绍了他的博士论文US-Japan-China involvement regarding Ryukyu/Okinawa，主要分析美国政府的政策决定过程（例如，罗斯福个人背着美国国务院不只一次提出要把琉球划给中国，国务院在文件中用中文发音Luchu或Liuchiu等），请参考他的原文，在此不费笔墨⁵³。

等各方头脑清醒一些后，我留心检索了网上的各种关于这些岛屿的“主权”的论述，觉得维基百科的条目

⁵² Jing Zhao,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June 4th Incident of 1989,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 12, No. 2, 1999.
<http://chinajapan.org/articles/12.1/12.1jingzhao25-32.pdf>

⁵³ H-JAPAN, June 10, 1999.
<http://cpri.tripod.com/cpr1999/ryukyu.html>

(<http://zh.wikipedia.org/zh-cn/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 介绍得相当全面，值得推荐。当然，正如条目的标题所示，它讲的是“主权问题”，不可能想到还有“主权”以外的观念和方案。日本人当中，除了安那祺主义、托洛茨基派⁵⁴等对抗日本政府的政治主张外，我又读到“老朋友”加々美光行（爱知大学教授）⁵⁵的高论。他建议中日都不要盲目地固持“国家利益”，而应该象对南北极那样，把这些“固有领土”（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概念）的“主权”冻结起来（《北海道新聞》2010年9月25日），让这些被利用来煽动民族对立的分离岛屿变成连接中日两大民众的友好链条。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岛屿目前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下、日本政府坚持“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纠纷”的立场，加々美的言论确实表现了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良识。其实，这还可以推广到美军密集驻扎的琉球/冲绳问题。更进一步，连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除了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外，也要突破“主权”观念的制约。

自从出现人类以来，地球上的领地经历了无数次人类迁徙，而“主权”观念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谁也不知道该从那一年算起），至今也没有哪个“国际法”来确立“主权”。如果当年蒋介石脑筋转得快一点，不仅区区钓鱼岛/尖阁诸岛，连琉球/冲绳的“主权”也成为中国的了。但中日之间难道因为当年蒋介石脑筋转得慢了一点，就值得为“主权”大动干戈吗⁵⁶？现在，连“主权”观念的发

⁵⁴ 例如，2010年10月4日かけはし週刊第2143号平井純一“尖閣諸島領有は沖繩・朝鮮・中国侵略の歴史的産物だ！”指出日本政府和日本共产党的立场的荒谬。

⁵⁵ 我们两人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后，被邀请去奈良女子大学与战斗性很强的“新左翼”日本女学生辩论中国的性质。1991年，海部首相宣布日本战后第一次海外派兵，新左翼的“中核派”四、五十成员穿同样蒙面服装，抱成一团在大阪市中心梅田游行抗议，前后被上百名警察警车包围，命令他们立即解散。普通日本民众都视他们为“恐怖分子”躲避不及，我在路边跟随他们，佩服他们为了理想放弃了个人前途，感谢他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⁵⁶ 据《朝日新闻》2010年10月6日发表的全国电话调查，69%回答“强烈主张”、23%回答“柔软对应”尖阁诸岛为日本领土，只有8%的回答者没有被主流媒体牵着鼻子走。对于有多少中国人主张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是无需调查的。

源地欧洲在经历因为“主权”引起的无数次战争后开始放弃“主权”、消除国界、建立联盟，让我们抛开“主权”、开放国界、废除国家（包括常备军、核武器等），创建中日（包括台湾，还有利益相关者美国）之间的持久和平吧！

谨以此文悼念东日本大地震的受难者。

[赵京，2011年3月14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此文发表以来，围绕钓鱼岛/尖阁诸岛又发生了一系列国际事件，导致中国政府取消建交40周年纪念活动、取消出席世界银行东京年会等。中（包括台湾）日之间的官司自然也打到美国来，石原控制下的东京都9月在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整版广告，请求用美日军事同盟保卫日本的“固有领土”尖阁诸岛。没想到这位二十几年前在日本经济泡沫高潮靠《敢对米国说不！的日本》成名的作家成为政客后，现在豹变为美国战略转移到东亚的马前卒。有趣的是，Wall Street Journal的对手The New York Times（有网上中文版<http://cn.nytimes.com/>）登出倾向中国的文章。不久，中国的广告也出现在更多的美国媒体上，突出世界大战中美同盟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政治意义。10月10日，台湾（其行政首領在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论文就是Legal Problems of Seabed Boundary in the East China Sea）也在美国的媒体上刊登了有更详细史料的广告。美国则摆出事不关己的姿态，显示出各政府的失败、无能。

20年前，我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建交20周年纪念会，遇到盗窃我们关西民主运动“6.4”捐款、靠出卖我们在日中国留学生当上神戸大学法学部副教授的学贼，在追问失窃捐款的过程中，被毒打流血（医院为我开出两周休假证明）。我去报案后，东京警视厅（地方警察）和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警察）也派人来调查了4、5个小时，口口声声要严正处理。后来，管辖神戸的兵库县警察告诉我不

要追问了，因为日本法务省出入国管理局很可能给我安上“打架斗殴”的罪名驱逐出境。我觉得自己还没有那样的殊荣，又到警察署去查询，结果被告知警视厅根本没有任何记录！2009年9月，日本的民主党上台后，我致函鸠山首相，呼吁他公开日本自民党政府1989年期间出卖我们中国留学生的资料⁵⁷，没有回复。

又一个20年过去了，我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1992年10月号“为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基”的文章依然历历在目，印证着我的担忧：

“今天，当我们透过纷乱的喧哗表象，认清各种政治势力的企图和手段之后，不得不深深地忧虑隐藏在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危机。因为至今为止，中日关系尚没有奠定真正平等、永久和平的基石；也更痛感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期待。”

“只有把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定在人权尊重的基石上，才可能获得包括正常政府外交关系在内的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真正平等和永久的和平。为这样的使命服务、献身，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誉。”

[2012年10月12日补充]

⁵⁷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

[安那祺主义文库 编辑出版发行 序言]

自从1989年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使我在日本转变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以来，我开始从日文和英文系统阅读安那祺主义的丰富历史和理论。1992-95年我们就职于日本公司期间，居住在富士山下绚丽的伊豆半岛，在沼津市图书馆读到“黑色战线”编辑的日本安那祺主义资料，印象深刻。后来我知道“黑色战线”其实主要是一个人的工作时，更加肃然起敬。我最近读到巴金的译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共10卷电子版），其中包括“黑色战线”史料等许多我想翻译、介绍的思想。许久以来，在中国能够出版的带有思想性的经典书刊，包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深刻影响我思想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几乎都被加上无知或无耻的政治按语。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文献，只是“供批判用”，才“有价值”在中国出版。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没有收入巴金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1930年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等；而在收入的“我的幼年”一文中，把陈独秀的名字删去，把关于爱玛·古尔德曼（作者的“精神母亲”）的一段完全删掉了。这些都促使我编辑这套《安那祺主义文库》，介绍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思想。实际上，自孔子以来，编辑史籍，也是为了开拓历史。本文库收集的史料，除了我的文章，还有部分从网上收集到的已经去世的安那祺主义著者、译者或同情/理解者。我们都把自己的写作作为对人类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版权”的概念。安那祺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所有权”，本文库也主要通过网上免费发行。文库大致按国度和时间次序分类。A-美国、B-英国、C-中国、F-法国、G-德国、I-意大利、J-日本、R-俄罗斯、S-西班牙、W-其他。文库中“无政府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和“安那其主义”通用。

- A-1: 《芝加哥的殉难者》，巴金译著，ISBN: 978-0-557-24143-9
A-2: 《一个安那祺主义者的狱中回忆》，柏克曼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2-9
A-3: 《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万塞蒂与沙珂著，巴金译著，ISBN: 978-0-557-16157-7
A-4: 《美国政治的安那祺主义传统》，赵京著，ISBN: 978-1-257-43927-0
C-1: 《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赵京编，ISBN: 978-0-557-19209-0
C-2: 《中国社会评论》，赵京著，ISBN: 978-0-557-04006-3
G-1: 《德意志观念对安那祺主义的贡献》，赵京著，ISBN: 978-1-257-37771-8
J-1: 《日本政治论丛》，赵京译著，ISBN: 978-0-557-23538-4
R-1: 《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6157-7
R-2: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3-6
R-3: 《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076-0
R-4: 《俄罗斯革命的起源》，斯特普尼亚克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077-7
R-5: 《一个革命者的狱中二十年》，妃格念尔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5-0
R-6: 《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赵京著，ISBN: 978-1-4583-0411-7
S-1: 《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巴金译、赵京著，ISBN: 978-0-557-17055-5
W-1: 《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赵京著，ISBN: 978-0-557-01635-8
W-2: 《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赵京著，ISBN: 978-0-557-03086-6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Dr. Jing Zhao,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SBN 978-0-557-23538-4

ID: 8067898
www.lulu.com

